

# 谁在掌控 俄罗斯？

普京与俄联邦安全局的权贵之路

「俄」安德烈·索尔达托夫（Andrei Soldatov）  
伊琳娜·博罗甘（Irina Borogan）◎著

臧博 吴俊○译

## The New Nobility

The Restoration of Russia's Security State and the  
Enduring Legacy of the KGB

揭示俄罗斯统治模式  
俄罗斯大选之年最值得关注的一本书

普京几乎注定迎来一场总统选举的胜利，  
这或许反映了俄罗斯选民的倾向，  
但更是展现了一种统治模式的独特力量，而本书将向你揭示，  
这一独特力量成长、壮大，并最终掌控俄罗斯的真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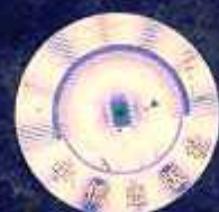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 The New Nobility

The Restoration of Russia's Security State and the  
Enduring Legacy of the KGB

“9·11”之后，当西方的目光已从克里姆林宫转向更为紧迫的恐怖主义威胁时，联邦安全机构已经进化成一支残酷、暴力、强权的势力——与现代俄罗斯国家的统治模式紧密联系、不可分割。

众所周知，作为前克格勃的一名普通军官，昔日的普京上尉，已经成为俄罗斯政治、经济权力的中枢——无论他身为总统还是总理。在普京崛起的同时，俄联邦安全系统也成功摆脱了克格勃没落时代的悲凉，逐步成长为普京权力体系中重要的一环，通过对经济、政治、反恐等诸多领域的渗透，如今的俄联邦安全局如同一条巨型章鱼的腕足，协助执政者勾连着俄罗斯政治、经济生活的几乎全部重要领域。



上架建议 ◎社科 · 时政

ISBN 978-7-5086-3076-



9 787508 630762

定价：39.00元

The  
**New Nobility**

The Restoration of Russia's Security State and the  
Enduring Legacy of the KGB

谁在掌控俄罗斯？  
普京与俄联邦安全局的权贵之路

〔俄〕安德烈·索尔达图夫 (Andrei Soldatov)  
伊琳娜·博罗甘 (Irina Borogan) ○著

臧博 吴俊○译

中信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谁在掌控俄罗斯？ / (俄) 索尔达托夫, (俄) 博罗甘著, 减博, 吴俊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1.12

书名原文: The New Nobility

ISBN 978-7-5086-3076-2

I. 谁… II. ①索… ②博… ③减… ④吴… III. 情报机构—介绍—俄罗斯 IV. D751.23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04153 号

THE NEW NOBILITY: The Restoration of Russia's Security State and the Enduring Legacy of the KGB by  
Irina Borogan and Andrei Soldatov

Copyright © 2010 by Andrei Soldatov and Irina Borogan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1 by China CITIC Pres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PublicAffairs, a Member of Perseus Books Group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博达著作权代理有限公司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仅限在中国大陆地区发行销售

**谁在掌控俄罗斯？**

SHEI ZAI ZHANGKONG ELUOSI?

---

著 者: [俄] 安德烈·索尔达托夫 [俄] 伊琳娜·博罗甘

译 者: 减 博 吴 俊

策划推广: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 4 号富盛大厦 2 座 邮编 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承 印 者: 中国电影出版社印刷厂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6.75 字 数: 162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京权图字: 01-2011-1727

书 号: ISBN 978-7-5086-3076-2 / D · 238

定 价: 39.00 元

---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

网 站: <http://www.publish.citic.com>

服务热线: 010-84849555

投稿邮箱: [author@citicpub.com](mailto:author@citicpub.com)

服务传真: 010-84849000

在过去十多年中，本书两位作者一直在Agentura.ru这家网站上撰写和编辑文章，持续关注着国际新闻领域最难驾驭也最危险的话题之一：俄罗斯情报机构。这项工作困难重重，因为俄罗斯情报机构非常庞杂，且十分谨慎地保护着它们的一切行动，因而其神秘色彩广为人知。这份工作又很危险，因为这些情报机构几乎容不得任何批评。

比如在2010年2月，该网站发布消息称，联邦安全局的新闻办公室，本来负责向在莫斯科的记者发放采访许可证，现在已经在官方授权下开始对记者们进行监听、监视。安德烈·索尔达托夫公布的《审查索引》中，第343条是联邦安全局局长亚历山大·博尔特尼科夫在2009年7月15日签署的。根据这一条款，更多的联邦安全局官员“有权申请发动反间谍措施，限制某些公民的宪法权利”。这涉及联邦安全局的援助计划处，该处负责处理与新闻界的关系。联邦安全局的新闻办公室——公共通信中心——就隶属该处。



序  
尼克·菲尔丁

这种侵扰他人的监视不断对记者们造成人身伤害：自 2000 年以来，已经有 17 位记者莫名其妙地死亡。只在一个案例中，记者被依法起诉。

在 Agentura.ru 网站最近公布的一段评论中，索尔达托夫总结目前的形势称：“俄罗斯的新闻媒体已经远离调查性报道，同时还在削减预算、裁减人员。在过去 10 年中，经验丰富的调查记者纷纷遭解雇，而调查报道部门也被裁撤。公共空间被逐渐蚕食，让形势更为严峻——甚至连政府部门新闻中心的大门也已紧闭。2000 年中期，联邦保卫局只允许在克里姆林宫拍拍领导人照片；俄罗斯最大的情报机构军事情报局，甚至根本没有设置新闻办公室；对外情报局自 1961 年以后拒绝就其行动发表任何言论；联邦安全局的公共通信中心则对媒体的任何采访要求置之不理。”

本书作者索尔达托夫与合著者伊琳娜·博罗甘都曾经在许多场合成为联邦安全局的重点关注对象。在过去 10 年中，他们一路走来，在揭露实情的同时也面临着受到惩罚的危险，这条路危机重重。他们在别斯兰人质事件和莫斯科剧院人质事件中的报道超越同侪，披露了俄罗斯情报部门在处理这两起悲剧事件时所出现的严重失误。

但更重要的是，他们的工作将光明不断投射到俄罗斯国家最深藏的隐蔽角落。在冷战期间，西方国家的情报活动曾经一度以监视克里姆林宫的一举一动为重点，但随着苏联解体，这些活动的重点转而成为应对所谓的“反恐战争”和西方国家对宗教激进主义者的高度关注。苏联解体后，俄罗斯马上陷入一片混乱。没有人能够预计事态将如何发展，更没人知道东欧阵营会走向何方。

从 1991 年克格勃解体到 1995 年联邦安全局成立，中间是整整 4 年的真空期。但随着俄罗斯逐渐适应了后共产主义时代，它开始重整旗鼓，其安全机构也得到加强。1998 年，总统鲍里斯·叶利钦任命前克格勃军官弗拉基米尔·普京掌管联邦安全局，从此肇始了一个新的时代。到 2000 年，普京当选总统后立刻着手重建情

报机构，并逐渐让它们手握重权。作为联邦安全局的前身，克格勃曾经是“国中之国”，但仍然要从属于苏共，但联邦安全局却已经在很多方面成为国家本身——其官员直接对总统负责，很多从该机构走出的成员现在已经掌握重权，并控制着这个国家的经济制高点。

普京掌权的10年中，联邦安全局的权力得到了极大的强化。该机构不但拿回了曾经被削减的权力，而且还将触角伸向了新的领域。联邦安全局已经形成一种以保护国家为职责的使命感，与沙皇时代的官僚机构相似，甚至有所超越。最重要的是，这家情报机构如今拒绝接受批评，也根本没有将民主放在眼里。在叶利钦总统时代，建立公民社会的努力曾经昙花一现，但现在几乎没有留下多少痕迹。

在过去10年中，关于俄罗斯情报机构的内容鲜有出版。而此类内容由俄罗斯记者写作并以英语原版出版的，更是前所未见。对任何一位想要了解俄罗斯秘密情报机构的读者来说，有两位作者在本书中对此话题进行百科全书似的知识讲授，这本书不可不读。

The  
New Nobility  
Paul Yellen on America's Secretive Super-elite  
Establishment of the New

目 录

序 // VII

第一  
部

**重掌大权**

它是一个独立机构，不受政党控制，亦脱离议会监督。如果说该机构也有意识形态，那这个意识形态就是致力于实现国家稳定与秩序。如今，效力于此的人们，不仅将自己看做克格勃的继承者，更自视为当年沙皇秘密警察的继任者……

引 言 // 3

第一章

**诞生：**  
**再造国家机器 // 9**

第二章

**高层：**  
**重塑国家安全 // 23**

第三章

**利益：**  
**间谍与国家利益 // 35**

第四章

**威胁：**  
**内部的对抗行动 // 49**

**监察：**  
**应对极端主义 // 65**

**新贵：**  
**权贵阶层的锦衣玉食 // 77**

**体育：**  
**与竞技运动的密切关系 // 87**

**前传：**  
**尤里·安德罗波夫的复兴 // 95**

**宣传：**  
**影像里的联邦安全局 // 107**

**秘密：**  
**99%不为人知的故事 // 123**

**监狱：**  
**地址、名字都不重要 // 131**

第二部

## 反恐档案

在历史上，克格勃应对恐怖分子的经验非常少，因为在苏联领土上几乎没有发生过恐怖袭击。克格勃曾经专注于搜捕间谍和持不同政见者。那些可以被称为恐怖主义的暴力行动，大多数都是由犯罪分子发起的。然而，新世纪一切都在变化……

**失误：**  
**莫斯科剧院人质事件 // 143**

## 第三部

### 深潜海外

他们对以色列人在海外追捕恐怖分子的行动印象深刻。对扬达尔比耶夫展开刺杀以后，一位联邦安全局中校问索尔达托夫：“看看摩萨德。我们为什么不能用同样的手段对付恐怖分子？”

**暗杀：**  
**远程绝杀敌对分子 // 199**

**情报：**  
**重点在前苏联加盟国家 // 215**

**黑客：**  
**复杂而隐秘的关系 // 227**

结 论 // 239

附录一 联邦安全局组织结构 // 243

附录二 联邦安全局的演变 // 249

致 谢 // 253

# THE NEW NOBILITY

The Restoration of Russia's Security State and the  
Enduring Legacy of the KGB

第一部

重掌大权





过去 10 年之中，俄罗斯联邦安全局 (FSB) 已继承了苏联秘密警察机构克格勃 (KGB) 的衣钵，在职权日益扩大的同时，也逐渐脱离了公众监督和议会控制，被扶植成了一个新兴的精英组织。一位出身自该机构的资深成员——弗拉基米尔·普京——在整整 8 年里担任俄罗斯总统，执掌着克里姆林宫大权。在这之后的数年中，他华丽转身而为总理，影响力未减分毫。联邦安全局预算几何，从未有过公开报道，其雇员数量也鲜为人知。不过，就算保守估计，该机构成员总数也远超 20 万。普京亲手将联邦安全局打造成俄罗斯最重要的安全机构，授意其整合原克格勃的众多分支，甚至赋予它在海外执行任务的权力，准许其收集情报、执行特别行动等。也是在普京的关照下，众多联邦安全局出身的前特工或现役成员，渗透进俄罗斯政商两界，使得该机构的成员，再现了克格勃时期那些偶像们的雄风，如苏联早期秘密警察机构“契卡”(Cheka) 的创始人费利克斯·捷尔任斯基，克格勃领导人中最著名的尤里·安德罗波夫等。

2000 年，普京当选总统，而当时的俄

The  
New Nobility  
The New Nobility: The Russian Security Services and Their Influence on Politics and Society

引言

罗斯秘密情报机构正处在风雨飘摇的危急关头。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举国沸腾，纷纷为市场经济改革和民主建设上下奔忙，情报机构遂被打入冷宫。那个年代的俄罗斯，新资本主义狂潮涌动，有时甚至残酷地席卷一切，原先情报机构中的少数精英顺应时势，赚得盆满钵满。面临如此诱惑，在很多情报人员眼中，自己的职位与官衙业已一文不值。能最终坚持下来的特工们，将奔赴众多前所未见的战场，直面危机四伏的新挑战。他们有的投身硝烟不绝的车臣，有的忙于应付日渐频繁的人质危机，就算留在莫斯科等远离车臣前线的大城市也一样疲于奔命，因为战争导致恐怖主义日益肆虐，祸水已蔓延到大城市。反观联邦安全局，其腐败程度甚至在苏联时代也是不可想象的，光是应付内部腐化就已令其不堪重负。而无法赢得公众信赖，更让联邦安全局的处境雪上加霜。民众的深切疑虑，追根溯源还是来自于苏联时代克格勃的行径，以及苏联解体后整个国家在最初10年里的一派乱象。又因为国家所能提供的权力和资源有限，联邦安全局特工和散布在各个不同机构中的前克格勃同僚们，为了多分得一杯羹，私下里争夺地盘，打得不可开交，台面上也不惜公开决裂。普京在这时站了出来，赋予联邦安全局一个更具风险的角色，那就是维持政权稳定（实际是为普京保驾护航）和国家安全。

历经上述变迁，仍不能误将联邦安全局看做克格勃重生。当然，根据原来很多持不同政见者的亲身经历、记者们的描述，以及安全机构的实际言行来判断，联邦安全局都神似当年的克格勃。然而，苏联时代的克格勃虽然权势熏天，但毕竟受制于整个政治体制：从上层到基层的各级克格勃机构，决策权都掌握在苏共手中。所以，苏联当局称克格勃是党的“先遣团”，并非毫无缘由。

相形之下，联邦安全局明显是一个独立机构，不受政党控制，亦脱离议会监督。如果说该机构也有意识形态，那这个意识形态就是致力于实现国家稳定与秩序。如今，效力于联邦安全局的特工们，不仅将自己看做克格勃的继任者，更自视

为当年沙皇秘密警察的继任者，被派驻各地，抵御政治恐怖主义。

接替普京入主联邦安全局的尼古拉·帕特鲁舍夫，在2000年底的一个纪念契卡成立的活动上，依惯例接受采访，并对联邦安全局的成员们作出如下评价：

我不想在这里堆砌华丽辞藻，但我的同僚们，个个都是人中龙凤，更是联邦安全局的荣誉和骄傲。他们兢兢业业，从不为钱而工作。当我为他们颁发政府奖项时，我仔细审视着每个人的脸庞。他们之中有知识、修养俱佳的情报分析员，有身体壮硕、满脸风霜的特种部队成员，也有沉默寡言的炸弹专家和心细如发的调查人员，更有谨慎沉稳的反间谍人员……他们每个人都与众不同，但所有人身上的又都具备同一种至关重要的品格：愿意为国献身。换句话说，他们是我们身边的“新贵”。

写作本书的目的，是为了揭秘“新贵”们的成长足迹，以及他们在过去10年中的贡献。安全机构的成员们，始终将自己视为力挽狂澜、对抗国家内外敌人的不二人选；面对已在20世纪90年代的剧变与混乱之中分崩离析的祖国，他们也认为只有自己才能拯救国家于水火之中。苏联时代，克格勃通过宣传影片，将自己描绘成知识精英，而今天的联邦安全局或许也继承了这笔遗产，认为自己才是最优秀、也最聪明的一群人，但现实却远较此更为复杂。联邦安全局在俄罗斯地位尊崇，却要面对恐怖主义和自身腐败等挑战，这使其迥异于苏联时期的秘密情报机构，也不同于西方国家的情报组织。在某些方面，它非常接近于阿拉伯世界一个冷酷的秘密警察机构——“穆卡巴拉”(mukhabarat)。该机构致力于维护专制统治，只听命于掌权者，行事隐秘莫测，内部腐败无比，对待有恐怖主义嫌疑的个人或组织，以及持不同政见者，甚至会毫不留情地采取极为残忍的手段。联邦安全局自然也不是什么遵守法制的典范，而且俄罗斯距离实现真正的民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普京治下，联邦安全局最引人注目的变化，是获得了境外行动特权。尽管在境外执行的秘密行动收效如何还有待商榷，但俄罗斯安全机构的势力范围，明显已经大为拓展，而且得到了来自国家层面的全力支持。

许多年来，联邦安全局的绿色制服一直与军队的服装相似。事实上，这两个机构是截然分开的，这是考虑到监督者和被监督者不应当混为一谈。2006年，普京又走出一步，签署命令将俄罗斯安全机构的制服从绿色变为黑色。这个属于黑夜的颜色，在俄罗斯安全机构中从来都不受欢迎，但普京作出这一决定却更多考虑了这种颜色的历史象征意义——这个暗示来自20世纪20年代，当时的俄国内战中，白军在与布尔什维克的战斗中日益处于下风，他们于是组建了一支军队，其官兵都身穿黑色的军装。黑色，有着强烈的宗教含义，且象征着他们对世俗的蔑视。谢尔盖·马尔科夫中将的这支军团声称自己是“僧侣骑士兄弟会，将为俄国牺牲自己的自由，并抛头颅洒热血”。这段历史至今仍然影响着在联邦安全局效力的人们。

追寻关于联邦安全局真相的道路困难重重，因为该机构极度机密，同时在政治集权统治下的俄罗斯，公开表达意见也将面临种种不确定性与危险。我们的工作几乎完全是通过外部调查进行的，我们到处搜寻所有可资利用的资源，以找到关于该机构各种行动的证据，但始终没有查阅到内部的官方档案。不过的确有安全机构内部的很多消息源愿意告诉我们一些情况，这让我们获益不少。

这本书的写作主要是基于我们从事记者行业的经验。我们花费超过10年时间报道、写作关于俄罗斯情报机构的内容。2000年，我们建立了网站Agentura.ru，这是一个以观察俄罗斯情报机构为主的新闻网站。就在过去几年中，我们已经被迫离开四家俄罗斯报纸，我们也不止一次受到联邦安全局的审讯。2005年，《莫斯科新闻》这家原本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最广受欢迎的自由派周报被易手，在经历

过变动之后已经和它原本的风格大相径庭。很久以前，我们都曾经在这家报社工作过。就在那年 11 月，我们正在寻找下一个选题。叶夫根尼娅·奥尔巴茨，一位著名的俄罗斯政治新闻记者，同时也是《克格勃：国中之国》这本书的作者，建议我们为在线杂志《伊杰尼夫尼杂志》(*Ezhednevny Journal*, 这是仅存的几家可以公开发表独立政治评论文章的媒体) 写一组关于安全机构重生的文章。那时的联邦安全局已经获得了电子监控的权力，有权进行政治监控，并且在联邦安全局的总部挂起了尤里·安德罗波夫的画像——他是担任克格勃领导人时间最长的一位。将联邦安全局和克格勃进行对比对我们来说颇具吸引力。很多人都感到克格勃极为冷酷，而且无处不在，这有赖于该机构在斯大林时期留下的名声：在国内实施无孔不入的监控，在国外进行众多引人注目的暗杀行动——包括 1978 年在伦敦毒死了保加利亚的持不同政见者格奥尔基·马尔科夫。这个苏联时代的秘密警察机构是如此庞大，以至于一些持不同政见者认为普京只不过是如今这个政权中很小的一部分，在苏联解体后克格勃重掌权力的更大计划中，他不过是一个傀儡而已。据此而言，强化联邦安全局权力的动作也被看成复活克格勃的另一个步骤。但根据我们的调查，事实远非如此。

2004 年，别斯兰人质危机期间，我们就在现场。当时，联邦安全局强攻一所被车臣恐怖分子控制的学校，共有 334 人在事件中死亡。我们见证了联邦安全局建立起新的间谍活动应对机制，在此机制下，几位俄罗斯科学家被指控为间谍，并被判处多年徒刑。我们也跟踪报道了俄罗斯秘密情报机构在海外进行活动时的攻击行动：2004 年在卡塔尔刺杀了车臣前副总统扬达尔比耶夫，还有在 2006 年到 2007 年间在阿塞拜疆、阿布哈兹等地发生的几起针对车臣人的刺杀事件。我们希望本书能够帮助读者了解，联邦安全局如何变成了它今天的模样。



The  
New Nobility

THE NEW NATION OF INDIA IS THE  
REBORN STATE OF THE REPUBLIC OF INDIA



THE NEW NATION

**诞生：**  
**再造国家机器**



克格勃，最初广为人知的名称是国家安全委员会，其势力在苏联时代曾经无处不在。该机构成立于 1954 年，发源于几个苏联安全组织。克格勃承担着十余项不同的功能：收集外国情报，守卫边疆，保护苏联领导人，打击谍报活动，清除持不同政见者，密切监控苏联人民生活方方面面的情况等，从教堂到军队他们无处不在。因为要执行许多任务，苏联领导层给克格勃划拨经费时非常慷慨，这些资金用来供养克格勃的军事力量以及优秀的特别行动小组。

克格勃的总部位于莫斯科，但作为斯大林时代的秘密警察机构，其组织结构被复制到俄罗斯境内的所有地区。任何一名有幸在俄罗斯境内旅行的外国人，都会被当地克格勃成员跟踪。

在苏联的大学、工厂或者研究中心，都有一个被称为“第一科”的安全部门。名义上，建立这些科室的目的是为了防范间谍渗透进苏联的体系当中。当第一科无间谍可抓时，他们就将注意力转向监控“集体的道德气氛”。他们会录下人们的谈话，记录各种流言飞语。第一科偶尔还会干预一下人们的家事。在

那个年代，谁要是有离婚和出轨等行为，都会失去国家的信任。这些行为如果被上报给领导，犯错者的事业就将被毁于一旦，而且作为一名苏联公民，他也将被禁止出国。

尽管克格勃的触角伸向四面八方，无孔不入，但它却在一个方面受到严格的限制：苏共一直在对其进行监督。克格勃的每一个分支机构，每一个部门，每一个办公室都有党组织，这些组织就像一个个窥视孔，国家可以通过它们来监视克格勃成员的一举一动。1959年通过的《克格勃指导原则》规定：“党组织……要求发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各级党组织和党员有权……向相关党组织汇报国家安全机构运作过程中的缺点和问题。”而苏共政治局因为在斯大林时代严重受损，决意严控克格勃这个秘密警察组织。

苏联官僚体制效率低下，克格勃也未能幸免。被派驻国外从事间谍工作的情报人员，从西方媒体上收集资料并撰写报告，并将其作为从“线人”那里得来的敏感情报发回国内。而且这些被派驻国外的人员并不都是最聪明和最优秀者。克格勃内部也存在着几乎毫无掩饰的裙带关系。人脉最深厚者往往能够获得提拔。苏联社会精英的子女在意识到被派驻西方国家的好处后，想方设法排挤训练有素的特工们。苏联军队内部的克格勃成员，其任务原本是要找出高级军官中的贪腐人员，但他们往往本身就是贪污分子。

克格勃组织当中，内部权力斗争成风。对外情报局，也叫做第一总局，是一个权力巨大的克格勃分支，他们对其他的反间谍部门官员不屑一顾。这个总局的成员们认为自己见多识广，因为经常可以与外面的世界接触。而在他们看来，反间谍机构的成员们则目光短浅，如同井底之蛙。克格勃并不是铁板一块，而是在内部矛盾、嫉妒和冲突之下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

克格勃内部自相残杀似的斗争，都被这个机构及其神秘的气氛所掩盖。在

勃列日涅夫治下，苏联体制已经日益显出难以为继的迹象。这时，克格勃主席尤里·安德罗波夫蓄意宣扬出一个神话般的说法：只有克格勃没有受到腐败侵袭，且有能力挽救国家。安德罗波夫是克格勃历史上在任时间最长的主席。1982年，当他掌握苏联大权后，小心翼翼地培育着一个理念，即克格勃的成员都是聪明人，而不是残酷的秘密警察。他在扩大克格勃经济职能方面表现出了出奇的热情和兴趣，但这个领域原本与情报机构风马牛不相及。他这么做透露出了想要组建自己的团队，以掌控这个国家的野心。为了打破苏联停滞不前的局面，安德罗波夫就任苏共总书记后，将注意力集中在强调工作纪律上，并采取措施钳制腐败行为，但在其短暂任职期间，未收到丝毫效果（他执政尚不足两年）。尽管如此，苏联在1991年解体后，关于克格勃的神话却流传了下来。

就在苏联解体前，那场发生在1991年的企图推翻戈尔巴乔夫的政变中，策划者中就有克格勃的领导人弗拉基米尔·克留奇科夫。鲍里斯·叶利钦这位满头银发的民主运动偶像，该年早些时候已经当选俄罗斯共和国总统，此刻站出来直面政变的策划者。在政变事件之后的一段时间里，叶利钦小心应对克格勃。他的目的是将该机构分割成一个个独立的小型机构，来削减其权力。人们普遍认为，控制情报机构的唯一办法就是严格划定其权责范围，禁止其在国内从事情报活动，也不许在国外进行反间谍工作。

苏联解体后，这个国家的前途扑朔迷离，叶利钦并不情愿将克格勃彻底瓦解。

在位于莫斯科市中心的卢比扬卡广场，克格勃机构庞大的总部里，对整个机构可能会被彻底瓦解的恐惧气氛十分明显。1991年8月23日，克格勃的领导

人们忧心忡忡地眼见大群莫斯科人，将列宁时代的第一位情报机构负责人费利克斯·捷尔任斯基的雕像推倒。

接下来的一年，克格勃开始变得史无前例的公开而透明。克格勃的工作人员欢迎人权活动者查阅那些在斯大林年代被镇压者的档案。克格勃官员开始在电视台的访谈节目中露面，这个秘密情报机构的领导层，甚至开始邀请一些持不同政见者去参观卢比扬卡广场的克格勃总部。

克格勃向许多人打开大门，让他们查阅记录几十年镇压历史的秘密档案，而他们从未梦想过这一天会真的到来。尼基塔·派绰夫这位人权组织“记忆”(Memorial)的历史学家回忆了自己第一次受邀前往莫斯科郊外小镇库切诺的经历，他第一次参观了这个秘密情报机构存放档案的地点。克格勃的档案保管员看到他出现在自己面前时，也目瞪口呆。“看到我穿着衬衫和牛仔裤，出现在他面前，他十分吃惊。在此之前，甚至来自克格勃总部的参观者都极少。”派绰夫说道。克格勃甚至建议让一些人权活动家参与到这一变革当中。谢尔盖·格里戈里扬茨，是一名苏联时代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曾在监狱里度过9年时光。现在他也受邀加入克格勃监督委员会，但他拒绝接受这一邀请，因为害怕自己的名声遭到利用。

1991年底，苏联解体，克格勃得以重建。原来最大的一个部门安全部，后来改为联邦反间谍局(FSK)，最终成为联邦安全局。该部门负责反间谍和反恐工作。克格勃原先的对外情报总局，被改编为一个新的间谍机构，叫做对外情报局。原先克格勃负责监听与密码系统的部门，被改组成了联邦通讯与信息局。一个相对不太为人所知的部门，也就是负责保卫地下秘密设施的部门，仍在继续发挥作用，只是换了一个新名头：总统特别计划总局。原先克格勃负责保护苏联领导人的部门，现在被改名为联邦保卫局，而原来的苏联边防军被转变为

独立的联邦边防局。

上述变化的结果是，新的反间谍机构联邦反间谍局（1995年以后成为联邦安全局）被剥夺了在境外执行情报行动的职权。这个机构已经不再负责保护俄罗斯领导人，甚至失去对地下设施的掌控，它们现在都归总统直接管辖了。但该机构在军队内部名义上还是存在的。这个组织被塑造成为有点类似于英国军情五处的机构。

同时，苏共对克格勃的控制也烟消云散。针对这一情况，叶利钦的回应是，在这些已经被分割瓦解的机构之间制造矛盾，以形成一种并不稳固的节制与平衡系统。在叶利钦治下，对外情报局与军队内的情报机构仍然保持着直接竞争；联邦安全局与联邦通讯与信息局互不相让，而后者对俄罗斯政治与社会状况保持着密切监控。当联邦安全局的领导向叶利钦提交一份报告之后，叶利钦还会将之与联邦通讯与信息局领导提交的报告两相比对。负责通讯管理的这家机构显得更为重要，因为它控制着核心电子选举计票系统，并在背地里向克里姆林宫通报实时的选举结果预览。1993年，一个新的机构诞生了，它就是税务警察局。该机构的功能是应对俄罗斯税收灾难性低下的问题。税务警察局与联邦反间谍局，也就是后来的联邦安全局内部负责经济安全的部门之间，产生了激烈竞争。同时，负责保护总统的新机构，被其负责人亚历山大·科查夫（叶利钦的前保镖）改造成了一个被许多人称为当代禁卫军的机构。该机构还雇用了一些灵异分析师和通灵人士，为叶利钦提交预测和分析报告，而这些工作都是越过联邦通讯与信息局以及联邦安全局的。

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他因为动用武力压制波罗的海各国、阿塞拜疆和格鲁吉亚的独立运动而广受批评。最终，铁腕政策并没有改善这些地区的局势，

反倒加速了苏联解体。与之相反，叶利钦早在苏联仍是权力核心时，就敦促这些动荡不安的地区从苏联手中接掌更多权力。但等他成为俄罗斯总统后，立刻开始与分裂势力对峙。

1992年，叶利钦在北高加索的印古什—奥塞梯冲突中面临一场危机。印古什人攻击了奥塞梯人，并引发对方的报复行动。叶利钦调派俄罗斯军队支持奥塞梯人。这次行动引发俄罗斯领土上的第一次大规模的种族清洗，印古什家庭被驱逐出存在争议的普里格罗迪尼地区。根据“人权观察”组织1996年的一份报告，“俄罗斯官员向北奥塞梯当局提供了大量武器，后者将其提供给北奥塞梯安全部队，以及准军事组织和民兵……俄罗斯军队要么协助进行了印古什的撤离工作——‘有礼貌’但确实是强迫撤离——要么打头阵，攻击被印古什军事人员占据的村庄，将平民与军事人员都驱逐了出去。”

俄罗斯安全机构高层以及叶利钦都认为这次冲突的结果是一个迹象，表明北高加索的民族关系紧张，可以通过武力有效解决。

但在1994年11月，这一招数却导致了一场灾难。当时的车臣共和国领导人步步紧逼，要求从俄罗斯独立出去。安全机构（当时是联邦反间谍局）秘密策划组织了一次行动，对车臣首府格罗兹尼展开进攻，并将其伪装成车臣反对派的军事行动。所有参加这次行动的人员都是从俄罗斯军队中招募的，还有一部分是联邦反间谍局雇来加入行动的俄罗斯坦克兵。根据安德烈·鲁萨科夫上尉、阿列克谢·拉斯托博卡中尉、亚历山大·施哈列夫上尉等人的目击证词，他们是被自己所属军团的联邦反间谍局官员招募的，这名官员将他们介绍给两名来自莫斯科的反间谍官员。这两名反间谍官员向这几名坦克部队的军官提供了一份参加此次行动的合约，但仅有的一份合约还被保留在联邦反间谍局官员手中，说是出于“安全考虑”。应招的军官和士兵被转移到北部奥塞梯的小镇莫

兹多克，他们被部署在那里，装备给他们的坦克上没有部队番号。这三支坦克纵队伪装成了车臣反对派武装，并在 11 月底被派遣到格罗兹尼，向车臣分裂分子的首领杜达耶夫展示军力。杜达耶夫是一名前苏联军队中的将领，但其要求车臣独立的野心日益明显，甚至开始挑战叶利钦的权威。

谢尔盖·科兹洛夫是一位长着小胡子、身材矮小但非常称职的军人，他以前在特种部队做军事情报工作，他说话直截了当。据他回忆，1994 年底时，有人找到他请他参加这次行动。他告诉本书作者，他们在联邦反间谍局的敦促下入伙，带领由 40 名退役军官组成的小队，负责到格罗兹尼进行侦查和分散敌方注意力，而他得到的报酬只有 1 000 美元。“这种情况下，这笔钱也就够支付我的葬礼。”科兹洛夫说道。因为考虑到这次行动不过是展示一下军力而已，坦克中队没有进行预先的侦查工作，也没有进行任何伪装就开赴车臣首府。所有的坦克都配备了额外的燃油——这一措施是为了应对长途跋涉，如果预见到会有战斗，这其实是不需要的。11 月 26 日，这支改头换面的“反对派武装”遭到车臣人的伏击，坦克在车臣街头被烧成废铜烂铁。少数幸存下来的军官被车臣武装分子俘虏，最后被车臣政府打发走了，因为他们声称是被不明武装力量招募的“雇佣军”或“志愿者”。这次事故导致克里姆林宫对联邦反间谍局的能力产生严重质疑。

1995 年，当联邦反间谍局被重命名为联邦安全局后，该机构在打击俄罗斯有组织犯罪方面再次遭遇重创。1996 年，联邦安全局内部成立了一个秘密分支，负责起诉黑社会性质的团伙。这个机构臭名昭著，是情报机构当中最残忍、最野蛮也是最腐败的部门。（据说，该机构获准在打击犯罪行动过程中使用各种残酷手段。）1998 年，一些官员于 11 月 17 日在莫斯科召开新闻发布会，声称他们受命杀死了著名的俄罗斯寡头鲍里斯·别列佐夫斯基，之后该机构就被解散了。

作为此次事件的后果之一，当时联邦安全局的负责人尼古拉·科瓦廖夫也丢掉了自己的职位。

也是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两个权力巨大的安全机构之间爆发激烈竞争：联邦安全局的一个调查分部指控通讯局金融部门的负责人瓦列里·莫纳斯特列斯基少将存在贪腐行为。联邦安全局调查部启动了一项犯罪调查，以调查莫纳斯特列斯基是否接受了西门子-尼克斯多夫公司的 150 万德国马克，并给对方提供一份获利颇丰的合同。然后，据可信的消息源告诉本书作者，这次调查并不是针对瓦列里·莫纳斯特列斯基的，而是针对他在通讯局的上司亚历山大·斯塔罗沃伊托夫。这次指控也被透露给了俄罗斯新闻媒体。但叶利钦更愿意站在通讯局的一边，以保证在 1996 年初进行的总统选举中，能随时接触到电子选举计票系统（该系统由通讯局掌控）。更进一步讲，叶利钦相信，在这两个机构之间存在健康竞争，将使它们更易于控制。

这一并不完美、变化无常的体系，在叶利钦执政的晚期蹒跚前行。1998 年 7 月 25 日，叶利钦指定在克里姆林宫默默无闻、来自圣彼得堡的老牌克格勃弗拉基米尔·普京担任联邦安全局新任局长。当时的普京饱受质疑，部分原因在于他长达 16 年的克格勃生涯中，从来没有担任超过中尉以上的职务，而且在苏联重建和走向开放的混乱年代中，他却在德国执行任务。

这几年是俄罗斯最喧嚣的年代。1998 年，俄罗斯出现债务违约，而且随后将卢布贬值，导致上百万人破产，西方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也开始遭到怀疑。俄罗斯人希望找到一个简单的答案，而许多人开始期盼一位强人替代日益显出优柔寡断、软弱性格的叶利钦。人们对一位决绝领导人的期盼在 1999 年 9 月时机成熟。当时莫斯科的两栋居民楼被炸，共有 216 人死亡。当时的总理普京将这一事件的策划者指向车臣人，并誓言要“以牙还牙、迎头痛击”。他的强硬言

论很快让其广受欢迎，他也随之在车臣发动了又一轮军事行动。

当叶利钦在 1999 年新年前夜辞职后，普京这个在克格勃盘桓近 20 载，其思想已经深深刻上克格勃烙印的人，成为代理总统。现在，“第二幕”的场景已经被设定，这些安全机构将倾其全力保卫俄罗斯。

普京上台后，就开始出现谣言，说克里姆林宫正在准备将原来克格勃的各个分支重新组成一个特别机构。当叶利钦时代俄罗斯秘密机构的创始人们一一被解职后，这一猜测似乎得到了印证，这些人都是中立派，而且惯于不惜代价维护自己所在机构的组织利益。1998 年 12 月，通讯局的创始人亚历山大·斯塔罗沃伊托夫被逼出局。1999 年 2 月，税务警察局的创立者谢尔盖·阿尔马佐夫，在重重压力之下，被迫辞职。2000 年 4 月，对外情报局局长维亚切斯拉夫·特鲁布尼科夫也被迫下台。

这些行动之后，是 2003 年的一次重大重组。当年 3 月，普京废除了税务警察局、通讯局和边防警察局等独立机构。边防警察局并入联邦安全局。税务警察局从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一直比其他机构都更加积极。他们创造出自己的管理文化与价值观念，是俄罗斯安全机构中第一个赞助拍摄电视剧来提升自身形象的机构。这部电视剧叫做《马洛塞卡大街 12 号》(Maroseyka 12，片名是该机构的总部所在地)，邀来俄罗斯的著名影星扮演税务警官。尽管税务警察名声不佳，但这部电视剧却颇受欢迎。

2003 年，税务警察局的所有成员被重新部署，以填充一个新的机构。该机构的工作就是打击毒品交易，由前克格勃特工、普京的好朋友维克托·切尔格索夫担任领导。(切尔格索夫很出名，因为在克格勃任职期间，负责对最后一批苏联时代的持不同政见者提起诉讼。) 税务警察局和切尔格索夫本人，

在打击毒品交易方面都缺乏经验。毫不意外的是，这个新成立的机构立马开始控告销售克他命（一种仅用于动物的麻醉剂）的兽医和在郊外别墅里种了点罂粟的莫斯科人。

联邦安全局过去最强大的竞争者联邦通讯局被分割，一部分并入联邦安全局，另一部分并入联邦保卫局，后者负责保护克里姆林宫领袖们的安全。在 12 年中，联邦通讯局已经建立起一个产业帝国，专注于信息安全。20 世纪 90 年代，该机构负责颁发信息安全软件经营许可——这些软件包括防火墙、加密软件等，并利用这一特权将许可证和政府合同授予了自己旗下的公司。（它甚至曾尝试过控制俄罗斯的股票交易所、银行国际代码和俄罗斯境内的互联网业务，但最终未能得逞。）该机构为自己的行为辩护称，互联网这个来自美国的新事物，在俄罗斯有必要由其掌控。1996 年，时任联邦通讯局副局长弗拉基米尔·马尔科门科将军在国家杜马作证表示，“互联网是对国家安全的威胁。”

2003 年，联邦通讯局帝国垮塌了，联邦安全局将这个原先的竞争对手最重要的部门归并旗下，这个部门就是海外电子情报部。

第二个受惠者是联邦保卫局，该局被指派管理政府通信线路，并掌管分析框架以提供“针对社会问题”的相关服务。

在普京掌权期间，联邦安全局的权力超越了内务部，后者既是国家警察机构，又是类似于美国联邦调查局的调查部门。联邦安全局在内务部的关键岗位上都安插了反间谍官员，职务从副部长到内部治安局（该机构负责监督内部违法行为）局长不等。表面上看，这样的安排是为了加强这个腐化不堪的机构内部的纪律与道德，但安插联邦安全局成员的更重要的目的是为了加强安全局对内务部的控制。最终，在 2003 年，一位联邦安全局将军，也是尼古拉·帕特鲁舍夫

(时任联邦安全局局长)的朋友拉希德·努尔加利耶夫被任命为内务部部长。

克里姆林宫的掌舵者普京，将联邦安全局恢复为部队士气的监管者，让该机构负责时刻监督可能出现的军队哗变。2000年2月，普京签署了新法案《武装部队中的联邦安全局处级单位规定》，扩大了安全局在军队当中的反间谍职能，也赋予它打击有组织犯罪的权力。普京的这项法令进一步加强了安全局官员在部队中的职权范围，让他们负责发现对政权可能产生的任何威胁。除了专业职权外，他们还要负责打击“非法军事组织，犯罪组织，以及图谋暴力推翻现有俄罗斯联邦政治体制、暴力夺取权力和暴力阻止权力实施的个人及公共团体”。联邦安全局的权力得到大大的加强。

该机构的扩张之路，并不全是通过吞并的方式。当联邦安全局无法将对外情报局归并进来时，它自己建立了带有地方分支机构的部门，负责收集海外情报。该部门被官方称为“对外情报机构”，归属于联邦安全局负责分析、预测和战略策划的主要分析部门。这样，联邦安全局进入了原本被对外情报局和军事情报部门独占的领域。

上述重大调整的策划者都有朋友关系，他们曾经在联邦安全局位于圣彼得堡和邻近城市卡累利阿的地方部门任职。这些人包括普京、帕特鲁舍夫、努尔加利耶夫、切尔格索夫等。其他的参与者还包括克里姆林宫总统办公厅的负责人和主要的人事部门负责人维克托·伊万诺夫，另一位克里姆林宫总统办公厅副主任、曾经在2000年至2008年间负责秘密情报工作的伊戈尔·谢钦等。他们全都相互扶持，并提携手下，而这些人最后都成为联邦安全局核心部门的成员。这群人被称为“彼得人”(来自圣彼得堡的人)。

即便在叶利钦想方设法通过制衡的方式让安全机构易于掌控的年代，联邦安全局也在不断强化权力并获得更大范围的职能。之后，在普京的手下，联邦

安全局成功超越其他安全机构。普京掌权几年后，联邦安全局已经不受议会节制，也没有其他竞争对手。联邦安全局不是克格勃的再生，而是进化成了一个更强大的机构。这个机构在前克格勃成员的庇护下，远远超越了其前任所达到的高度。



The  
New Nobility

THE NEW NOBILITY. THE NEW CHAMPIONSHIP OF LEADERSHIP.  
© 2010 The New Nobility,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第二章

## 高层： 重塑国家安全



苏联的解体，对供职于克格勃的成千上万人来说，不啻一场个人灾难。绝大多数克格勃成员之所以加入克格勃，并不是受到理想的鼓舞或者受到无所不能的苏联秘密警察的魅力吸引，他们图的是稳定而收入优厚的职位，而且永远不会遭到辞退，还有退休金、医疗保障和住房。对很多人而言，克格勃的工作像是一个家族生意，能传承几代人。在克格勃的内部，成员们生活在充满熟人的世界里，他们已经习惯了等级森严的秩序，与卢比扬卡总部高墙外的世界已经隔离开了。这个秘密警察机构的文化限制成员与外界接触。但在 1991 年，很多前克格勃成员为苏联的解体而哀痛欲绝，很多人不知道如何在新的环境中生存。他们最担心的事情是会失去国家早已保证提供的住房、薪水、医疗保障和退休金。在一个新时代到来的时刻，前克格勃成员们惊恐不安地面对着市场经济的崛起。

在苏联解体后最初的几年里，资本主义抬头，而很多克格勃退役人员发现他们的技术和知识在这个环境中还相当有用。最缺人的是那些私人保安公司，

因为在当时的俄罗斯，生意上的纷争经常是通过街头暴力方式解决的。这其中包括阿尔法特种部队的战士，因为他们在人身安保方面的经验无可置疑，而且他们擅长搏斗。还有一些监控专家和监听专家也颇受欢迎，因为他们能够帮助公司窥探竞争对手的机密，而且还能防止对方的商业间谍行为。前克格勃军官最受那些保安公司青睐。这些公司的结构几乎就是原来克格勃的那一套——也分不同的部门，只是规模小得多。

那些留在安全机构中的人，要么是出于爱国，要么是害怕在那个混乱的时代重新创业风险太大，或者两者兼具。但他们很快也受到了新资本主义的召唤。曾经被训练来保护俄罗斯的克格勃成员们，如今在利益诱惑下开始保护俄罗斯的大亨——那些寡头们。对这些人而言，他们意识到利用安全机构远比自己养活安保人员划算。雇用了这些前克格勃成员的人，常常也对受雇者的朋友以及易于接近安全机构的地位很感兴趣，因为那些受雇者都参加过保护大人物的行动。

又一波的法律失范席卷了所有人——商人、新的安全机构、政府官员以及代表国家的情报人员。对一些生意人来说，付钱给联邦安全局或者内务部来监听竞争对手的电话，比自己去干这些事情要划算得多。

而那些没有背弃国家的人，眼见前同事们将豪车停在总部外时，内心的妒忌被点燃。当诚实的官员被迫遵守腐败将军的命令时，联邦安全局的士气也变得一蹶不振。普通的职员在工作时如同梦游。（人们都知道，一些负责招募特工的官员，直接要求自己朋友的孩子填写表格，完成招募程序，为的就是给这些孩子提供一些宝贵的特权，比如接受良好的英语教育。）随着士气下滑，联邦安全局的领导层想尽一切办法恢复已经在1993年被解散的调查部，到1995年，成功让该部重建。至此，联邦安全局既拥有情报机构的职能，也拥有执法机构

的职能，可以对商人的违法行为展开调查。实际上，这为腐败官员提供了更多的敛财机会，他们不仅可以展开调查，还能帮助商人们对付其竞争对手。

从这个安全机构内部的人来看，似乎只有严格甚至残酷的国家控制才有可能遏制住联邦安全局的内部腐败问题。逐渐清醒过来的联邦安全局成员们，开始着迷于中国快速发展的市场经济。20世纪90年代末期，这些官员在普京的领导下看到了希望，想要复兴他们记忆中的苏联秩序。对那些寡头们（他们当中许多是犹太人）挥之不去的愤恨，已经表现得日益显著。（在叶利钦时代，在卢比扬卡总部里常常听到的一句抱怨是“犹太人出卖了俄罗斯”，这反映出一种焦虑，认为大亨们将总统玩弄于股掌之间，是他们导致整个国家的经济低迷。）

那些留在国家安全部体系中的人们，将自己所在机构中将军的腐败行为，归罪于20世纪90年代初的激进民主主义者，正是他们将克格勃分割，并导致安全机构和国家实力被削弱。这些民主主义者中，许多人都与苏联时代的持不同政见者关系紧密，因而卢比扬卡将这些人看做西方情报机构的傀儡，是西方摧毁俄罗斯的整套计划中的一环。

这些安全机构的成员，其眼界毫无疑问十分褊狭且自以为是，导致这种情况的原因根植于该机构的组织结构。联邦安全局由两个并不对等的部分组成：一个是总部，其人员一直就只有区区几千人；另一个是地方分支机构，总共雇用人员据估测有数万人。尽管总部已经非往日样貌，但地方分支机构的组织结构却在过去几十年来毫无变化。今天，这样的系统可能导致联邦安全局变得眼界狭窄。这些观念陈腐的地方国家安全机构不断地从内部改变联邦安全局，这正是源于该机构的人员轮替系统：校官和将军们从一个地方机构调任到另一个，最终会得到一份在联邦安全局总部的核心职位。总部里挤满了从地方上提拔起来的官员，其狭窄的眼光并未因为职位有所改变。

俄罗斯东正教堂也同样帮助培养了联邦安全局的这种排外倾向。近年来，联邦安全局和教堂走得很近。2002年12月，位于卢比扬卡广场附近的索菲亚大教堂重新开放，距离联邦安全局总部只有一个街区。帕特里亚尔基·阿列克谢二世亲自为教堂的开放仪式祈祷，而到场人员中就包括联邦安全局的负责人尼古拉·帕特鲁舍夫。

尽管在苏联时期，东正教曾经是克格勃的打击目标，但教堂与国家保持着紧密联系。俄国沙皇也是东正教的首领；俄罗斯东正教信仰的认识基础在于，莫斯科是“第三罗马”（前两个分别是古罗马、君士坦丁堡），而且俄罗斯是独一无二的。正因为“独一无二”，所以俄罗斯认为自己被无数敌人包围，而联邦安全局必须与之战斗。正是出于这种情绪，俄罗斯东正教总是怀疑天主教在谋求扩张。2002年，5名天主教牧师被联邦安全局驱逐出境，其中有几人被指控有间谍行为。联邦安全局帮助东正教保护自己的势力范围，以防止西方的宗教渗透。作为回报，教堂也支持着安全机构打击国家敌人的行动。

在苏联时代，克格勃成员是精英阶层的一部分。苏联解体，俄罗斯进入新资本主义时代后，克格勃官员们崛起成为商界领袖。但他们却竞争不过那些精明能干、办事利索的年轻人：新一代的寡头。相应地，前克格勃成员们在新经济体制中的第二、三层次上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为那些大亨们的帝国负责经营安全部门。他们已经不再是宇宙的统治者，而开始为新富阶层服务。

普京提供的机会让这一代安全机构退役的成员们可以重新爬上权力顶层。现在他们的触角已经从电视台伸向了大学，从银行伸向政府各部，但他们却很少以其真实身份示人。他们西装革履，行走在权力潮汐之间——有时情报机构的特工们是被利用者，但有时他们是渗透者。

俄罗斯有一句谚语，“根本不存在所谓的前克格勃成员”，这句话透射出的真相可不只一点点。许多官员本应该退休了，却以活跃特工身份被安插在商界、媒体和公共领域，仍然受联邦安全局指挥。有人发明了一个专门的委婉说法，用来指代这些特工：活跃储备特工。这个称呼历史悠久，从 20 世纪 20 年代沿用到 90 年代。1998 年，活跃储备特工被重新命名为“机构附属特工”，但其本质并没有变化。

一名处于活跃储备状态的特工，其身份被看做国家机密。法律禁止对其进行曝光。这支由联邦安全局成员构成的隐秘部队从不向外界社会公开其身份，他们完全以掩护身份在各种组织内部工作，向联邦安全局高层汇报情况，同时积极招募新成员。这些人的总数可能数以千计。

众多令人吃惊的事例中的一个事例是，联邦安全局将一位官员安插到了一家大型电视台的显赫位置。2002 年 6 月，前联邦安全局发言人、曾经在军队中担任反间谍官员，也是联邦安全局最重要的官方历史学家亚历山大·兹达诺维奇将军被任命为俄罗斯国家广播电视台公司（首字母缩写为 VGTRK）副董事长。该公司拥有几家电视台和电台，其中包括俄罗斯最重要电视台的“第二频道”。起初，据传兹达诺维奇是负责公司安全工作，但之后不久人们才得知，他的权力远不止于此。

2002 年 10 月，当莫斯科一家剧院正在上演音乐剧《东北风》时，车臣人将观众扣为人质。实际上是兹达诺维奇告诉转播人员如何掩盖这一事件。在这次危机高潮时期，兹达诺维奇是营救行动的正式参与者之一，他一手参与安全机构的决策，另一手控制着新闻媒体。2004 年 9 月，在北奥塞梯的别斯兰学校人质事件中，本书作者在强攻行动开始前两个小时，在别斯兰街头遇到了兹达诺维奇。他在安全机构的邀请下，来到危机现场，尽管他在电视台工作。2004

年 12 月，兹达诺维奇因为让电视台来为克里姆林宫处理敏感事务，受到普京的嘉奖。后者签署了一份文件，祝贺兹达诺维奇“积极参与了车臣总统选举中的信息支援工作”。

在后来的许多年中，兹达诺维奇负责监督制作电视节目，盛赞联邦安全局的功绩。2005 年到 2006 年，讲述联邦安全局特工在街头执行监控任务的节目《秘密卫士》播出。这个节目在“第二频道”播映，制作过程中得到了联邦安全局的协助。

这样的情况远不如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相对自由，那时的私人电视频道独立电视台（NTV）还敢直面当局，未经审查就播出关于第一次车臣战争的报道。但现在，有了兹达诺维奇和其他人，普京及其安全机构就可以直接影响数千万俄罗斯人在电视上看到的内容。

并不是所有被置于活跃储备状态的联邦安全局特工都能够有如此显赫的职位。很多人故意避免引人注意，但他们还是拥有一定的权力。其中一个例子是米哈伊尔。他 50 多岁，长相明显是亚洲人，不拘礼节，衣着朴素。他看上去一点儿都不像一位联邦安全局上校。他是鞑靼人，年轻时充满理想主义，志愿加入了克格勃。

从业之初，他的职责是关注乌兹别克斯坦的伊斯兰运动。苏联解体后，他被调往莫斯科，在联邦安全局的中央机构供职，他的专长在反恐部门得到了发挥。（虽然他有鞑靼人的名字，但他在人前以“米哈伊尔”这个俄罗斯名字出现，他已经厌烦了那帮排外的同事们。）他参加了第一次车臣战争，然后又被调回莫斯科；2000 年中期，他被提升为上校，并作为活跃储备官员被派往莫斯科市政府，监督该市对穆斯林的政策。白天，他在市政府的工作就是处理类似于在哪里建清真寺，如何处理鞑靼人与阿塞拜疆少数族裔之间的紧张关系等诸如此类

的工作。同时，他私下里在这些少数族裔社区招募特工，监督穆斯林动向，收集情报，向联邦安全局汇报。

联邦安全局继承了克格勃时代的一个规矩，那就是活跃储备官员只能有一份工资。如果他在联邦安全局的工资要高于自己所潜伏的公司里的工资，他可以保留这个差额。但如果他在联邦安全局的工资要低，则他必须将差额交公。如果他不打算遵守这个规矩（多数情况下都是如此），他可以选择拒绝接受联邦安全局提供的工资。

按照联邦安全局的规定，他们被派往一家公司工作后，仍然需要效忠于这个安全机构。但是，许多在俄罗斯资本主义快速成长年代转为活跃储备官员者，都变得更加忠于他们所供职的待遇优厚的公司，而不是安全机构。在一些情况下，他们甚至将公司看做自己最重要的老板，而将联邦安全局视为自己“口袋里的东西”——一个可以提供宝贵数据和人脉资源的地方。

还有一些被派往小公司的官员，多数是上校或者少校，则在很大程度上保持着对联邦安全局的忠诚，也从未放弃他们在安全局的工资，因为这些人还是希望在安全机构中发展自己的事业。形成反差的是那些处于活跃储备状态的将军们，这些人受到最大的公司和银行追捧，收入丰厚，他们常常很快就忘记了自己在安全局相对微薄的收入。他们变成了商界在安全局内的影响力巨大的代表。这些人多数年纪 50 多岁或者刚过 60，他们在做事情时心里非常清楚，自己在情报机构中可能永远也不会再有什么前途了。

这种安全机构军官之间存在的代际矛盾导致分裂，年轻军官们看到年长者们大发横财，变得越来越不甘心。上校和少校们开始质疑一项旨在维护将军们利益的政策。一位匿名的处于活跃储备状态的安全局上校对本书作者讲：“主要

的问题是对双薪的旧观念。我被派遣潜伏下来，而且不得不在做完自己正式工作之后，还要为安全局做事，经常在半夜去和其他特工接头。我凭什么不能拿双薪呢？（这个规矩）是由安全局的领导秘密制定的，甚至都没有在司法部备案，所以根本没办法挑战它。”

或许没有人比普京更了解活跃储备制度了。在冷战的最后几年中，普京在民主德国为克格勃工作。1990年他回到苏联之后，被转入活跃储备，进入列宁格勒大学。第二年，他被调往著名的民主人士、列宁格勒市长阿纳托利·索布恰克的办公室。1991年8月20日，他才从克格勃退役。

普京成为总统后，安全局的人员开始进入商界、政界，规模远远超过为联邦安全局工作的活跃储备人员。普京帮助很多在克格勃或其他机构工作过的人扫清道路，让他们直接获得高层职位。这些人被称为西洛维奇，他们的级别在普京当总统期间迅速提升。比如伊戈尔·谢钦，他曾经在军事情报部门工作，后成为副总理和巨型国有石油企业俄罗斯石油公司的董事长。谢尔盖·伊万诺夫，曾在克格勃的对外情报部门工作，后来成为副总理。普京当总统期间，前克格勃特工维克托·伊万诺夫成为克里姆林宫的总统办公厅副主任，后来他又被提名领导禁毒部门。弗拉基米尔·舒尔茨曾经是前任联邦安全局副局长，后来也成为俄罗斯科学院的领导之一。俄罗斯商业帝国阿尔法集团的电信业务负责人阿纳托利·普罗岑科，曾经是前联邦保卫局的副局长。苏联时代的前驻纽约情报官弗拉基米尔·亚库宁成为世界上最大铁路网之一的俄罗斯铁路公司总裁。前联邦安全局经济安全部领导人尤里·少斯托夫谢夫，被任命为俄罗斯发展与对外经济事务银行副董事长，这家银行是俄罗斯政府用来管理国债和退休基金的。

亚历山大·佩列雷金将军在这个灰色地带曾经有过最为神秘的职业经历。

他在苏联时代的克格勃开始自己的事业，起初是为监控工作提供技术支持。20世纪90年代初，他成为联邦安全局莫斯科分局副局长。在90年代末期，他成为莫斯科市长尤里·卢日科夫的安全顾问。现在还不知道他何时或者是否已经离开联邦安全局，但值得注意的是，他经常出现在权力政治与商业的交汇地带。在访问拉脱维亚多次之后，他被拉脱维亚人指控为干预该国政治，并在2000年11月，被拒绝发放入境签证。他后来成为莫斯科地产界大腕。他被任命为莫斯科建筑投资计划部的副部长。他成为情报机构和开发商之间的中介，帮助解决最敏感的问题——购买之前由情报机构拥有的土地。这门生意让他获利颇丰，因为莫斯科的地产价格在20世纪最初10年里，可与纽约和伦敦比肩，而从斯大林时代开始，俄罗斯情报机构就被授予了该市核心位置的大量土地。在这次任命和其他几个职务上，佩列雷金在国家与商界之间长袖善舞，游刃有余。在这个10年快结束时，他被任命为俄罗斯诺里尔斯克镍公司（Norilsk Nickel）的副总裁，负责安保工作。这家公司是世界上最大的镍、钯生产商。最近几年，他的才干被用来帮助拯救俄罗斯明星滑雪和射击运动员的声誉，因为这些人由于吸毒丑闻而失去了参加奥运会的资格。

在新俄罗斯时代，当安全机构被用来行使其他职能时，也引来许多不满。当时的反毒品机构领导人维克托·切尔格索夫在2007年12月9日发表了一封公开信，要求安全机构回归本职。切尔格索夫这位普京的好朋友，曾经是一位克格勃官员。他的妻子与他人在圣彼得堡共同拥有一家通讯社和一份报纸。他在这封信（名为《我们不能让战士成为商人》）中分析指出，俄罗斯在20世纪90年代已经陷入一片混乱，只能由安全机构的“挂钩”来拯救。“有些人希望整个社会分崩离析，”他说道，“但这个挂钩拯救了社会。”而且，他接着指出，

安全机构内部的矛盾也让其受害不浅。克格勃官员当中许多最出色、最聪明的成员，已经另谋高就，谋求个人财富。切尔格索夫的一名副手就在情报机构间一次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中锒铛入狱，切尔格索夫遗憾地表示，安全机构之间在激烈的竞争中已经反目成仇。看起来，它们已经失去了苏联时代的团结。“今天，”他警告道，“专家和记者们已经开始谈论安全机构内部的‘派系战争’。这种‘狗咬狗’的战争最终可能导致整个系统的崩溃……派别林立的现状正从内部将安全机构瓦解，而原本的战士都变成了商人。”

如佩列雷金等人的例子所表明的，联邦安全局内的新秩序为其成员提供了一定程度的保护和稳定环境，因为许多高层持续不断被派驻到安全机构之外的高层职位。但得到提拔的毕竟是一小拨人，加上前同事之间的敌对状态，安全局内部的分裂加深了。



The  
New Nobility

...and the new nobility of the Internet Age

◎ 陈光武

## 利益： 间谍与国家利益



1999年5月，普京是联邦安全局局长，同时也是克里姆林宫的安全委员会主席。这个委员会由一群高官组成，他们共同制定国家安全战略。那是俄罗斯的动荡年代，就在几个月之前，这个国家刚刚经历了一场严重的经济危机。总统鲍里斯·叶利钦似乎已经手足无措了。一天，普京走进了《共青团真理报》——一家发行量巨大的宽幅日报的办公室。在这家报社，他接受了采访。记者问道：“有人担心您和您的朋友们将可能组织一场军事政变？”普京回答道：“我们为什么要发动政变？我们现在就处于掌权地位。我们想推翻谁呢？”然后这位报社记者提示：或许可以推翻总统？

“正是总统任命了我们。”普京笑着说。

普京指出，外国间谍而不是内部的威胁，才是俄罗斯最可怕的敌人。他宣称：“遗憾的是，外国情报机构除了具有外交掩护外，还非常积极地利用各种生态组织、民权组织、商业机构和慈善基金会来开展情报工作。这就是为何我们不管顶着来自媒体和公众的多大压力，都会对这些机构永远保持密切关注。这

是顺应国家安全的需要。”

联邦安全局明白了这一信号。在未来的几年中，普京提到名字的机构成为被调查的目标。蜂拥出现的间谍诉讼案反映出俄罗斯发展方向的变化。20世纪90年代，因为整个国家比较虚弱，挣扎在经济破产的边缘，当西方强国伸出援手时，叶利钦欣然接受。但接受了施舍，又适逢持续动荡的环境，导致俄罗斯产生了屈辱与怨恨；经过1998年的经济危机和1999年车臣战火重燃后，这种感觉变得更加强烈了。普京能够迅速掌权而且大受欢迎，正是对这一失败情绪的回应——这样可以表明俄罗斯不会再任人颐指气使，普京将会建立起新的秩序、平复动荡。他发动的抓捕间谍运动就是他在俄罗斯重建权威与秩序计划的一部分。

2000年，人权组织和慈善组织都成为被调查对象。8月，联邦安全局控告英国的地雷清理慈善组织哈罗信托，指控其在车臣收集情报，并传授车臣叛军制造炸药的技术。2002年，在联邦安全局的背后操纵下，30名准备赴俄罗斯工作的美国和平队志愿者被拒绝发放签证，因为联邦安全局怀疑他们“收集经济和社会政治情报”。2006年，下一个目标被锁定在俄罗斯的非政府组织。一些著名的俄罗斯人权组织，包括莫斯科赫尔辛基组织，被指控接受来自英国情报机构的资金。在公共电视台播放的纪录片中，几名英国外交官被指为间谍，他们的工作就是为俄罗斯非政府组织提供资金支持。

普京对这些指控采取了支持态度。2006年2月7日，在出席联邦安全局高层的一次会议时，普京说道：“俄罗斯的反间谍工作非常职业。但这样的丑闻为俄罗斯非政府组织所带来的阴影，我只能表示遗憾。不过这不怪你们。你们必须弄清楚，那些接受了资金援助的组织在跟谁打交道。”

同年11月，普京指责政治对手“只要靠近外国大使馆，马上就变成了走狗”。

科学家们被归入特殊类别。冷战期间，所有苏联科学研究中心与外国组织的联系都被严格限制。但在 20 世纪 90 年代，他们受到鼓励，自己去寻找外国资金援助。这种惯例延续了几乎 10 年，但到 2000 年左右，联邦安全局改变了游戏规则，声称民主改革导致大量国家机密被泄露出去，并坚持认为应当恢复保密规则。2004 年，俄罗斯科学界被震惊了，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国立科技大学 (Krasnoyarsk's State Technical University) 物理系热物理中心的系主任、物理学家瓦连京 · 丹尼洛夫被控从事间谍活动，最终被判 14 年监禁，而这一切都是源于该中心与中国人签订了合同。

环境组织是被重点关注的对象，最臭名昭著的案例发生在挪威环保组织贝隆纳身上。亚历山大 · 尼基廷一直呼吁关注俄罗斯核潜艇舰队中存在的风险，他在 1996 年 2 月 6 日被捕，并被指控间谍罪。尼基廷最终被判无罪，但恢复自由时已经是 1999 年 12 月了。

2002 年 11 月，伊尔库茨克的环保组织贝加尔湖环境之波的办公地点遭到当地联邦安全局的搜查。该组织的宗旨在于监控贝加尔湖，这是位于西伯利亚东南部的一个世界上最深也是最古老（2 500 万年）的湖。联邦安全局宣布，对该组织开启了一项犯罪调查，因为该组织泄露国家机密，向当地报纸提供了资料，表明这家环保组织参与了间谍活动。迫于舆论压力，这个案子在几天之后就不了了之。

在商业领域，挪威电信公司成为联邦安全局反间谍行动中最初的目标之一。1998 年 12 月，挪威电信公司与俄罗斯第二大的移动通信运营商 VimpelCom 公司结成战略伙伴关系。到 21 世纪最初几年，挪威人已经拥有 VimpelCom 公司 26.6% 的有表决权股票。2005 年，联邦安全局阻止挪威电信公司增购股票，因为这样该公司的持股比例将高达 45%。这家安全机构致信联邦反垄断局，称这

次股票交易不可接受，因为VimpelCom被视为俄罗斯的一家战略公司，而挪威电信公司被怀疑从事情报活动，而且与挪威安全机构关系密切。联邦反垄断局否决了这次股权交易。

2003年，联邦安全局任命尼古拉·奥列什科为安全局调查处副处长，此人后来成为反间谍部门负责人。奥列什科的事业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当时他负责在民主德国的苏联军团中清理间谍。21世纪最初的几年中，他因为这一工作变得声名卓著，并被指派负责该部门的间谍案件调查。2004年，他被选为该部门负责人，开始重启反间谍行动，将反间谍工作置于首位。负责调查间谍案件的第一处面临严重的人员紧缺。据曾在克格勃的调查部门服役10年，于1993年退役的尤里·热尔维律师称，“职业雇员们陆续流失。比如，所谓‘间谍科’的第一科除了本处那位毕业于联邦安全局培训学院的处长外，连调查人员都没有。根本没有人去抓真正的间谍，所以联邦安全局只好去抓那些因为工作关系而与外国组织有联系的人。”结果，“间谍案子都很牵强，证据不足，且都成为最高机密，其实是为了掩盖错误”。

2004年，奥列什科说服联邦安全局高层，让他的第一处负责管理所有地方分支机构，这一步加强了该处的影响力，而且也使得“间谍科”总体上变得更加重要。

这个新的体系建立起来没多久，就遇到了第一个真正的考验。当时奥列什科手下的官员们被要求去莫斯科南部的一个城市卡卢加干预一个案子的调查，该案几乎已经被地方机构搞砸了。

1999年，美国与加拿大研究所的一位军事分析师伊戈尔·苏佳金，被卡卢加的联邦安全局分部指控向外国情报机构提供情报。联邦安全局认为，苏佳金

与肖恩·基德和纳迪亚·洛克联系。这两人是美好未来（Alternative Futures）公司的代表，这是一家神秘的公司，其总部设在伦敦。苏佳金作为兼职顾问被该公司雇来，提供关于俄罗斯军事技术相关问题的咨询服务。苏佳金和基德与洛克在英国等欧洲国家会面，而且因为其咨询服务而得到报酬。联邦安全局告诉记者，基德与洛克是美国的国防情报官员，并提供了美好未来的电话号码和在伦敦的地址。到那时，这家公司已经不存在了。

在本书作者看来，美好未来这家公司颇为可疑。索尔达托夫和博罗甘在2004年前往伦敦调查这个故事中的第三个人，克里斯托弗·马丁，此人在美好未来的宣传页中被提及。作者也想去查看基德在西萨塞克斯郡克劳利市的国尊酒店的住处，这个地址被苏佳金的律师提到过，说这是当事人和基德、洛克会面的地方。在英国记者的帮助下，本书作者找到了克里斯托弗·马丁的电话。奇怪的是，苏佳金所理解的基德的家，实际上属于克里斯托弗·马丁。索尔达托夫致电马丁，想要询问他和苏佳金之间的关系。但马丁不容置疑地声称：“是的，这是我的地址，但我对这个案子毫不知情。我偶尔将房间借给别人，因为我经常出国。其他事情，无可奉告。”这次交谈结束后一个月，这座房子就被挂上了“出售”的标签。

苏佳金被控叛国罪，并在卡卢加受审。在审判期间，卡卢加的联邦安全局分部未能提供证据以证明苏佳金将机密交给美好未来，也未能找到任何能够将机密情报转交给苏佳金，并由他出售的人。相反，联邦安全局将这个案子变了花样，指控苏佳金通过分析俄罗斯媒体的出版物来收集情报。看起来，光是这样的分析，就被视为叛国行为。

2001年，卡卢加地方法院宣判，起诉苏佳金的证据不足，此案也被转往莫斯科，以进行更细致的调查。尽管参与此案的卡卢加的联邦安全局官员们都得

到提拔，但在莫斯科总部多数人看来，这个案子处理失当，而且可能被搞砸。2002年，苏佳金案从卡卢加被提交到莫斯科，苏佳金也被关进了莱弗尔特沃监狱。奥列什科亲自负责下一轮审判，这次审判在莫斯科市法院进行。作为回应，苏佳金要求陪审团参与审判——当时俄罗斯法院的一个新做法。

有陪审团参加的苏佳金案，由彼得·施图恩德法官负责，并于2003年11月开始审理。三个月后，施图恩德宣布他不会再审理该案，而且没有作任何解释。2004年3月，新一轮审判开始，这次由马里纳·科马罗娃法官主持。到4月，新的陪审团认为苏佳金有罪，他被判15年苦役。

这次审判之后，苏佳金的律师感到十分震惊，并宣称陪审团被联邦安全局操纵了，但这并不能改变审判结果。判决结果公布后不久，辩方发现一位陪审员曾经是莫斯科地方军事法院的候选陪审员。他怎么会成为莫斯科市法院的陪审员还是个未解之谜。这位陪审员看起来似乎是被专门调派来参加这次审判的。8月，苏佳金的律师指出此人是格里戈里·亚基莫申。

这个人是什么身份呢？本书作者试图找出这位神秘陪审员的更多信息。我们了解到，亚基莫申是一名老资格的克格勃对外情报人员，曾经在波兰服役，而且曾被卷进该国最大的一次间谍争议事件。1996年，波兰总理被控为俄罗斯提供情报，并被迫辞职。波兰媒体指出，正是亚基莫申透露了总理与俄罗斯有染的情报。根据俄罗斯法律，情报官员是不能成为法院陪审员的。在苏佳金案的审判过程中，陪审员们将接受问卷调查，如果他们过去曾经有过法律部门工作经历，或者曾经为情报机构工作，都会被排除出陪审团名单。据苏佳金的辩护律师安娜·斯塔维茨卡亚说，其他承认自己有上述经历者，都被排除了，但亚基莫申没有提供其真实履历。

伊琳娜·博罗甘打电话到亚基莫申家里，但他们之间的对话极为短暂。

“格里戈里，我们正在准备有关苏佳金的写作计划。您能否告诉我，1994年到1996年间，您是否在俄罗斯驻波兰大使馆工作？”博罗甘问道。

“我在法庭上曾经起誓，不能泄露这次调查的机密，法院也有关于我工作经历的资料。”亚基莫申回答。

“但您能否告诉我，有没有在波兰工作过？”博罗甘坚持问道。

“请问下一个问题吧。”他回答道。

“您能否评论一下与您有关的那起丑闻？此事曾经被波兰媒体大范围报道。”博罗甘再次问道。

最后，亚基莫申失去了耐心，说道：“我不想再回答任何问题了，也不要再给我打电话。”

这样看来，苏佳金被判叛国罪，但陪审团中却有一位情报官员，而且他此前还曾卷入一场间谍丑闻。更明显的是，苏佳金案表明，在普京掌权的俄罗斯，争议是如何被裁决的：不是按照法律的规则，而是被一部分掌权的人独断。国家决意用苏佳金案表明姿态，并证明其犯有叛国罪。尽管有证据表明陪审团被操纵，他还是被不择手段地送入了监狱。2010年7月，苏佳金被俄罗斯拿来换回了一名近期被美国指控为间谍的俄罗斯人。

联邦安全局每年都会报告发现了大约100名叛国者和几十名间谍。2008年，据该机构的数据，共有149名外国间谍被揭开真面目。2008年12月，联邦安全局局长亚历山大·博尔尼科夫告诉记者：“外国情报部门的48名职业情报官的间谍活动被制止，还有101名在本地活动的外国情报机构成员被抓获。”但在俄罗斯，每年实际被起诉和审判的间谍案却远远不及统计数据那般令人印象深刻。

比如，联邦安全局将那些行为可疑的外国人视为“职业情报官员”，这些人被禁止进入俄罗斯。而那些被怀疑将国家机密出卖给外国情报机构的俄罗斯人，则被视为“本地成员”。在统计数据中提到的本地成员们从来都是不具名的，因为他们中的多数都是所谓的发起人——这些人将会主动联系外国大使馆，但被提前阻止了。在大多数情况下，那些购买情报者连情报的影子都没见到。

尽管俄罗斯的情报机构侦破的间谍案子很少有站得住脚的，但这并不影响他们邀功升官。

1997年，情报机构试图在俄罗斯远东的符拉迪沃斯托克起诉军事记者格里戈里·帕西科。帕西科一直与一家日本电视台合作报道在海洋中倾倒核废料的情况。因为他接受外国人的薪水，所以很容易就成为俄罗斯情报机构的目标。这个案子由当地联邦安全局负责人耶尔曼·乌格留莫夫负责，帕西科被控间谍罪。但到1999年，他被无罪释放，2000年最高法院再次对他进行审判。2001年12月，他被判有罪，面临四年牢狱。2003年1月，他获释出狱。

乌格留莫夫则被提拔为莫斯科联邦安全局副局长。2001年1月，他被指派在车臣指挥反恐行动。就在同一年，普京授予乌格留莫夫俄罗斯最崇高的俄罗斯联邦英雄奖章。2001年5月他去世前，很多人都谣传他已经被内定为下一任联邦安全局局长。参加帕西科案件的低级别官员们，也都得到了提拔。调查员亚历山大·叶戈尔金在该案中指挥了调查小组，后被任命为联邦安全局太平洋舰队部调查处处长。当法院发现叶戈尔金在调查期间违犯刑法，而且伪造了文件制造冤案后，他受到严厉惩戒，但没过多久又被提升为少将。后来叶戈尔金被调往莫斯科，在那里负责联邦安全局调查处的军事反间谍部门。

20世纪90年代末，符拉迪沃斯托克在清理间谍方面走在了前列。1999年7月，联邦安全局搜查了海洋学家弗拉基米尔·索伊费尔的公寓和实验室，据传

这是因为他的生态学研究对国家安全构成了威胁。最后，他被赦免，不过最终也没有发现他到底犯了什么罪。索伊费尔申请获得赦免是为了给自己洗清名誉，2001年5月，这个案子被正式终结。那时，联邦安全局普里莫尔耶分部负责人谢尔盖·韦廖夫金-拉卡尔斯基将军，这位启动了这个案件调查的人，却被调去了莫斯科。2000年，韦廖夫金-拉卡尔斯基被任命为税务部副部长，2011年被提升为中将，并担任联邦税务警察局副局长。

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反间谍官员们的迅速高升，受到其他地区同事们的关注。没过多久，整个国家范围内，抓捕间谍行动风起云涌，甚至连原本最平静的地区也不例外。2002年1月，奔萨的联邦安全局分部也出了一次风头。他们公开了一名22岁的间谍，此人貌似招募了另一个16岁的男孩。后来才知道，那名所谓间谍其实是一名英语老师，他让自己的学生将其父亲在拜科努尔航天中心（在苏联时代，相当于美国的卡纳维拉尔角发射基地）的照片拿来看一下。联邦安全局声称，这名老师打算将这些照片卖给美国大使馆。

如果有哪一个案例导致联邦安全局调查处“间谍科”的调查人员重新调整其反间谍策略，那肯定是瓦连京·莫伊谢耶夫案。莫伊谢耶夫是外交部亚洲司前司长。他在1998年7月4日被捕，并被指控将机密文档转交给韩国情报机构。

前联邦安全局官员尤里·热尔维这样说过：“莫伊谢耶夫案件的实际处理情况，可谓创造招募机会。韩国情报机构可以利用他和一名韩国驻俄罗斯大使馆的顾问赵胜宇（Cho Son Yu）之间的友谊来对他实施招募。联邦安全局在调查赵胜宇的活动时，发现莫伊谢耶夫与韩国人之间有交往。然后，与外交部有联系的安全局活跃储备官员开始与莫伊谢耶夫打交道，询问相关情报。之后，安全局利用莫伊谢耶夫提供的信息作为罪证对其进行指控。从法律角度来看，这

是一种挑衅行为。”最终证明，这些证据都是没有事实根据的。所谓莫伊谢耶夫提交的文件当中，联邦安全局还列入了“一个保护候鸟的协议”。主持过审判的前后有 5 名法官，谁都无法作出“正确”的判决。最后，最高法院推翻了莫斯科市法院所判决的 12 年监禁——最终刑期被减为 4 年。

莫伊谢耶夫案中对调查人员的选择也非常奇怪。其中一位竟然是莱弗尔特沃监狱主管的儿子，而莫伊谢耶夫就被关在那里。另一位是尤里·普洛特尼科夫，曾经参与过埃德蒙·波普案的调查。后者是一名美国公民，曾被控间谍罪。尤里的父亲，奥列格·普洛特尼科夫曾在波普案中担任公诉人。莫伊谢耶夫案件审理结束后，两位调查人员都得到了升职。曾经为莫伊谢耶夫案件作辩护的高级调查员瓦西里·佩图霍夫，起初只是上尉和高级调查员，但之后不久被提升为中校。一年之后，他就执掌了第一科。

尼古拉·奥列什科，当时联邦安全局调查处“间谍科”的负责人，带领这个科调查了莫伊谢耶夫案。

每次间谍审判中要面对的挑战，使得联邦安全局开始考虑新的策略。安全局发现，对间谍们进行经济指控效果好于刑事指控。那些被打倒的都不是涉嫌间谍罪，而是非法出口技术和经济犯罪。被指控的人们都是一些资金雄厚且常常拥有大量获利不菲的国外合同的研究机构。

新策略被应用的第一个实例是奥斯卡·卡伊比舍夫，金属超塑性问题研究院院长，他在 2005 年时引起了联邦安全局的注意。最初，这位 65 岁的科学家被指控泄露国家机密。他的同事、学术圈、记者还有公众为了支持他，甚至发起了一场声援运动。不久，卡伊比舍夫的罪状被重定，他被指控将军民两用技术出口到了国外，他被描绘成了一个参与非法商业阴谋者。2006 年 8 月，卡伊比舍夫被判缓刑 6 年。

2005年10月，学者伊戈尔·列舍京（也是中央机械制造科学研究所出口联合股份公司的总经理）、他的首席财务官谢尔盖·特韦尔多赫列波夫，还有他的安全副总管亚历山大·罗日金被联邦安全局逮捕。三个人都被关在莱弗尔特沃。

联邦安全局的调查员没有控告他们犯有间谍罪或者泄露国家机密。他们被指控犯有侵吞公款罪和违反出口规定。后来，他们又被指控向中国出口军民两用技术，而且涉嫌走私。

2007年12月，这三人被判处5年到11年不等的有期徒刑。几天之后，被判刑者中的一人在人权网站www.hro.org上写了一封信并发布。他声称：“如果我们的总经理同意与情报机构进行对话，就不会有这么严重的后果了，而且他个人的职位以及公司在航天技术市场上的位置都将得到巩固。这家公司将会得到联邦安全局经济安全部门的保护。”

很有可能是联邦安全局同意这封信被公开的，这样一来，人们在遇到类似情况时，都会对上述信息引以为戒。

苏联解体后的动荡年代里，在重新崛起的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在社会中占据着一个普通的位置：寡头们雇用腐败官员，而安全机构在车臣的存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被忽略。在这样的转型年代，联邦安全局看起来就像一个久远的、苏联时代的机构。它们需要在新的环境中找到新的位置。在过去10年中，通过大张旗鼓的间谍追查行动，联邦安全局试图重建其在社会上的巨大影响力。这需要大量预算供给，需要重建威望，也需要能够拿出手的成功案例来与其他安全机构竞争，以赢得商界的尊重与支持。

当联邦安全局声称其在阻止俄罗斯被出卖或被外人操纵时，一次又一次诉

讼却始终没有证明这种威胁实际存在。21世纪的最初10年，所有能偶尔接触敏感感情报的大鱼们，没有一个被控间谍罪。相反，那些间谍罪指控却对准了一堆小喽啰，证据也不充足，而且在一些案例中，连程序都不合法。普京推动铁腕行动来从内部铲除持不同政见者，结果却使得疑忌被放大。

第四章  
**威胁：  
内部的对抗行动**



The  
New Nobility  
THE CHINESE AUTOMOTIVE INDUSTRY'S NEW ELITE



在普京任内，对外国间谍的清理工作成为联邦安全局的首要任务。与此同时，一项相反的行动也得以开展，旨在通过安插在自由派组织中的线人提供情报。

2008年2月，安德烈·索尔达托夫接到了一个奇怪的电话。打电话的人叫托马斯·比什-安德森，是哥本哈根的丹麦广播公司的一名记者。他告诉本书作者，有一个人声称曾经是联邦安全局安插在联合公民阵线（United Civil Front）组织的线人。这是一个自由派的政治组织，组建的目的在于促进俄罗斯的民主选举程序。索尔达托夫对此有些怀疑，担心这样的报道难以找到相关情报。但他要求比什-安德森交给他一部分采访录音片段。听过这些录音后，索尔达托夫和博罗甘与他们在《新报》的编辑讨论了调查此人的前景，而最终的结论是，这是一件值得做的事情。

此时，联合公民阵线组织是俄罗斯的反对派之一，由国际象棋界传奇人物加里·卡斯帕罗夫领导。卡斯帕罗夫曾经是世界上最年轻的国际象棋冠军，20

世纪 90 年代，卡斯帕罗夫开始转向政治领域，支持一些小党派和政治运动。21 世纪最初的几年中，卡斯帕罗夫尝试建立了一个不受普京的克里姆林宫控制的反对党。他的党派“另一个俄罗斯”，采取了草根组织方式；2006 年到 2009 年，俄罗斯各大城市举行一系列游行，但多数都被执法机构镇压。克里姆林宫恐惧异常，担心这些示威游行会促成被称为“颜色革命”的和平抗议运动。这样的革命在 2000 年到 2005 年间，已经成功推翻了许多集权统治，如塞尔维亚、格鲁吉亚、乌克兰和吉尔吉斯斯坦。克里姆林宫坚信，这些抗议运动有西方机构的推手。卡斯帕罗夫只有几千名追随者，但他却成功地以一位对克里姆林宫毫不讳言的批评者角色出现在西方媒体上：他不断接受采访，在《华尔街日报》、《金融时报》、《纽约时报》上发表专栏文章。对联邦安全局来说，这些评论就是卡斯帕罗夫最大的罪行。卡斯帕罗夫被看做西方国家的代理人，他迟早有一天会被敌对的外国势力用来推翻莫斯科的政权。

联邦安全局安插进去的人是亚历山大·诺维科夫，他第一次出现是在 2008 年的丹麦。诺维科夫显然从俄罗斯去了芬兰，并在那里申请了红十字会帮助，之后前往哥本哈根附近的一个难民营。一个星期以后，他来到丹麦广播公司的办公室，声称自己是一位俄罗斯联邦安全局特工，想要结束自己的活动并获得政治避难。

索尔达托夫认为，要想弄明白这件事情，只能去哥本哈根。两天以后，他与诺维科夫在哥本哈根的记者办公地见面，那是在一间很小的会议室。诺维科夫，36 岁，个子很高，长相英俊，长着一头浓密的灰发。索尔达托夫开始问他问题时，诺维科夫说道：“我们去街上抽支烟吧。”

诺维科夫告诉索尔达托夫，他是在德涅斯特河东岸共和国长大的，那是摩尔多瓦共和国分离出去的一个小省。德涅斯特河东岸共和国当局在 1990 年宣称

从摩尔多瓦独立出去之后，这块狭窄的土地曾经被各种冲突包围。而这次宣称独立的行为最终导致持续两年的血腥战争。今天，这块土地几乎成了黑帮的国家，到处是武器贩运和走私现象。就连俄罗斯——曾经在德涅斯特河东岸共和国与摩尔多瓦的战争中支持过前者——现在也拒绝承认该国。

诺维科夫在街上抽完烟，然后回到会议室跟索尔达托夫谈了好几个小时。他说自己毕业于医学院，后来在俄罗斯的托木斯克医学院（一家军校）深造过。2002年，他前往莫斯科，在几家诊所当过医生。诺维科夫称，他与联邦安全局接触之前一直是一家德国制药公司沃瓦格·法玛（Werwag Farma）的医药代表。为了获得一份很微薄的薪水，他从一家诊所到另一家，努力销售该公司的产品。

但讲到这里，诺维科夫的故事发生急转。他声称在2006年初，自己在莫斯科市中心的博利绍伊·基谢尼路散步，然后不由自主地决定去联邦安全局转转，去问候一下自己在德涅斯特河东岸共和国生活时的一位相识，他与此人已经失去联系，而且一直想找到他。索尔达托夫颇为不解，联邦安全局可不是那种地方，你可以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里走进去打听一位失散已久的朋友。

诺维科夫说进入大楼后，自己向一名叫做阿列克谢·弗拉基米尔罗维奇的官员表达了自己的意图。这位官员写下诺维科夫的地址和电话号码，后来给他打电话，说建议见一面，好“讨论一下一个很不错的机会”。

诺维科夫回忆，他和这名联邦安全局官员在莫斯科一个很体面的地区的一座小公园里见面了。这位官员带来三张纸，说这是一份与联邦安全局合作的合同。这份合同为期一年，并且可以续签。诺维科夫看到那合同可以保证他每个月得到8 000卢布收入（相当于320多美元，是他在沃瓦格·法玛公司薪水的1/3）。

作为交换，这名官员要求诺维科夫渗透进新成立的联合公民阵线，以收集情报。在接受这份工作的时候，诺维科夫得到了一个行动代号“米哈伊尔”。与阿列克谢·弗拉基米尔罗维奇一起，诺维科夫编造了一套经历，以帮助他能够进入该组织：他将告诉这个组织的成员，他正在协助医疗工作者组建一个独立的工会。

从与诺维科夫合作伊始，索尔达托夫就对他的故事存在怀疑。有许多待解的谜。然而，确实能够证实诺维科夫是联合公民阵线莫斯科分部的活跃成员。各种记录、采访和照片都表明，诺维科夫参加了无数次游行，担任过罢工纠察员，还曾遭到警察拘留。他最后一次参加这类活动是 2007 年 11 月，当时他被控在莫斯科内务部总部附近的彼得罗夫卡大街 38 号设置罢工纠察路障。他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支持卡斯帕罗夫。

根据诺维科夫所说，在与联邦安全局合作期间，他还被指定过一个新的接头人。2007 年 5 月，阿列克谢·弗拉基米尔罗维奇去车臣执行任务，他的工作由阿列克谢·利沃维奇接替。这是一名年轻人，只有 28 岁。还有一个人也参与了这项计划，诺维科夫猜测此人应该是接头人的上司。他自我介绍称叫做安德烈·伊万诺维奇。他只与诺维科夫见过一次面，而且向他询问了在联合公民阵线莫斯科分部的活动。

诺维科夫告诉索尔达托夫，他与自己的接头人进行定期会面，主要是在联邦安全局莫斯科分部办公室附近的罗日杰斯特文斯基大道。诺维科夫被要求定期撰写在联合公民阵线内部活动的报告，还要提供从接头人那里领钱的收据。诺维科夫每次都用手写，署名“米哈伊尔”。他的接头人对联合公民阵线的任何情况都感兴趣：计划好的抗议活动日期，组织内部的关系，与加里·卡斯帕罗夫关系密切的人员的姓名。诺维科夫受命开通了一个电子邮件账户，以便接收

联合公民阵线的邮件，然后再转发给阿列克谢·利沃维奇。接头人还给了他一个手机号，用于相互联系。

在接受索尔达托夫的采访时，诺维科夫将自己邮件账户的密码告诉了作者，允许他查看与利沃维奇之间的往来信息。他们之间的信息交流始于2007年7月，并一直持续到2008年2月。诺维科夫将自己收集到的所有关于卡斯帕罗夫政党的活动信息都发给了接头人。在一些邮件当中，接头人表示有钱要给诺维科夫。比如，在2008年2月4日，联邦安全局的这名接头人写道：“亚历山大·阿列克谢耶维奇！你又消失了。发生什么事情了？尽快给我打电话。阿列克谢·利沃维奇。”

诺维科夫认为，他自己在帮助联邦安全局瓦解卡斯帕罗夫的政治活动当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具体而言，他说，他向联邦安全局提供情报，包括卡斯帕罗夫计划在哪里召开会议收集签名，以便成为2008年总统大选的候选人。2007年12月10日，卡斯帕罗夫的启动团队在租用莫斯科一家剧院大厅时受阻，且没有得到任何解释。当卡斯帕罗夫的支持者们试图寻找另一个地点时，在所有面积足够大能够作此用途的场地，其主人都断然拒绝出租。卡斯帕罗夫需要聚集500人，但没有足够大的场地，根本无法办到，而且中央选举委员会也禁止将群众分为几部分来集会。据诺维科夫说，他向联邦安全局提供了卡斯帕罗夫想要租用的每一个场地的信息。

联邦安全局方面好像非常想要渗透进卡斯帕罗夫的组织，但却并不想控制它。彻底控制还是落在克里姆林宫手中，后者不遗余力地压制反对普京的政治派别，同时组建亲普京的由年轻人参加的政治组织。

根据诺维科夫的描述，他的联邦安全局接头人非常乐于见到他在卡斯帕罗夫的组织中崭露头角。他们总是给他具体的指示，告诉他应该跟谁沟通、如何

做事情，以确保有升职的机会。2008年1月，诺维科夫上报了好消息：洛丽塔·察里亚，联合公民阵线的莫斯科分支负责人向他承诺，将让他担任莫斯科西北分部的负责人。两天之后，诺维科夫离开了俄罗斯。

索尔达托夫感到很奇怪。他想不出来诺维科夫为何决定，用他的话说，“结束线人生涯，并将一切曝光”。诺维科夫声称，他已经厌倦了过双重生活，出卖自己在组织中的同志。

但索尔达托夫还是怀疑这样的话是否真实，也不知道诺维科夫是否是为了将自己装扮成一名线人，以便获得政治避难资格，从而能够在欧洲过上好日子。2007年7月，诺维科夫抵达丹麦，待在那里的难民营中，但到8月回到了莫斯科。

苏联时代，政治调查由著名的克格勃第五局负责，该部门是1967年克格勃主席尤里·安德罗波夫在任时组建的。安德罗波夫在1968年4月17日写给苏共中央的备忘录中提到：“国家安全组织负责处理斗争问题，这些斗争对象主要是存在于国内意识形态领域的有害分子。与之前国家安全组织中的次级单位不同，新成立的这些单位被要求瓦解由外国敌人策划的意识形态颠覆活动。”

第五局由15个相互独立的部门组成，共同负责压制不同意见。第一部负责解决工会问题，第二部策划针对流亡者组织的行动，这些组织对苏联是重要威胁，第三部负责学生工作等。在这些部门中，有一个负责应对外国记者（第十五部），有一个负责对付流氓和非正式组织（第十三部），还有一个负责与犹太社团联络（第八部）。据长期担任第五局局长的菲利普·博布科夫后来回忆，第五局的工作人员至少有2500人。

在戈尔巴乔夫的经济改革年代中期，为了提升他们的形象，第五局被重命

名为“宪法保卫局”（简称Z局）。然后，该局也没有能够在苏联解体后幸存下来，而是在1991年9月被撤销。即便如此，该局中经验老到的官员们，还是保留着活跃储备状态。

在叶利钦时代，联邦安全局让这个部门再次复活。1998年7月6日，联邦安全局的宪法安全局成立，就在同一个月，普京被任命为联邦安全局局长。当年11月在接受《独立报》采访时，宪法安全局的局长热纳迪·佐托夫将这个局的作用描述为：“国家的目标是成立一个次级机构，专门应对在社会政治领域会对俄罗斯联邦安全产生的威胁。出于许多与俄罗斯根本特征相关的客观因素，这个局一直致力于保护国家免受‘内部煽动’的侵袭，因为‘内部煽动’对俄罗斯构成的威胁，要比任何军事入侵都可怕。”

到今天为止，这些话是所有联邦安全局将军对政治调查必要性的评论中最坦诚和公开的。

但并不是所有的政治监控都是由总部执行的，地方分部和各部门也参与其中。在联邦安全局，这类地方部门当中最大的一个位于莫斯科。

按照俄罗斯法律，情报部门不得利用安插在政治组织中的潜伏人员直接从事调查工作。根据1995年通过的《军事调查行动法案》，这种行为是违法的。该法案的第五条第二款明确规定：

相关各方（官员）从事调查活动时不得：……秘密渗透进……依法注册和法律并不禁止的政治党派、公共组织和宗教组织中，以影响上述组织的活动性质。

在索尔达托夫看来，诺维科夫描述的经历当中，有几个细节看上去很奇怪，比如他签订的是一份协议，而不是克格勃的典型方式，即签订一份合作声明。

但索尔达托夫认为，或许这正是俄罗斯新经济制度的标志之一，不过其他的细节都没有出入。根据索尔达托夫所采访过的其他联邦安全局官员的说法，这样的行为是联邦安全局莫斯科分部常干的事情。与中央机构的其他官员相比，他们更愿意在总部附近与线人会面，而且总是要求线人提供书面供述和收据等内容，以向其领导证明自己没有把这些钱装进自己的口袋。

诺维科夫提供的最令人信服的细节，是他所描述的第一次接头时的那座大厦。诺维科夫告诉索尔达托夫，地址是博利绍伊·基谢尼路 13/15。公众对这个地方并不熟悉，只知道它属于联邦安全局的莫斯科分部所有。在那座楼里，有一个鲜为人知的小部门，负责打击政治极端主义。

索尔达托夫与他的丹麦记者同事在哥本哈根花费大量时间，讨论如何核实诺维科夫所提供的情况。最后，他们要求诺维科夫给自己的接头人打电话，然后将他们的对话录音。在一个寒冷的冬日，诺维科夫被带到了哥本哈根市中心一处美丽的河岸边。一组电视台的人员准备好录制他们的谈话。放眼望去，没有看到其他人。

诺维科夫拨打了他接头人的电话：

“阿列克谢·利沃维奇？”

“我是。”电话另一边的声音回答道。

诺维科夫向他的接头人表示，自己在丹麦。

“哦，你应该提前告诉我。去之前，你为什么没有马上通知我？”阿列克谢·利沃维奇质问道。诺维科夫转移了话题，告诉他的接头人，他曾致电洛丽塔·察里亚，卡斯帕罗夫的政党在莫斯科分部的领导人。

“我给洛丽塔打电话了，”他紧张地说道，“她已经选出了组织中的协调人，现在要组建几个委员会。我很有可能成为其中一员，就是组织群众活动的委员会。”

“我明白了，很好。但你会在一周内回来吗？”

“没问题。”

“如果不按时回来，你将再度无法按时收到钱。”阿列克谢·利沃维奇笑着说。

“钱会收不到吗？”诺维科夫问道。

“是的。我问过你为什么会突然消失。”

“嗯，事情赶巧了。”

“但你会在一周内回来，对吧？”

“我希望能按时回去。”诺维科夫让他放心。

“隔一段时间就给我打个电话。你在那里能上网吗？”

“能上，你的邮件我都看了。”诺维科夫说。

“明白了。有没有收到过邮件？洛丽塔发给你的？”

“洛丽塔？当然，收到过。”

“只要有机会，就发给我。”接头人说道。然后他问，“现在谁是协调人？”

“协调人？好像是涅莫夫。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他的名字。”

“我知道了。好了，把你后来收到的这几封信都发给我，好吗？”这句话听上去更像是命令，而不是请求。

“好的，我会发给你的。谢谢你，再见，阿列克谢·利沃维奇。”

“多保重！”阿列克谢·利沃维奇挂断了电话。

在哥本哈根，索尔达托夫撰写了一份关于诺维科夫的报道，并将其发送给了在莫斯科的博罗甘。那位丹麦人想尽快将这故事在电视上播出，索尔达托夫却想确认更多细节。

博罗甘将这篇报道拿给《新报》的编辑看，但他建议她先去联邦安全局让

对方对此进行评论。她发了两份正式的传真，要求对方就两点作出评论：联邦安全局是否派特工潜入政治团体，这些特工是否渗透进了卡斯帕罗夫的政党。博罗甘没有提及诺维科夫的名字，担心这样做会导致联邦安全局想办法阻止这篇报道刊登。后来证明，联邦安全局对这一要求未予理睬。

甚至在索尔达托夫飞回莫斯科之前，他还在竭尽全力确认这一报道的真实性。他请求一位在《新报》的同事——此人曾经在克格勃的第五局工作——来听取这个故事，并给他提供这个故事真假与否的建议。听过之后，索尔达托夫的同事得出结论，考虑到会面的地点，以及关于这座建筑的细节等，这听起来很像是联邦安全局莫斯科分部的人干的事情。这位同事还说，与阿列克谢·利沃维奇的上司的会面是这个分部的典型安排——这是领导层对官员们的监督行动，以确定他们招募的特工是否真实存在，是否对得起他们领到的薪水。线人对其接头人的了解很少，这很正常，因此逼迫诺维科夫提供更多细节其实没有意义。

索尔达托夫和博罗甘就是否请卡斯帕罗夫就此发表评论进行了一番讨论。他们最终决定不这么做——他们没有得到联邦安全局的任何回应，也不想让这篇报道看起来受到了卡斯帕罗夫政党的指使。

经过多次讨论后，本书作者将关于诺维科夫的报道发表在了2008年2月21日的《新报》的头版，同一天，丹麦记者也将这件事情在电视上报道了。

这条新闻在反对者圈子里反响强烈。罗曼·多布罗霍托夫，一个叫做“我们”的反对派政治团体的领袖，向各通讯社表示诺维科夫在任何地方都出现过——他简直记不起有哪次政治活动诺维科夫没有参加的。他继续表示，看起来很奇怪，一名联邦安全局特工竟然在这些活动中出了不少“风头”。多布罗霍托夫还表示，他怀疑联邦安全局已经渗透进了自己的政治团体当中，他坚信在

俄罗斯的其他反对派团体中，还有许多潜伏下来的情报官员。

卡斯帕罗夫的政党看起来却好像对这篇报道不以为意。发言人马里纳·利特里诺维奇告诉索尔达托夫，“就算你们写了这篇报道，那又怎样？”这篇报道见报当日，卡斯帕罗夫政党的负责人丹尼斯·比卢诺夫表示：“我从来不曾怀疑，在我们的组织和其他反对派的组织当中有一些人将关于我们活动的机密情报提供给情报机构。”他还说，这样的事情可以打官司了，但他补充道，“我认为，这得由公诉人起诉，因为这样的行为很大程度上已经不只是侵犯了我们的权利，而是情报机构的违法行为。”

其他媒体——包括《莫斯科时报》、《费加罗报》和英国广播公司——都刊登了诺维科夫的故事，但联邦安全局拒绝就此发表任何评论。莫斯科分部的媒体办公室负责人叶夫根耶夫·卡里诺维奇，在这篇报道见报之日起开始休病假，而其他的雇员则拒绝对此发表评论。本书作者向他们发出了书面采访请求，没有得到任何应答。但这件事情仍然没有定论。即便报道被刊发出来，索尔达托夫还是被《新报》的同事们指责发表了未经确认的信息。

报道刊登出来两周后，索尔达托夫与一名联邦安全局莫斯科分部的官员会面。这名官员曾经是一个线人，他表示，因为诺维科夫事件，莫斯科分部内部出现了一些争论。为什么呢？索尔达托夫有点怀疑，不是联邦安全局招募了诺维科夫吗？

这位官员回答，诺维科夫只不过是一个欠了一屁股烂债的骗子。

“你知道，我们有招募计划。”这位军官补充道。他的表态似乎表明，诺维科夫确实是一名特工。但提供消息的人也不是来自那个可能招募了诺维科夫的部门，所以知道的情况也很有限。他说联邦安全局在看到这篇报道后完全震惊了，甚至不知道该如何应对。

渗透进合法注册的政治团体是非法行为。但如同联邦安全局官员向本书作者解释的，通过派特工伪装成政治活动积极分子，进行所谓的情报收集，是有可能的。

关于诺维科夫经济窘迫的状况，对作者来说倒是新情况。他们联系上了该党派当中的另一名活跃分子尼哈伊尔·德米特里耶夫，他是诺维科夫的密友，此人知道诺维科夫很缺钱，并且确认了这一点。

最后，索尔达托夫致电诺维科夫，直接问他关于他人不敷出的情况。诺维科夫承认，他借了一笔 15 000 美元的债，而且无力归还。他也表明，自己跟来自德涅斯特河东岸共和国的犯罪团伙有染，而且联邦安全局完全知道他的这些关系。

现在索尔达托夫和博罗甘对这个案子看得更加清晰了。因为欠债，诺维科夫成为更容易被联邦安全局利用的棋子：成为一名线人，他就可以挣钱还债了。

诺维科夫的故事是否真实呢？很明显，他是一个欠债不少的人，而且还多少有过一些犯罪经历，正是很容易被情报机构招募去做卧底工作的人选。他向索尔达托夫提供了准确的信息——就能够确认的来说，有关于他的招募过程以及他的接头人等。他很明显曾经在卡斯帕罗夫的政党内工作过，这对联邦安全局来说相当有吸引力。所以，他既有动机，也有机会。最后，他试图获得最大收益——这并不出乎意料，这个机会主义者以自己受到政治迫害为由，在西欧寻求政治避难。

对于联邦安全局来说，他们可以声称诺维科夫主动找到他们出卖情报，而他们向他支付了一些“费用”。这笔钱并不多。当消息爆出后，他们保持了沉默，这毫不意外，因为诺维科夫只不过是一个小角色罢了，也没有被莫斯科的联邦安全局看做什么重要资产。

故事没有就此结束。2008年7月，本书作者从一位联邦安全局学院的教授处得知，这篇报道导致联邦安全局的莫斯科分部内部对索尔达托夫怒不可遏。而正好因为2008年3月2日就要举行总统选举，他们才没有采取措施对付这几位记者。

2009年3月，诺维科夫已经在芬兰，他的政治避难申请被驳回，但他还是决定留在这个国家努力让避难申请重新得到审议。2010年春天，他的未来依然充满变数。

诺维科夫的案子不同凡响，因为他决定将自己的故事讲述给媒体听，但这也能够映射出，联邦安全局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行动有多么隐秘。线人向自己的接头人尽职尽责地汇报情况，会得到一定的报酬，他们也会受到悉心的指导，教他们如何在一个组织内部“阅读”其行动。而这只是监控俄罗斯和持不同政见者行动的工具之一。



New Nobility  
The  
Nobility of Life



新贵族

监察：  
应对极端主义



2009年5月6日，自由派的反政府政治活动分子、26岁的罗曼·多布罗霍托夫坐火车从伏尔加格勒来到莫斯科。他曾经参加过无数次针对克里姆林宫的街头抗议。在帕夫列斯基车站，他一下火车，立刻就被在出口处等候他的警察拘押。

警察告诉多布罗霍托夫，要他跟着去火车站的警察岗哨。到那里之后，警察说，他被派来与这名年轻的政治活动分子预先进行一番谈话，以警告他不要参加当局所禁止的街头抗议活动。多布罗霍托夫要求警察作详细解释。警察表示，他接到了来自莫斯科铁路警察的电报，建议扣留多布罗霍托夫，他还暗示，多布罗霍托夫已经被列为“被监控者”。这项特别制度是内务部反极端主义部门专门用来追踪重罪犯的。多布罗霍托夫用自己的手机将这份电报拍了下来。电报上面写着“紧急”，这份文件表明，至少有三名警察被指派来监控他的行踪。这名活动分子从来没有受到过犯罪起诉，他被扣留的原因只是因为当局要对他进行所谓的预防性警告。

对多布罗霍托夫的警告从一个侧面表明俄罗斯安全机构是如何监控本国公民的。他们开始了一项雄心勃勃的监控计划，以便控制住“极端主义”，这除了其他行为外，还包括对当局的政治抗议、批评克里姆林宫或情报机构的文章、加入独立工会和非正式青年组织等。对极端主义的这一宽泛定义，包括参加对当前俄罗斯政治秩序构成挑战的活动。这个定义出现的背景是克里姆林宫担心2008年的金融危机可能导致大范围的民众抗议。

2008年9月6日，新上任的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将内务部结构进行了关键性的调整，这个机构实际上是国家的警察部门。在梅德韦杰夫当政期间，这个专注于打击有组织犯罪和恐怖主义的机构被解散，一个新机构应运而生，负责反恐。地方的相应机构也发生了同样的转变。成千上万名经验丰富、擅长对付恶棍与恐怖分子的警察被重新调派去追踪另一个新的敌人。

2009年2月，内务部长拉希德·努尔加利耶夫就梅德韦杰夫对内务部的改革给出了官方解释。他声称对有组织犯罪的斗争已经取得胜利，“在俄罗斯将不会再有新的大规模犯罪出现……犯罪事件正在减少……我们可以说：针对犯罪的战争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

2009年4月15日，在一场公开会议上，负责打击极端主义的新部门的负责人尤里·科科夫的表态直截了当：“在全球危机下，社会和经济形势都在进一步恶化，打击行动可能变得更加困难。”他受到阿列克谢·谢多夫的支持，后者是保护宪法系统和反恐部门的负责人。“我们需要考虑到，全球金融危机可能催化恐怖主义行动和增加极端主义行为，这包括由各类持不同政见者所进行的各种形式的暴力反抗、未授权的抗议行为以及青年和学生运动。”

根据俄罗斯法律，公开宣扬种族、社会和其他形式的愤恨情绪，都会被视为极端主义——这指的是语言，而不是行动。但是，内务部的官方记录表明，

与有组织犯罪相比，极端主义根本不是什么大问题。内务部主要信息分析中心在 2008 年的数据表明，有 36 601 件被调查的事件与有组织犯罪集团有关，只有 460 件极端主义案例被登记在册。

在对抗极端主义的运动中，当局将重点放在预防上。内务部长努尔加利耶夫宣布：“反极端主义部门的职能首先是行动和招募，旨在发现和打击犯罪，同时也负责预防和监控在极端主义活动领域内将要发生的一切。”于是，原本负责调查犯罪的内务部，变成了一个见不得光、更具有联邦安全局传统的预防机构。

没过多久，一份极端主义分子名单就被炮制出来。2008 年 12 月 16 日，总检察院、联邦安全局还有内务部通过了一项针对极端主义的共同决议。这份文件表示，“极端主义已经成为威胁国家安全的一个重大因素。”

被列在名单之首的是“披着伊斯兰外衣的宗教极端主义”。在许多案例当中，这里所指的也包括各种协会和社团，它们独立于所谓的传统伊斯兰社团，这些地方往往受到俄罗斯政府的官方监控。名单的下一个就是异教徒。这个名单还包括“非正式青年组织的参与者”，还有一些极端的反对党和政治势力。这份共同决议规定了如何对付目标团体，其手段包括监控和刑事诉讼。这些工作中的一个最重要的领域是“分化和瓦解具有极端主义倾向的组织”。

到 2009 年春天，很明显，安全机构试图扩大在 2008 年的命令当中被列举的极端主义组织的名单。现在内务部盯上了独立工会（生怕其发动新一轮罢工）并警告此类组织的领导人，他们的行动将有被指控为极端主义的风险。

2009 年 4 月，日益扩大的伏尔加汽车制造厂独立工会的领导人彼得·佐洛塔廖夫宣称，他被叫到位于陶里亚蒂小镇的检察部门，“解释其旨在推翻现存体制的行为”。早些时候，佐洛塔廖夫已经在一个地方上的反极端主义中心受到官员们的质询。

任何形式的公开抗议，以及从受骗的股市投资人到聚集起来想要将公园留住的居民，都有可能被列入极端主义的范畴。比如 2009 年 6 月 5 日在圣彼得堡，警察扣留了 6 名抗议者——他们是房地产开发商，声称自己被诈骗——并警告他们，他们有可能被认定为极端主义者。

在这场新的反极端主义运动当中，撰写博客的博主们也同样成为目标。2009 年 3 月，德米特里·索洛维约夫，一名西伯利亚的克麦罗沃的反对派青年组织领袖，因为在博客上批评联邦安全局而受到犯罪指控。涉嫌犯罪的两条博文标题是“联邦安全局在残杀俄罗斯儿童”和“联邦安全局和军队征兵站的专制行为”。据公诉方邀请的专家们表示，索洛维约夫发布在网上的消息“煽动仇恨、敌意，让许多组织中的人们受到侮辱，包括警察和联邦安全局”。这些指控最后都被撤销了。

萨瓦·捷连季耶夫，科米共和国的一名 22 岁博客作者，也面对着同样的指控，他被指煽动仇恨，因为一名当地的记者鲍里斯·舒兰诺娃于 2008 年 3 月在萨瓦的博客上发布留言，批评执法部门。2009 年 7 月，捷连季耶夫被判有罪，缓刑一年。

内务部组建了一套系统专门追踪目标，并建立起一套电子数据库，内容从视频监控录像到诸如购买机票、火车票以及指纹记录等无所不包。安全部门和执法机构同时开始将各自专门针对极端主义分子和通缉犯的数据库合并起来。相关人等的信息为什么被输入到数据库当中，也成为国家机密。

2007 年 5 月，谢尔盖·施莫沃洛斯，一个头发灰白、胡子拉碴的男人，为人权组织工作了 20 年。他从自己位于下诺夫哥罗德的家里出发前往萨马拉，去参加那里的一个独立调查，以查明在前一年圣彼得堡举行八国集团峰会期间，公开抗议行动所受到的限制。

行程当中，他在下诺夫哥罗德、萨马拉，还有在摩尔多瓦共和国，都受到了交通警察的盘查。每一次，交警都会要求他解释自己要去哪里，到达后打算做什么。这些盘查行为明显是早就安排好的，但问题在于，这些人是如何被组织起来的。

“在萨马拉，我很幸运：一位警察很诚实地在报告上写下，他们在按照收到的电报要求对我进行扣押。他们还被要求对我进行盘问，而且是以应对抗议行动的犯罪防御手段进行。”施莫沃洛斯告诉伊琳娜·博罗甘。

施莫沃洛斯在法庭上对自己受到的监控表示抗议。“在法庭上，我收到了一些资料，证明我被置于‘监控’状态下。而作出这一决定的是下诺夫哥罗德有组织犯罪部门，正是该机构允许他们通过购票数据库对我的行动进行监控。”施莫沃洛斯回忆道。他还了解到，2007年，约有3 865名俄罗斯人被置于这种监控之下。现在他们的名字也出现在同一份电子文档之中，这上面记载着统计名单上那些罪犯们的数据。施莫沃洛斯要求法庭承认，这样的措施侵犯了一个人的权利，并敦促内务部销毁所有关于包括他这样的公民的记录，这些人没有被法院确认为极端主义者，但却被列入了这个数据库。

2009年4月22日，下诺夫哥罗德区法院拒绝删除这些记录，而且驳回了施莫沃洛斯的所有控告。尽管施莫沃洛斯败诉，他的诉讼案却反映出对守法公民的监控是如何进行的。

2007年3月19日，施莫沃洛斯的个人信息被录入内务部的数据库，这个数据库被称为“通缉专线”。将他的信息录入数据库的决定是由下诺夫哥罗德区有组织犯罪部门的官员作出的。施莫沃洛斯称，他们认为他将会在下诺夫哥罗德组织一场政治抗议游行。

最初，内务部“通缉专线”的硬件和软件系统用来帮助追踪联邦和地方通缉犯名单上的罪犯。“通缉专线”与“快线”和“主线”数据库相连接，接收有关在俄罗斯购买机票等信息。当一名罪犯购买车票或机票时，相关信息就会传入“通缉专线”服务器，然后被传给地方交通警察，他们能够在当地火车站或机场对目标实施拦截。内务部的总体目标就是要织一张巨大的网，在无远弗届的地区逮捕各种罪犯。

但正如施莫沃洛斯的案子所表明的，关于守法公民的数据也被录入了“通缉专线”。对待罪犯和普通公民的措施事实上是一样的，除了逮捕，警察通过所接收到的指令来决定如何处理未被怀疑有犯罪行为的公民。

监控行动执行过程中会用到掌握在内务部手中的新技术。这包括移动的手持终端，可以连接到内务部所有关于被通缉者的数据。这个工具看上去有点像智能手机，重量不足 7 盎司，可以传送图片、视频，除了其他许多功能之外，还能用来帮助警察实时连接联邦和地方数据库，比如“通缉犯”、“护照”、“武器”、“盗窃案”和“自动传送通缉令至国际刑警”等数据库。

事实上，俄罗斯的每一个大型铁路终端和机场（以及每一节车厢或者每辆城郊火车）都配备有脸部识别系统，名称为“面部锁定”（摄像头被安置在火车车厢里、候车室、收银机上，还有站台上）。多布罗霍托夫被拘留，与这套系统是分不开的。警察的手持装置可以收到多布罗霍托夫的照片，上面会标注特殊符号。

2006 年，系统中共有 3 200 万份指纹材料。两年之后，联邦和地方自动化系统中的指纹数据库已经超过 7 100 万份，而全国人口也不过 1.452 亿。在过去几年当中，几乎所有在莫斯科因抗议被羁押者，都被照相和提取指纹。根据内务部的消息，2009 年，新技术发展使得警察可以实时查看指纹数据库，迅速得

到某人是否在数据库中有存档的回复。

在将潜在的极端主义者的名单输入现存数据库的同时，内务部还开始开发新的、规模更大和更尖端的数据库。

2005 年，内务部开始创建一个“超级”数据库，试图将联邦和地方所有警方数据输入一个系统，而且所有地方分支机构都可以联网使用。这个系统计划在 2011 年建成，现在已经成功将全国各地成百上千个内务部机构连接起来。

据一些参与该网络建设的人士讲，超过 4 000 多个部门的人员将有权进入该数据库。到时，会有一个空间，使所有人员都可以从中获取某人的信息——声音、图像、图片、指纹、身体状况和文本等内容。

2008 年，俄罗斯处在金融危机中，当局被迫削减预算，但对监控项目的热情好像丝毫未受影响。相反，有证据表明，官员们正在扩大在此领域的努力。2008 年底，借助于来自 120 多个地方形势分析中心的数据，一座形势分析中心得以建立，让众多来自内务部和联邦移民局的人员联起手来，监测移民活动，其目的是防止出现社会紧张。

与此同时，内务部开始开发专门的数据库，用来收集潜在的极端主义者的名单。2009 年 4 月 29 日，在叶卡捷琳堡，尤里·科科夫第一次提到了一个叫做“极端主义分子”的系统。这是一个巨大而包罗万象的信息数据库，可以用于调查工作，但在正式的犯罪指控中，尚未被启用。根据本书作者所掌握的情况，2009 年 3 月 31 日，莫斯科的 Sistematica 公司赢得了国家合同，建立一个“反极端主义自动协调系统”。客户是内务部，合同金额超过 38 万美元。这套系统应该在 2010 年 11 月完成。正如合同所说，“这套系统是为了改进情报质量，以支持针对极端主义活动的打击行动。”该文件陈述，开发这套系统时会考虑到建立一个针对反极端主义活动的数据库，还会让内务部、联邦安全局和联邦保

卫局之间自动交换信息。

这套系统将会在每个地方形势分析中心设置分支，以打击极端主义，并将允许 50 名用户同时登录工作。内务部表示，“现在不太可能”评估出这个数据库的大小。换句话说，内务部甚至都说不出大概有多少人会被录入数据库，并受到监控。

俄罗斯扩大后的监控努力，好像与该国的 1993 年宪法直接抵触，该法第 23 条规定：“1. 每个人的私生活、个人和家庭隐私、荣誉和声誉都有不受侵犯的权利。2. 每个人都有在通信、电话交谈、邮寄、电报和其他通信方式方面的保密权。未经法庭准许，不得对此权利进行限制。”

在俄罗斯风声鹤唳的形势下，个人与组织都越来越多地受到尖端监控系统的关注。那些被打上极端主义标签的人们，被录入一个监控名单，而关于他们个人生活中的细节可能都是来自联邦安全局人员。根据俄罗斯法律，任何煽动种族、社会和其他形式的仇恨行为，将被看做极端主义的表现形式。2006 年到 2007 年，还是在普京治下，“极端主义”已经被扩大到媒体对政府官员的批评——这一变化相应地又导致媒体按照政府的要求，将任何被政府视为极端主义者的组织贴上极端主义的标签。普京治下，对这项法律进行的另一项修正，将对极端主义的定义扩展到包括“公开为恐怖主义或其他恐怖活动正名”，但没有对“正名”进行解释。其他的附加修正涉及“极端主义”材料的制作与发放，但却未指明何种材料才被归入此类，此外还引入新的罪行，专门针对记者、媒体泄露信息和犯有上述罪行的印刷商。处罚从罚款到没收生产设备再到彻底叫停媒体的发行工作，最长可达 90 天。

柳德米拉·阿列克谢瓦，总部位于莫斯科的“赫尔辛基组织”（Helsinki

Group) 领导人，将现在俄罗斯的形势和苏联时期与持不同政见者的斗争相对比。“有点似曾相识的感觉：对持不同政见者的监控又复活了，将人们从火车上赶下来，组织各种谈话。”

2009年6月16日，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来自“人权运动”组织的人权活动分子和莫斯科的赫尔辛基组织要求俄罗斯解散内务部的反极端主义局。在声明中，该组织注意到在创建新部门的同时，梅德韦杰夫已经建立起了一个“政治监控系统，由擅长对付危险罪犯的人们组成……将会有个非常宽泛而模糊的标准，将一些人列入目标名单并对他们实施控制”。

这些监控措施与苏联时期的行为并不具有精确的可比性。这个新的更加尖端的俄罗斯体系比苏联时代的措施选择性更强，它的目标仅限于那些有政治野心和强硬地公开表达意见者，反映出了集权的手腕。





The  
New Nobility

THE NEW NOBILITY: THE CHINESE ELIT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第六章  
**新贵：**  
**权贵阶层的锦衣玉食**



在苏联时代，对秘密警察机构的忠诚完全出于恐惧。斯大林时代的做法也殃及了秘密警察机构——许多普通警察和领导层都遭到处决或被监禁。但在其中效劳，收获依旧不少。在克格勃，普通成员可以获得多种津贴，无须长久等待就可以得到免费的公寓。将军们配有公用的黑色伏尔加——苏联最宽敞的小轿车，只有上等阶层的官僚们才能享受——他们也有资格住进位于鲁比利温卡路（Rublyovka Road）上那些由国家修建的高档住房。但这些享有如此之多特权的人们非常清楚，他们只有紧紧把握住自己的位置，才能一直拥有这一切。这些别墅和汽车的真正拥有者是克格勃这个机构。其中的特工，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是国家的公仆。

苏联解体后的多年中，国家公仆们再次培养出奢华的生活方式。老掉牙的伏尔加换成了更大、更高档的黑色奔驰、宝马、奥迪，上面装着特制的牌照、车灯和警报器，这样司机可以直接在莫斯科拥挤的道路上横冲直撞。（有这样的车灯和牌照，司机甚至有权在公路上高速逆行，这在俄罗斯也变成了一种最明

显的特权象征。) 单是在莫斯科, 联邦安全局就有 95 辆这样的交通工具, 而对外情报局只有 14 辆, 国防部也不过只有 19 辆。

20 世纪 90 年代, 俄罗斯的资本主义得到放任, 官员们比他们的前身克格勃更加一门心思地想着挣钱。他们想要拥有更高的工资和养老金, 而且在他们看来, 在国家财产私有化的过程中获利是其权利, 这包括鲁比利温卡黄金地带的高价土地。卢布里奥沃-乌斯彭斯克耶路上有不少小区, 这里从沙俄帝国时代, 就是个有钱人住的地方。这条路的非正式名称是“沙皇路”, 因为“恐怖伊万”<sup>①</sup>在狩猎时曾经住在这里。在苏联时代, 这里舒适的夏日住所、别墅, 都是为苏共中央政治局的领导们、著名的艺术家和科学家还有接近克里姆林宫的人们保留的。但这些豪宅都是暂时提供给他们使用的, 他们根本无法将其变成私人财产。这块地方的一部分被划拨给克格勃修建别墅。

苏联解体后, 俄罗斯的精英们继续占据着这块地方。鲁比利温卡著名的居民区包括巴尔维卡、茹科夫卡、尼科里纳·古拉、乌索沃、高尔基, 这些地方成为新富阶层和强权阶层的保留地。叶利钦一家在巴尔维卡拥有一座小院子。普京选择乌索沃附近的国家公寓; 前寡头米哈伊尔·霍多尔科夫斯基和前总理维克托·切尔诺梅尔金在茹科夫卡小区建造了自己的宅邸; 而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则更喜欢高尔基 9 号的国家公寓。

20 世纪 90 年代, 在森林中进行的建筑工程数量激增。在普京当权的 10 年中, 这种情况再次加剧。传统的木质别墅被巨大的、带有石柱的砖石豪宅替代。鲁比利温卡变成了俄罗斯寡头和强权官员的聚集地。在鲁比利温卡, 一座面积 100 平方米的别墅被估价 20 万美元。

---

<sup>①</sup> 恐怖伊万: 指俄国历史上有名的暴君伊万四世。——编者注

联邦安全局最后成了一个非常富裕的土地拥有者。尽管克格勃在位于鲁比利温卡的别墅属于国家所有，但这些土地已经被国家安全部门管理太久，现在被视为完全由联邦安全局处置的土地。

维克托·阿尔克斯尼斯是见证了鲁比利温卡这些昂贵别墅建成的人之一，他一度在苏联空军担任上校，他的父亲曾经是苏联红军空军的缔造者之一。阿尔克斯尼斯在拉脱维亚服役，但苏联解体后，军队不得不撤离，阿尔克斯尼斯回到了俄罗斯，就住在莫斯科郊外的一个小社区中。当俄罗斯在叶利钦领导下上下喧腾，开始朝向民主和自由市场发展时，阿尔克斯尼斯的声音却代表着过去的观念，他坚决反对俄罗斯的发展方向——资本主义民主制度。阿尔克斯尼斯的一头灰发起伏有致，为人平静而自信，他曾在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工作，那是1989年苏联时代选举产生的议会。他曾经是索尤兹（Soyuz）的领导人之一，索尤兹是一个议会中的组织，其目标是不惜一切代价保护苏联。后来，阿尔克斯尼斯两次在俄罗斯议会任职，他公开批评西方、资本主义及自由主义理念。2003年，他在鲁比利温卡所属的区里，被选入国家杜马。不断出现的百万美元级别的豪宅，一直令他怒不可遏。

2006年，阿尔克斯尼斯发现从2003年到2004年，国家将位于鲁比利温卡的99英亩土地少量地分配给了私人。这些土地共由80小块组成，其中38块是联邦安全局物质支持管理处的财产，而这次分配也得到了联邦安全局领导层的同意。

这块土地彻底分配给了前任或者现任联邦安全局高官。据阿尔克斯尼斯说，这些土地的授让程序是最简化的：一封申请信，接着是一封批准信，就这样这块土地就转手了。

他说，比如，联邦安全局经济安全局的负责人阿列克谢·费奥多罗夫，向奥金佐沃区的官员提出申请，其中附上了联邦安全局负责土地和财产的副局长谢梅年科的要求，要求将土地授予费奥多罗夫。阿尔克斯尼斯补充道，这块土地属于国有，谢梅年科没有任何权力将其转让。奥金佐沃区的高官想都不想就盖了章，阿尔克斯尼斯说。他告诉博罗甘，按照法律，这块土地应该交给联邦产权局出售。

通过研究产权转移记录，本书作者注意到，列入名单的联邦安全局将军们，都不是按照职位或军衔被记录的。比如，少将仅仅被称为“已经服役超过 15 年的军人”。但本书作者也发现，联邦安全局许多高级军官的名字赫然在册，他们一分钱都没有花就拥有了土地。这些人包括阿列克谢·费奥多罗夫，联邦安全局边防局控制处处长米哈伊尔·什库鲁克，独联体反恐中心负责人鲍里斯·梅利尼科夫，这个职位相当于联邦安全局的第一副局长。梅利尼科夫被授予 100 平方米的土地，只交了象征性的 5 美元。

其他获得免费土地的还有叶夫根尼·洛维雷夫，联邦安全局最主要的人事官员；维亚切斯拉沃夫·沃洛赫，前联邦安全局反恐中心主任，他此时已经离开联邦安全局，成为农业部的部长助理；谢尔盖·什金，当时是联邦安全局内部安全处处长。洛维雷夫、沃洛赫、什金都获得了在高尔基 2 号小区的土地。

20 世纪 90 年代末期，高尔基 2 号成为鲁比利温卡地区最受欢迎的区域，三名联邦安全局将军的邻居们也都是新俄罗斯资本主义体制下的干将：戴维·雅各巴什维利，食品生产巨头威姆-比尔-丹（Wimm-Bill-Dann）的董事会主席；俄罗斯铝业（Rusal）的拥有者奥列格·德里帕斯卡，他一度是俄罗斯最富有的人，2008 年在《福布斯》全球富豪榜上排名第九，他的财富价值达 280 亿美元。有一些广告开始在网上出现：“卢布里奥沃-乌斯彭斯克耶路，两

进的院落，位于高尔基 2 号小区，景致独一无二，紧邻莫斯科河，有联邦安全局护卫，拥有全套别墅所有产权文件，价值 475 万美元”（2008 年 11 月 24 日刊登）。考虑到广告中提到的这个价格，发放给什金和洛维雷夫的土地每块的价值都应超过 250 万美元。

阿尔克斯尼斯开始听到选民们的意见，他们对这些土地转手非常愤慨。他向当地政府正式致函询问此事，并将其转发给莫斯科地区的政府部门，但他得到的回复却是不用他操心。因为从政府那里没有得到任何回应，他转而求助于媒体。当伊琳娜·博罗甘关于这些土地转手的报道于 2006 年 3 月在《新报》上刊登后，当局对此完全置之不理。

当本书作者想通过一个联邦产权机构进一步调查此事时，我们被告知这些被免费发放的土地符合一项旨在保证军队和安全部门退役人员有最低保障住房的法律。也就是说，法律被用来保证将俄罗斯最昂贵的土地送给联邦安全局官员。

假如执法部门展开调查，这些将珍贵土地发放给个人的行为就会被描述为由未经授权的将军自己作出的决定。相反，在目前这种情况下，好像一切都符合国家政策。

2007 年，阿尔克斯尼斯在议会选举中丢掉了自己的席位。克里姆林宫改变了议会选举的规则，所以独立候选人已经没有资格再参选。只有正式登记的政党才有资格参与竞争——阿尔克斯尼斯的名字直接从政党名单上被画掉了。

当将军们可以尽情地获得黄金地段的免费土地时，联邦安全局下级工作人员的不满情绪却与日俱增。当一项被称为“系数 2.2”的薪酬体系决策作出后，这种紧张情绪达到顶点，因为根据这一体系，联邦安全局行政人员的工资将是

业务工作人员的 2.2 倍。到 2008 年，联邦安全局官员们开始在莫斯科军事法院控告他们的领导层，要求按照俄罗斯法律授予其住房和福利。

作为回应，联邦安全局组建了一个专门保护高阶将领不受此类诉讼影响的部门。一位联邦安全局上校告诉本书作者：“建起这个部门就是为了保护联邦安全局领导层，而不是普通官员。一次开会时，我所在部门的将军被问起，为何薪酬上有如此之大的差别。他们回答，祖国一度没有足够的金钱，现在国家有了足够的财富，他们就应该为自己的工作获得适当的补偿。”2008 年，本书作者了解到，一群联邦安全局官员向位于斯特拉斯堡的欧洲人权法庭求助，宣称联邦安全局领导层给予他们歧视待遇。这些案件的第一个判决在 2010 年 1 月 14 日作出，原告方获得支持。

除了积累起大量实物资产，联邦安全局领导们也在不遗余力地让自己的家人获益。21 世纪最初几年当中，鲁比利温卡一带的土地被授予亚历山大和弗拉迪斯拉夫·乌格留莫夫，他们是联邦安全局反恐处处长耶尔曼·乌格留莫夫的两个儿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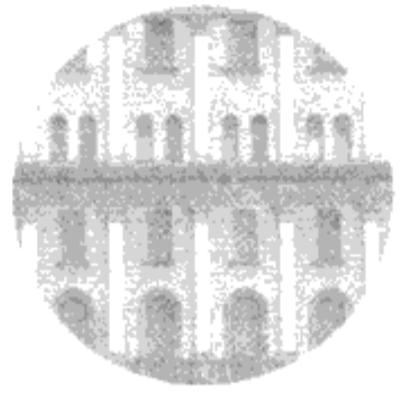
安德烈·帕特鲁舍夫的父亲尼古拉在 1999 年到 2008 年是联邦安全局局长。安德烈被授予一个全职职位，俄罗斯石油公司董事长伊戈尔·谢钦的顾问。2007 年，普京总统授予 26 岁的帕特鲁舍夫勋章，以表彰他为国家服务。帕特鲁舍夫曾经为俄罗斯石油公司的董事长做了 7 个月的顾问，在那之前他在联邦安全局的经济安全局工作了 3 年。

就在同一天，尼古拉·帕特鲁舍夫的哥哥维克托获得了人民友谊勋章，维克托曾在手机通信运营商梅加丰（Megafon）工作了 7 年。这项表彰看起来非常奇怪，因为该勋章一般用来奖励艺术家和外国运动员，奖励的原因是“促进了

俄罗斯联邦和其他国家的友谊与合作”。一个事实可能对此作出了解释，2006年初，维克托已经获得了普京授予的荣誉勋章，因为“他在发展体育文化和运动中有优异表现”。联邦安全局局长的哥哥成为迪纳摩俱乐部（Dynamo）董事长的顾问。这是一家体育俱乐部，自20世纪20年代起就一直受到国家安全机构的资助。

不管是以获得昂贵土地、豪华车辆的形式，还是以获得勋章的形式，联邦安全局雇员们（尤其是那些位高权重者）都能为个人带来巨大的好处。俄罗斯的新安全机构远不只是国家公仆——他们是土地产权的拥有者、强权玩家，有能力影响到人事任免，更能将自己的亲友安插在显要的岗位。





The  
New Nobility

For the first time, the classic BMW roundel -  
the kidney grille, light blue, gold and black

第七章

## 体育： 与竞技运动的密切关系



在神秘的俄罗斯安全机构内部，体育的作用远远超过休闲。安全机构与某些体育协会之间的关系更危险，也更务实。从苏联时代开始，有些俱乐部就与安全机构之间保持着密切的关系，为特种部队提供精英培训场地和大量有用的联络人信息。

2002 年 10 月 23 日，那是一个星期三，几位联邦安全局将军被叫到位于卢比扬卡的总部参加一次大型庆祝活动。包括局长尼古拉·帕特鲁舍夫和两位副局长弗拉基米尔·普罗尼切夫和维克托·科莫戈罗夫在内的领导们，向迪纳摩排球队的教练和队员们颁奖，以奖励其在俄罗斯超级联盟第十一届全国排球锦标赛中的优异表现。（帕特鲁舍夫也玩排球，这是他最喜欢的运动。）帕特鲁舍夫最信任的副局长普罗尼切夫掌管着迪纳摩体育协会。该协会当时包括一个足球俱乐部、两个冰球队，还有篮球队和排球队，甚至还拥有体育场和其他的俱乐部。安全部门和迪纳摩俱乐部从 1923 年成立伊始，就紧紧绑在了一起。普罗尼切夫从 2000 年起，就是协会的负责人，维克托·科莫戈罗夫也拥有该体育组

织的另一个高级职位。帕特鲁舍夫则领导着迪纳摩的排球俱乐部。

仪式举行完毕几个小时后，车臣恐怖分子就占据了莫斯科市中心的一座剧院，里面有超过 800 人。这次事件后来成为俄罗斯过去 10 年中最严重的恐怖袭击。

但袭击并没有对联邦安全局领导们对运动的热爱产生丝毫影响。10 月 26 日星期六，在这次袭击造成的混乱期间，联邦安全局局长出现在了莫斯科的一个体育场，为赛季首场比赛，迪纳摩排球队与巴什基尔石油工作者队的比赛加油。

帕特鲁舍夫对排球的热爱打开了一扇窗口，让我们可以看到安全机构在普京在任 10 年中，如何重新找回了曾经的地位。在苏联时代，克格勃和军方与体育俱乐部之间关系极为紧密的现象很常见。但在 20 世纪 90 年代的重大变迁中，联邦安全局对迪纳摩俱乐部失去了控制，但混乱结束后，帕特鲁舍夫和他的将军们于 21 世纪最初几年当中，重新掌控了这家俱乐部。

苏联时代的传统通过某些体育俱乐部将安全机构和军队紧密联系起来。迪纳摩俱乐部是克格勃和内务部的俱乐部，而中央军队体育俱乐部（CSKA）则属于军方。这不是选择的问题：军队中的所有运动员自动成为中央军队体育俱乐部的成员，如同国家安全机构的运动员们也自动加入迪纳摩俱乐部一样。当克格勃官员们通过体能训练后，他们的服装上就会被打上迪纳摩俱乐部的标志。同样，所有职业运动员在代表迪纳摩俱乐部或中央军队体育俱乐部参加全国和国际体育赛事时，都要展示自己的军阶。如果在比赛当中成绩优良，他们还能从中尉晋升为少校。俄罗斯体育部长雅车斯拉夫·费迪索夫于 2004 年到 2008 年间在任，他是苏联时代著名的冰球防守队员，也在苏联国家队当中长期担任队长，之后他还进入中央军队体育俱乐部、新泽西魔鬼和底特律红翼参加比赛。

他两度赢得史丹利杯，而且一直保留着苏联陆军少校的军衔。从 20 世纪 60 年代到 70 年代，维克托·希洛夫是迪纳摩俱乐部的一名边锋，后来被授予克格勃中校。20 世纪 70 年代到 80 年代初，迪纳摩俱乐部的场地则都被克格勃突击队员用来进行绝密训练。

1978 年 11 月，两名古巴官员劳尔·里佐和拉米罗·奇里诺秘密来到莫斯科。这两位著名的空手道教练被请到苏联，因为克格勃副主席弗拉基米尔·皮罗日科夫，对古巴的武术训练系统极为赞赏。古巴人向他展示了所谓的“行动空手道”，非常适合特种部队官兵。

在苏联，空手道被看做最危险的武术，只有克格勃的精英才有资格学习和进行空手道比赛。在三个月当中，里佐和奇里诺在迪纳摩俱乐部位于莫斯科市中心彼得罗夫卡街的训练场地培训了 100 多名克格勃官员。其中只有 15 人被授予教练资格。他们的技能被认为极其机密，克格勃官员只能被允许参加迪纳摩俱乐部的内部比赛，禁止与其他俱乐部的成员比赛。直到 1991 年，俄罗斯一直都有两派空手道：迪纳摩俱乐部派是实战派，还有非迪纳摩俱乐部派，仅致力于比赛。

在迪纳摩俱乐部，教练、工作人员还有行政人员已经被国家安全组织指派和监控了几十年。到 20 世纪 50 年代末期，该俱乐部的所有重要岗位都被安全机构的成员们占据了。许多年中，迪纳摩俱乐部一直作为克格勃和内务部的训练基地。克格勃官员结束活跃储备状态后，会被分派到俱乐部各个岗位上。

苏联解体后，这些被克格勃指派到俱乐部的官员被召回，俱乐部的经费也被削减。情报机构正式获得了在迪纳摩俱乐部的利益，但控制权却落在了内务部手里。

叶利钦将安全机构的官员们重新派驻到迪纳摩俱乐部组织当中，通过 1996

年颁布法令建立“迪纳摩国家体育协会”，使得该机构成为一个监控不同运动与比赛的综合机构。安全机构的官员们开始重新渗透进俱乐部当中。在该俱乐部供职的 500 名官员当中，有 226 人来自内务部，78 人来自联邦安全局，52 人来自边防警察局，11 人来自对外情报局，90 人来自税务警察局，43 人来自联邦通讯局。

这项法令直到 1999 年 12 月才得以全面执行，法令为何迟迟未生效的原因不明。联邦安全局在 2000 年公开接手迪纳摩俱乐部，当时的联邦安全局副局长普罗尼切夫被任命为迪纳摩全国协会的主席。这位身体健硕的将军声誉颇高，因为他在特别行动当中经验丰富。曾经在 1994 年到 1995 年担任联邦安全局局长，并于 1999 年短暂担任总理的谢尔盖·斯捷帕申，被任命为该俱乐部理事会主席。这种裙带关系在地方层级的任命中得到了更进一步强化。比如维克托·扎哈罗夫，联邦安全局莫斯科分部的负责人，掌管着莫斯科市的迪纳摩俱乐部组织。

迪纳摩俱乐部有联邦安全局作为其资助者，在经历了 10 年的经济捉襟见肘后，钱的问题迎刃而解。2001 年，俱乐部与米哈伊尔·霍多尔科夫斯基的尤科斯（Yukos）签订了赞助协议，尤科斯当时是俄罗斯最大的石油企业。当霍多尔科夫斯基在 2003 年被捕，尤科斯开始在官方压力下逐渐垮下来之后，迪纳摩俱乐部求助于另一家投资商，并于 2004 年和总部位于摩纳哥的硫生产商 Fedcominvest 公司签订合作协议。该公司的老板俄罗斯商人阿列克谢·费多雷切夫很快就将估计 2 亿美元的资金注入了这家俱乐部。迪纳摩俱乐部的下一位资助者，是根据 2008 年 2 月签署的协议加入进来的，那就是金属投资公司（Metalloinvest），由钢铁巨头阿里舍尔·奥斯曼诺夫掌管。阿里舍尔本人多年来一直是迪纳摩俱乐部的忠实粉丝。2009 年 4 月，俄罗斯国有的外贸银行

(Vneshtorgbank) 宣布，该行已经替代金属投资公司成为迪纳摩俱乐部的总赞助人，帮助经济上陷入困境的迪纳摩偿还为修建新体育场而欠下的贷款。

俄罗斯的俱乐部要想获得成功，赞助人的帮助至关重要，而这些赞助人只是从俱乐部的票房收入中拿走很小的一部分。据迪纳摩俱乐部透露，2009 年俱乐部总额 18 亿卢布的预算中，俱乐部之外的投资要占据 10 亿卢布。

对体育俱乐部来说，有了联邦安全局的保护意味着不会再有资金问题，也意味着有接触当地高官的机会，甚至有可能偶尔接触克里姆林宫。这比 20 世纪 90 年代初体育俱乐部的境况好了不少，当时的警务部门给俱乐部提供金钱和友谊，以换取改善自身公众形象的机会。

比做生意更有好处的是，体育变成了一个很容易和方便的途径，联邦安全局的将军们可以借此与一些重要人物建立非正式联系。全国排球联合会一直被联邦安全局将军们控制着，这些控制者包括 2004 年以后的帕特鲁舍夫。联合会的下一位领导人是奥列格 · 多布罗代夫，他同时是全俄国家电视与广播公司的董事长，曾经当选为副总统。2009 年 10 月，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命令国家安全官员们离开他们的体育联合会领导职位，声称体育组织应该由专业人士领导。多数政府官员们遵命撤离。联邦安全局在表面上也遵守了命令，但事实上，这个机构仍然想办法保持着对体育机构的控制。2009 年 11 月 18 日，帕特鲁舍夫作为联合会主席退休，但他立刻被选为联合会顾问委员会主席，而两位联邦安全局将军则保留着在联合会内的职位。

当迪纳摩俱乐部从一位又一位大亨的手中转来转去时（这些人心甘情愿支持有联邦安全局撑腰的俱乐部），前国家安全官员们被安排在了其他体育组织的重要岗位上。2003 年，弗拉基米尔 · 普鲁舍夫被任命为俄罗斯全国曲棍球队总教练，他曾是克格勃反恐部门的中校。2004 年，另一位反恐专家，米哈伊

尔·格洛瓦托夫被任命为俄罗斯滑雪联合会主席。以前，格洛瓦托夫曾经是国家滑雪队的成员——而且在 20 世纪 90 年代，他还担任过克格勃特种部队阿尔法的负责人。

2006 年 10 月，联邦安全局边防警察局中央体育俱乐部负责人尼古拉·马利科夫上校被任命为俄罗斯国家赛猪队主教练，这个队属于运动赛猪联合会，该联合会号称旗下拥有超过 100 家会员组织。从 2005 年开始，运动赛猪联合会一直在莫斯科主办赛猪奥运会。2008 年的那一届，普京总统还带着自己的猪参加了这一赛事。小猪们要参加三项比赛：跑步、游泳和“猪球”。

通过在体育领域的交流，安全机构的官员们和一些影响力巨大的商人、学者、媒体人士在一个看似没有利益瓜葛的环境中保持着紧密联系。

第八章  
前传：  
**尤里·安德罗波夫的复兴**





作为普京战略的一部分，他在苏联解体后的一段时间内，提高了安全机构的形象，小心设计和修饰对尤里·安德罗波夫经历的描述，将冷峻的克格勃领袖刻画成了一位称职、高效的领导人，并对国家和全球经济拥有出众的理解。随着领导联邦安全局进入一个新的时代——在这个时代，反恐占据了很大的比重——普京选择赞扬一名旧时代的国家守卫者，一名留下了冷峻传统的领袖。

在 1991 年针对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的政变企图失败后，一大群人在克格勃莫斯科总部外将费利克斯·捷尔任斯基的雕像推倒，此人是布尔什维克革命后第一任苏联秘密警察的领导人。在这座建筑的一个角落里，有一块纪念尤里·安德罗波夫的牌匾，他是担任苏联秘密警察领导人时间最长的一位，在 1984 年去世前是苏共总书记。当大批的群众围绕在捷尔任斯基雕像周围时，克格勃官员们趁着黑夜，将安德罗波夫的牌匾悄悄地移走，以防止被毁。

1999 年夏天，当普京还担任联邦安全局局长时，决定在这座大厦恢复安德

罗波夫的牌匾。1999年12月20日，普京以俄罗斯总理的新身份，参加了牌匾剪彩仪式。

这一事件标志着一场运动的开始，这旨在肯定安德罗波夫的成就，以证明安全机构能够带领俄罗斯走出困境。具体的目标，是用他的形象来展示国家安全机构解决国家面临的各种问题的能力——政治的还有社会和经济的。同时，这位极推崇纪律和控制的领导人吸引着安全机构，而后者也急于在长达10年的变局中重塑自我。

关于安德罗波夫的事实根本不值得赞美。为了掩盖他生活中阴暗的一面，联邦安全局把他宣扬为一位谦虚、极为聪明的自律者——一位懂经济的诗人，一个努力对抗腐败的人。

事实上，安德罗波夫有19年都是苏联秘密警察部门的负责人。他担任苏共总书记也不过15个月——时间之短，让他作不出任何具有持续性的改变。

安德罗波夫在1954年崭露头角，当时他被派驻匈牙利担任大使，在任时还经历了1956年匈牙利起义。据英国情报部门的历史学家克里斯托弗·安德鲁称，匈牙利抵抗力量令人惊恐的行为，给安德罗波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惊恐地从大使馆的窗户里看到，那些备受憎恨的匈牙利安全机构官员被吊在了路灯柱上。安德罗波夫心头的阴影久久挥之不去，一个看似强大的国家，竟然能够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分崩离析”。

1967年，安德罗波夫被任命为克格勃负责人。因为忌惮持不同政见者运动，他上任两个月后就创建了声名狼藉的克格勃第五局，负责进行政治调查。在他看来，持不同政见者“违犯法律，向西方国家提供虚假的信息，到处散播谣言，还试图组织各种反苏联的社团。这些叛徒毫无贡献，在我们的国家中也是可以被清除的”。

作为克格勃领导人，安德罗波夫扩大了将持不同政见者关进精神病院的政策。弗拉基米尔·布科夫斯基，一名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创始人，就在1936年被送进精神病院，因为他在两年中影印了大量反苏联的印刷品（这种行为是非法的），那是米洛万·吉拉斯写的《新阶层》。关进精神病院的惩罚，还不光局限于那些政治犯。著名的俄罗斯雕塑家米哈伊尔·舍米亚金就被迫接受过精神病治疗，以“治愈”他不符合苏联规范的观点。布科夫斯基和舍米亚金最终分别在1976年和1971年被驱逐出苏联。

随着新的安全机构领导人开始经营自己的形象，他们有意回避了安德罗波夫的负面形象。他们将安德罗波夫自己的宣传手法借用了过来。安德罗波夫曾经为苏联国家安全部门创始人费利克斯·捷尔任斯基进行过一场美化运动，对捷尔任斯基的过去一笔带过，将他的个人美德放大。在安德罗波夫的描述中，捷尔任斯基是一个非常内敛、生活检点的人，他睡在一张狭窄的铁床上，吃的是分配给他的最粗劣的食物。

对安德罗波夫的神化也采用了同样的方式。2004年，在俄罗斯庆祝安德罗波夫诞辰90周年时，各种庆祝活动中包括将一所学校以他的名字重新命名，揭幕了一座10英尺高的安德罗波夫雕像，还有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几项奖学金，将授予那些想要成为情报官员的学生。在安德罗波夫的家乡那古茨卡亚，联邦安全局副局长亚历山大·日丹科夫和其他有头有脸的人物也参加了庆祝活动。

就在同一年，几本歌功颂德的书出版，作为联邦安全局美化安德罗波夫的一部分，这几本书是：《鲜为人知的安德罗波夫》、《安德罗波夫的团队》、《尤里·安德罗波夫：你所知与不知道的》、《安德罗波夫》。当时的联邦安全局局长尼古拉·帕特鲁舍夫在国有报纸《俄罗斯政府公报》上发表了一篇重要文章《神秘的安德罗波夫》。他在文中表示，联邦安全局的官员“保持着最职业、最

爱国的价值观，而这全由这位不同寻常的人缔造，他是一位职业政治家和知识分子，他创造了适应（安德罗波夫时代）需要的机构”。

除了作为领导人的出色才干，安德罗波夫还被赞颂拥有伟大的经济头脑，致力于重塑国家安全机构，并且在历史上参与了国家的经济政策制定。21世纪最初几年当中，联邦安全局博物馆中展出了安德罗波夫的前辈捷尔任斯基关于经济政策和打击官僚主义的语录。莫斯科市长尤里·卢日科夫在2002年提议，在卢比扬卡广场上重建捷尔任斯基的雕像：“捷尔任斯基作出了重要贡献，找到了解决社会动荡问题的方法，重建了铁路，促进了经济复苏。内务人民委员会（NKVD）和克格勃将追随捷尔任斯基的脚步。”

安德罗波夫成为这个体制下第二英明的经济学家。一段故事被广泛传播，在勃列日涅夫时期，经过很多年的经济停滞后，安德罗波夫试图提出一套经济改革计划，而且他是后来戈尔巴乔夫进行的重建计划，即苏联经济体制重建计划的启动者。

根据这个故事，因为1984年安德罗波夫去世，所以他的经济改革计划未得到实现。俄罗斯科学院精英研究所的负责人奥尔佳·格里什塔诺夫斯卡亚在2007年接受采访时表示：“安德罗波夫认为，对安全机构的人们来说，中国是最理想的模范。他们认为这才是正确的路径。他们以为叶利钦走向了错误的方向，戈尔巴乔夫也是如此。”

为了将这场造神运动推向更高阶段，一名联邦安全局高官宣称，安全机构为伟大的管理者们创建了一个先贤祠。在2001年的一次采访中，当时的联邦安全局第一副局长弗拉基米尔·舒尔茨表示，这些伟大的管理者包括费利克斯·捷尔任斯基、尤里·安德罗波夫、谢尔盖·斯捷帕申（1994年至1995年

担任联邦安全局局长，1999 年担任总理）、弗拉基米尔·普京还有尼古拉·帕特鲁舍夫（当时的联邦安全局局长）。

按照联邦安全局的观点，要让公众知晓国家需要安全机构对经济的专门知识，但其实这是为他们在政府和商界谋求高级职位寻找合法性。这些管理职位要求的不是在联邦安全局学院学到的知识。将军们和其他官员们必须解释——为他们自己也是为社会——他们为什么有资格从事自己并无相应背景的工作。

安德罗波夫的遗产进一步促进了联邦安全局所宣称的理念，即这个国家遇到的困难是由外部因素引起的，而不是由于内部的问题。赞颂安德罗波夫的运动中的一个关键人物是奥列格·赫洛布斯托夫，他是联邦安全局官员和联邦安全局学院的资深研究员，还是《鲜为人知的安德罗波夫》一书的作者。他于 2004 年 12 月在卢比扬卡作的讲座“安德罗波夫现象”中，引用安德罗波夫的话说：“现在，对苏联安全的威胁之源来自外部。国外的阶级敌人试图在我们的国土上从事颠覆性的活动，制造意识形态上的混乱。”

这种观点在如今俄罗斯的联邦安全局官员当中广为接受。抗议活动多数都会被看做是受到了西方资助，他们非常乐意看到俄罗斯也发生所谓的橙色革命——2004 年 11 月到 2005 年 1 月间，发生在乌克兰的一系列抗议行动，起因是乌克兰民众宣称选举出现舞弊，这场革命最终导致重新选举，而亲西方的候选人维克托·尤先科最终获胜。2008 年俄罗斯总统选举前夜，对这种革命的恐惧进一步加剧。

重达 15 吨的捷尔任斯基雕像被推倒在卢比扬卡总部前后，被转移到了莫斯科一个艺术中心后面的小公园里。这个公园后来很出名，被称为“倒下的雕像公园”。

每年都有一些俄罗斯政客发动运动以求重竖雕像。每一次，他们都遭到人权活动者的反对。一些自由主义者担心普京可能会在自己任期内重竖这座雕像，但这种事情一直没有发生。在他的任上，普京竖立起了不少纪念碑，纪念安德罗波夫和捷尔任斯基，但却从未试图要在广场上重竖这座巨大的雕像。

事实上，安德罗波夫的神话被证明多数都是由安全机构内的一些普通成员导演的。有一个例子，一座捷尔任斯基的雕像被重建起来，但只是在彼得罗夫卡 38 号，一个国家警察部门的院子里。普京和安全机构似乎非常清楚，俄罗斯社会对苏联时代的国家安全问题毫不关心，他们也不想将此强加给大众。建立克格勃英烈们的先贤祠，让普京很高兴，只是因为这些活动被限制在安全机构内部。即便他们试图创建一项全新的安德罗波夫遗产，安全机构也还是对真实发生的历史遮遮掩掩。

今天，关于苏联国家安全的档案仍然多数都是保密的。许多资料都只向秘密警察部门的工作人员开放，而且即便在苏联解体 19 年以后，是否向公众开放克格勃档案，仍然是一件具有广泛争议的事情。与此同时，一些在 20 世纪 90 年代开放了的档案，在普京任职的 10 年中又被重新关闭。

1992 年，叶利钦政府要求苏联时期的持不同政见者弗拉基米尔·布科夫斯基前往俄罗斯宪法法院，为对苏联共产党进行的审判作证。为了准备自己的证词，布科夫斯基被允许接触大量苏联档案文件。通过一个小型的手持扫描仪和一台笔记本电脑，他设法扫描了许多文件——包括克格勃向苏共中央委员会提交的报告——并将这些文件偷偷运到国外。（布科夫斯基后来告诉本书作者，他被允许扫描这些文档，只是因为负责管理档案的官员并不知道扫描仪为何物。）

布科夫斯基的努力成就了一本书《莫斯科审判》还有一个网站。

1993 年，俄罗斯加入国际档案委员会，该委员会创建了一个由专家组成的小组，准备对有过镇压民众历史的国家的档案进行整理，并提供一份如何使用此类档案的建议。但经过叶利钦和最高苏维埃在 1993 年 10 月的冲突之后，转交执法部门和秘密警察档案的问题被压了下来。

大多数苏联时代的安全机构档案一直被保留在联邦安全局的档案室、内务部和公共检察院军事办公室。最后，一个机构间保护国家机密委员会被创建，以替代销密委员会。结果，1995 年之前，可以向公众开放的大量文件也被重新锁了起来。比如，人权组织“记忆”的专家尼基塔·派绰夫声称，之前已经解密的关于苏共中央委员会的文件已经被对外情报局从俄罗斯国家档案馆现代史分馆取走。

2006 年 5 月，为了纪念莫斯科赫尔辛基观察组织成立 13 周年，乔治·华盛顿大学的国家安全档案馆将一系列来自前苏联的档案挂在网上。这些档案是关于莫斯科赫尔辛基组织的，其中包括克格勃向中央委员会提交的报告，即关于那些在 13 年前发起组建该组织的“反社会因素”，以及克格勃用来“停止他们的敌对行动”的各种各样的措施。

这些被国家安全档案馆公布在互联网上的档案来自沃尔科戈诺夫档案，是沃尔科戈诺夫在 20 世纪 90 年代捐献给美国国会图书馆的。于是，这些讲述苏联政府压制持不同政见者的报告，在 2006 年以俄文版和英文版的形式同时出现在互联网上。而在俄罗斯，这些文件却在整个 21 世纪最初 10 年中都被封存、保密，其理由是遵守国家机密法。

2007 年 7 月，联邦安全局声称有 200 万份关于 1920 年到 1950 年间的镇压档案被公之于众。这份声明被广泛视为联邦安全局透明化和愿意揭秘档案的证

据。但事实上，这些文件根本不让历史学家们染指：只有受害者的亲属才有资格接触。

卡廷事件至今仍然是波兰与俄罗斯关系中的一个痛处。1940年，从俄罗斯到乌克兰，成千上万被关押的波兰官兵被屠杀（其中最著名的一次发生在俄罗斯西部的卡廷森林中）。苏联当局否认对此事承担责任，将污水泼在德国人身上。到了1990年，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承认，是苏联人杀死了波兰俘虏。叶利钦开放了调查此事的机密档案，但在普京当权的10年，俄罗斯的军事检察院叫停了这项调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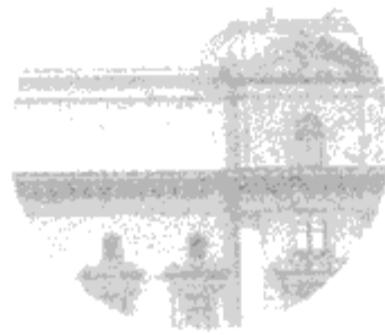
2009年1月，俄罗斯高等法院将众多请愿者的要求推翻，拒绝重新开始调查，理由是所有被要求在调查中提供证词的犯罪者均已去世，而受害者家属也未能提供基因证据，以证明其与那些在屠杀中丧生者有何关系。据卡廷惨案受害者的代理律师安娜·斯塔维茨卡亚称，“这项决定意味着请愿者们将无法再就此事向俄罗斯寻求说法”，而这些人只好求助于位于斯特拉斯堡的欧洲人权法庭。不过，在波兰总统卡钦斯基于2010年4月10日在斯摩棱斯克附近坠机身亡后，梅德韦杰夫向波兰转交了67卷关于卡廷屠杀的档案。

2008年底，联邦安全局位于特沃（莫斯科城外的一个地区）的分部，出版了一本纪念该分部成立19年的图书。书中称，内务人民委员会（克格勃前身）的少校德米特里·托卡列夫曾经在当地国家安全工作领导层中担任要职。托卡列夫在1938年到1945年之间，掌管着特沃的内务人民委员会，他也被描述成一位战斗英雄，并在清除德国间谍方面功勋显著。但他的部门于1940年春天在奥斯塔什科夫集中营同样也负责处决了6000名波兰军官。处决行动的“执行报告”的签署者正是托卡列夫。但在出版的那本书中，对这段往事却只字未提。

从来没有一本披露苏联秘密警察错误行为的出版物。所有相关历史的公布，都会不可避免地指向曾经在克格勃服役的许多人。这些秘密档案也都被严格地保管起来。联邦安全局和克格勃的旧部，都想让此事维持现状。



The  
New Nobility  
THE NEW NOBILITY. THE 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  
FBI. GOVERN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宣传：  
**影像里的联邦安全局**



在应对公众舆论方面，俄罗斯的安全机构举重若轻。它们，尤其是克格勃的继任者，是保守机密的典范，而且从来无须向公众解释其行为。在苏联体制下，国家和党高于一切：没有那种能够将人民与执政者联系起来的公民社会。但在新俄罗斯，一个喧嚣但并不完美的民主制度正在崛起——公民社会的萌芽已经出现，安全机构无法对其视而不见，更无法将其掩藏。

在普京掌权的 10 年中，联邦安全局应对过去与当前冲突的方式就是通过宣传影片，将安全机构描述成他们想要看到的样子——执行光荣使命的特工。尽管有许多可以用来影响公众的途径，比如图书、新闻媒体和网络，但联邦安全局还是决定将重点放在电影和电视上。这些努力提供了另一个窗口，让我们看到新俄罗斯复兴后的安全机构如何运作。

2001 年，一个系列剧《特殊部门》在电视台播出。在这个剧集当中，圣彼得堡的联邦安全局特工制止了针对俄罗斯珍贵艺术品的盗窃和走私行为。这出剧集中的主角是这座城市中一位老学者的后人，他曾经是特种部队成员，曾在

阿富汗服役，回国的目的是为了如同隐士一样保护俄罗斯博物馆中的艺术品。《秘密观察》是一部关于联邦安全局监听局的电视连续剧，从 2005 年秋天开始播出。这部剧的主要内容是秘密特工通过跟踪一些人的方式，寻找恐怖分子。这部电视剧同样得到了联邦安全局的资助。2007 年俄罗斯电视台播出了《特别小组》，这是一部 16 集的电视剧，内容是关于莫斯科联邦安全局的英雄行为，比如防止恐怖分子的计划和调查金融交易等。这部电视剧的制作，当然得到了联邦安全局的幕后资助。

2004 年 12 月，联邦安全局资助的大片进行首映，这就是耗费 700 万美元的影片《狗牌》（其英语译名是《倒计时》）。这部电影讲述了两次真实存在的恐怖分子的攻击行动（1999 年莫斯科公寓大楼爆炸案和 2002 年杜布罗夫卡剧院危机），拍摄影片的目的就是为联邦安全局树立良好形象。

对莫斯科公寓大楼的爆炸事件，影片基本上保留了事件原貌，但在杜布罗夫卡剧院人质危机中，影片的制片方则将真实事件中的剧院换成了马戏团作为场景。主角是一名联邦安全局官员，他在车臣被捕并被迫承认参与了爆炸事件。（这个故事来源于军事情报官员阿列克谢·加特林真实和富有争议的一段经历。他被车臣人俘虏，并通过视频的形式作出了类似表态。加特林后来逃走，并否认了之前的表态，说那是在受折磨后不得已为之。）

在影片中，一名叫做波克罗夫斯基的寡头被驱逐出境，后生活在西方国家。他公然与俄罗斯总统相对抗，且与阿拉伯恐怖分子和车臣人密谋，实施人质劫持计划，目标就是莫斯科的一家马戏团。影片中关于波克罗夫斯基的细节，与俄罗斯大亨鲍里斯·别列佐夫斯基惊人的相似。此人于 2001 年出逃伦敦。但劫持人质只不过是一个更大的恐怖袭击中的第一步——恐怖分子的计划是要在罗马举行的八国集团峰会上制造爆炸案。影片主角，联邦安全局官员拯救了人质，

击败恐怖分子，解除危机。

影片制片人并未隐瞒他们得到了当时联邦安全局副局长弗拉基米尔·阿尼西莫夫的建议，也不曾否认影片拍摄过程中得到了联邦安全局的支持。具有广泛影响的影评人尤里·格拉迪施科夫表示，“我们看到的是第一部私人制作的商业反恐大片，但看上去也得到了情报机构的支持。”他补充道，“自苏联时代以来，国家终于懂得了电影的力量。”

2006年2月，联邦安全局恢复了一项比赛，该赛事早在安德罗波夫时代就曾经存在。比赛内容是关于国家安全行动的最佳文学和艺术作品。联邦安全局公共传播中心的官员奥列格·马特维耶夫承认，联邦安全局已经公开回归克格勃传统。他告诉《生意人报》：“这是回归过往经验。从1978年到1988年，一直有一个克格勃艺术奖。该奖项也颁发给创造了克格勃正面形象的雇员……现如今，不论是在电影还是电视剧中，特种部队总是以负面形象出现，所以我们决定重新启动这项评比，以奖励那些没有贬低情报机构工作人员，并创造出他们作为国家守卫者的良好形象的人们。”

第一届奖项颁发给了《倒计时》。

下一部卖座电影是《末日代码》，影片的女主角——一名漂亮的联邦安全局上校——拯救了7个国家的首都。该片在2007年获得了联邦安全局嘉奖，而关于情报机构在“二战”结束后，在敖德萨打击犯罪团伙的影片《报应》在2008年获奖。

在《倒计时》取得成功后，联邦安全局又将重点转向俄罗斯国家电视台。纪录片被视为最佳的宣传工具，因为这类影片制作费用低廉，制作流程短，而且能以独立新闻调查的形式播出，从而弱化联邦安全局和影片的联系。而最好

的地方在于，这类片子能够直接呈献给数以百万计的观众。

2006年1月，纪录片《间谍》上映，讲述了英国间谍在俄罗斯的活动，也让联邦安全局的形象得到了提升。影片导演是记者阿尔卡季·马蒙托夫，影片中展示了一段视频，这段视频由联邦安全局监听团队获得。视频中，一名英国大使馆的官员在一条不知名的莫斯科街道行走。联邦安全局在影片中声称，这名英国外交官名叫马克·多伊。他试图从一个被伪装成一块石头的间谍通信工具中获取数据，这个工具后来被广泛称为“间谍石”。

这块石头的X光片在影片中被展示出来，四块电池和一个无线电发射器被紧紧地塞进石块，这成为多伊从事间谍行为的证据。然后，马蒙托夫的纪录片又调查了多伊与俄罗斯非政府组织的联系：那些俄罗斯最受人尊敬的非政府组织的名字赫然出现在一份受到英国政府财政资助的组织名单上，多伊也被称为非政府组织的接头人。

这部纪录片在普京签署法令，收紧对非政府组织的管理规则后两个星期播出。该片被用来说明，俄罗斯最大的此类组织与英国情报机构存在联系。

联邦安全局的公共传播中心乐于将这样一块间谍石的案例展示给记者们。联邦安全局的发言人谢尔盖·伊格纳琴科表示，“根据我们的专家的意见，制作这个装置要花费数百万英镑。这是一个技术奇迹。”联邦安全局声称，一名俄罗斯人被怀疑为英国人从事间谍活动，但最后却没有外国间谍被抓。联邦安全局表示，这名俄罗斯人被捕，但却没有后续的审判。除此之外，联邦安全局甚至都没有找到这块间谍石以作为从事间谍活动的证据。（据伊格纳琴科说，在新闻发布会上展示的石头，是后来在莫斯科另一个地方起获的。）最后，英国大使馆的四个人被控参与间谍行动，但他们没有被驱逐出俄罗斯，对真实的间谍案件来说，这样的行为极为鲜见。

当《间谍》被很多人看做是透明的宣传方式时，非政府组织却极为惊恐，它们担心自己会被指控窝藏间谍。

《间谍》为后续的纪录片定下了基调。在一部于2008年4月上映、名为《高加索计划》的影片中，一名记者声称找到了中央情报局支持第一次车臣战争的证据。

2000年，本书作者在一家日报《消息报》工作。那年夏天，索尔达托夫接到了奥列格·科斯蒂纳的电话，她是曾经为梅纳捷普银行（MENATEP，寡头米哈伊尔·霍多尔科夫斯基名下的银行）工作过的公关人员。她解释称，联邦安全局建立了一个“非官方”的媒体机构，相比联邦安全局的官方公共传播中心，记者们可以更容易地从这个机构获得信息，而正是她受雇组建了这个机构。她告诉索尔达托夫，联邦安全局内部正在建立更高级别的委员会，以监督这条新的宣传渠道。

科斯蒂纳很快就为索尔达托夫安排了采访维克托·扎哈罗夫的机会，他是联邦安全局莫斯科分部新上任的负责人。（这时，有传闻说普京计划改革联邦安全局，采访一名该机构高官，将可能有机会获得更多可靠信息。）但到达后，索尔达托夫被安排在一个巨大的会议室里，隔着一张很长的会议桌。9到10位顾问坐在桌边，让索尔达托夫根本无法向扎哈罗夫直接提问。隔着桌子，这位联邦安全局高官坐得很远，身穿制服，脸胖乎乎的，长相并不怎么吸引人。

他手里攥着几张纸。纸上都是索尔达托夫提前发来的问题，还有已经获得批准的标准答案。

扎哈罗夫开始大声念稿子，索尔达托夫备受打击。他试图问一些其他问题，但得到的答案都是官话。“我的命运没有任何特殊之处，”这位联邦安全局将军

说，“我出生在一个工人家庭，1973年毕业于莫斯科铁路工程学院。”他在1975年加入克格勃。在会面快结束时，扎哈罗夫在交给索尔达托夫一盘联邦安全局歌曲磁带后，变得活跃了一点。所有这些歌曲都是由瓦西里·斯塔维茨基创作的，此人是当时联邦安全局公共传播中心主任，也是这个安全机构当中一位公认的诗人。

这位将军确实提供了一次采访机会，却未能提供任何信息。

磁带中的一首歌成为联邦安全局的官方歌曲，其中的歌词有这样几句：

冲锋在前，  
忠于职守，  
别碰俄罗斯——  
契卡人永远保持着警惕。

接下来的一个星期，科斯蒂纳邀请索尔达托夫加入一个可以得到联邦安全局简报的记者“小组”。索尔达托夫被告知，这个小组中共有来自不同报社的5名记者，他们会定期到卢比扬卡总部获取最新信息。他们都是同时得到发布的信息，他们的报道也就是如此产生的：在各自的媒体上同时刊出。在与扎哈罗夫见过面之后，索尔达托夫拒绝加入这个小组。之后不久，本书作者离开了《消息报》，这家报社变得越来越倾向政府。但这个小组却存在了很多年，成为影响媒体报道的一个工具。

2001年1月29日和30日，俄罗斯两家最大的日报《消息报》和《共青团真理报》，刊发了关于前俄罗斯陆军军官瓦西里·卡林金的封面报道，此人已经被革去军衔。报道声称，他已经在1991年离开俄罗斯陆军，加入了车臣叛军，并在之后进入阿富汗的一个恐怖分子训练营，接受一个名为“比尔”（这个名字

几乎毫不掩饰地表明，有中情局参与其中）的人的训练。这篇报道认为，卡林金与美国情报机构签订了一份合作协议，然后在 1994 年回到俄罗斯，并成为一名潜伏特工。根据两份报纸的描述，卡林金等待了 6 年之久，然后接到命令炸毁伏尔加水电站——欧洲最大的水坝，长 725 米，高 44 米，全部由混凝土建成，横跨伏尔加河。

两篇报道都表明，2000 年 7 月，车臣叛军代表找到卡林金，传达让他对伏尔加格勒大坝执行恐怖袭击的命令。当年 11 月，卡林金向军队反间谍部门投案自首。

这些明显由联邦安全局炮制的报道，充满了漏洞：文中没有解释，为何卡林金要作为潜伏特工等待 6 年之久，他为什么要到 2000 年底才接到命令执行恐怖袭击，更没有提及，他打算如何炸毁一个水电站。几天之后，卡林金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再次重申了自己的说法。他接受俄罗斯媒体的采访，并声称他签署过的“招募文件”的“左下角印着自由女神像，而且文件的抬头写着‘奥萨马·本·拉登临时学校’”。最有说服力的地方在于，这篇报道被刊登在俄罗斯最大的两家报纸，文章内容正是联邦安全局想要大家看到的，而且缺少足够的支持证据。

卡林金案是一个由苏联克格勃发明的策略的实例，这种策略主要是用在国外行动中，这被称为“活动策略”，或者“政治策略”，往往用来在一个特定国家引导一些重大事件的进程。还有一个相关的策略被称为“援助计划”或者叫做“援助行动”，其目的在于改变一个外国政府的政策或立场，以使其“援助”苏联的立场。

谢尔盖·特列季亚科夫是前俄罗斯驻纽约的一名对外情报官员，他在 2000 年时叛逃美国。在他看来，“活动策略”与“援助行动”之间并无区别。他告诉

索尔达托夫，“克格勃第一总局，一个叫做‘A’处（负责‘活动策略’）的单位负责执行行动。当第一总局被重命名为对外情报局时，A处也被重命名为援助行动处。20世纪90年代初，中央情报局曾经要求对外情报局停止执行‘活动策略’，因为这些行动危害到了美国的国家安全。结果，该处被赋予新名称，但其工作方式、组织结构还有雇员都被保留。”

“活动策略”基于客观程度95%的情报之上，再加入一些其他信息，使其成为目标情报或假情报。1999年，这种方式得到兹达诺维奇的公开承认，他是当时联邦安全局公共传播中心主任，并兼任新成立的援助计划部门负责人。他的这一行为使得许多联邦安全局一线官员大失颜面，他们很不乐意，因为兹达诺维奇透露了一个原本应被保守的秘密，而且他也明显将自己摆在了假情报部门负责人的位置上。

1999年9月9日，午夜过后不久，在莫斯科东南部的古尔亚纳瓦大街上，一座居民楼一层被600磅到800磅的炸药引爆。这栋9层高的公寓楼被摧毁，94人死亡，249人受伤。9月13日凌晨5点，又一个大炸弹在莫斯科南部卡希尔斯科亚高速公路附近的居民小区爆炸，这里距离第一轮炸弹攻击地点3.7英里：118人死亡，200人受伤。

一系列爆炸事件让整个城市陷入恐慌，普京立刻谴责车臣恐怖分子，而且准备对车臣共和国发动一次强力军事打击。这些爆炸事件成为普京掌权的转折点——他对重大事件的果决回应、部署部队的决定，以及他冷酷地誓言将车臣人“从我们的屋外彻底扫荡干净”，让他在民众当中非常受欢迎。到底是谁策划的这些爆炸案——车臣人还是其他人——这个问题引起了一番经久不息的争论。而且，在联邦安全局经历一场信任危机之后，这样的争论更被广泛传播。

爆炸案激起的恐惧如此强烈，以至于当局慌忙在大范围内采取安保措施，这包括在首都的每一座建筑前部署一名内务部士兵。（这些士兵们被匆忙部署，很多人根本没有得到足够的补给，许多人都是靠莫斯科市民提供食物。）9月22日，这种慌乱进一步加深。当时媒体报道称，在莫斯科南部的城市梁赞，一起针对居民楼的爆炸案被制止。根据初期的媒体报道，在诺芙塞洛瓦街头的一座公寓中，发现了一套引爆装置和炸药，其成分类似于莫斯科爆炸案中使用过的黑素金炸药。联邦安全局的梁赞分部立刻对此案展开调查。

同一天在莫斯科，联邦安全局的主要新闻发言人亚历山大·兹达诺维奇接受了一个电视脱口秀节目《今日英雄》的采访。当被问及梁赞调查的细节时，他表示：“根据初步的调查结论，梁赞发现的炸药当中没有黑素金炸药的成分。也没有发现引爆装置，只是一些引爆装置的部件。”但在9月24日，联邦安全局局长尼古拉·帕特鲁舍夫在电视上接受采访时，作出了惊人的表态，梁赞的事件其实是联邦安全局的一次演习。“首先，那里并没有发生爆炸案。其次，也不是谁阻止了爆炸。但我认为，他们的工作还是不够娴熟。这是一次训练：所谓的炸药不过是砂糖罢了——这样的训练不仅在梁赞进行——我们必须对梁赞的执法机构和当地民众表示赞扬。他们的反应非常恰当。我相信这次训练接近实际发生类似事件后的情况。”兹达诺维奇之后在电视上表示，“是的，在反恐行动的框架内，联邦安全局在俄罗斯的一些城市中进行了一系列的训练计划，其中就包括梁赞。我想说，在其他城市——关于具体是哪些城市，我不便说明——这些防护措施并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联邦安全局的官员们、当地的执法部门和当地政府没有尽职，我们也没有得到当地民众的任何反馈。”他补充道，“这些演习的下一步就是梁赞，我必须先向当地居民表示感谢，更要感谢住在那栋楼里的居民，他们在发现这些所谓的炸药之后，表现出了十足的警惕。”

同时，我也要向他们表示歉意。”

通过这些表态，联邦安全局的领导们让所有俄罗斯人都感到无所适从。从那以后，人们就开始不断质疑联邦安全局在这些训练和爆炸事件中的角色。本书作者相信，在梁赞确实进行了演习。这些演习明显带有“信号旗”特种部队的特征，这是联邦安全局的一个特别行动部门，其使命是检验如核电厂等地点的反恐措施是否有效。本书作者也认为，联邦安全局毫无必要如此笨拙地处理危机，而且其给出的解释不但没有解答民众疑问，反而引来更多质疑。而关于联邦安全局可能参与了这些爆炸案，以帮助普京上台，这样的阴谋论也开始不胫而走。到今天为止，联邦安全局也没有消除这样的猜测，更没有提供令人信服的证据以表明发生在梁赞的一切到底真相如何。

2002 年，关于梁赞演习的一些细节被透露给《绝密》月报，该报一直以来都与安全部门关系密切，但这篇报道却没有引起丝毫反响。这篇报道指出，联邦安全局的两个特别行动组织“阿尔法”和“信号旗”，在 1999 年 9 月 20 日被派驻梁赞，以防止可能发生的爆炸袭击，同时检查该城市应对恐怖主义威胁的准备情况。

联邦安全局没有向公众提供充分的解释，而是竭尽全力让这些疑问消失。前联邦安全局官员米哈伊尔·特勒帕斯金，现在是律师，就受到国家杜马成员和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谢尔盖·科瓦廖夫的邀请，援助一项针对公寓楼爆炸案的独立调查。特勒帕斯金也被两姐妹雇用，在针对两名被控运输了炸药的俄罗斯人的审判中做她们的代理律师，这两姐妹的母亲在其中一次爆炸案中丧生。特勒帕斯金开始对这个案子提出自己的疑问，他表示联邦安全局可能也参与其中。2003 年 10 月 22 日，特勒帕斯金因为非法持有武器被捕并被定罪，被一个军事法院闭门判处四年监禁，这次审判明显是安排好的。

不久之后，一名心存不满的前联邦安全局官员亚历山大·利特维年科，在逃离俄罗斯以后与另一位合著者尤里·菲尔金斯基出版了一本书《爆炸俄罗斯：来自内部的恐怖事件》。在书中，他们直斥联邦安全局组织了一场恐怖主义运动。2003年12月28日，当这本书被运往俄罗斯后，4376本被联邦安全局没收。

2004年1月28日，据前持不同政见者亚历山大·波德拉比内克称，他在将这本书从国外运送到俄罗斯后，被叫到了莱弗尔特沃并受到联邦安全局的审讯。本书作者认为，这本书中的内容并没有提供针对联邦安全局的新证据，而特勒帕斯金对联邦安全局参与爆炸案的指控也被证明高度存疑。但联邦安全局对特勒帕斯金的回应以及他们对这本书的封禁，反而加强了人们的怀疑，即联邦安全局多多少少参与了这一阴谋。

在叶利钦执政期间，20世纪90年代的俄罗斯极为开放，记者们可以随意报道那些曾经的禁区。而到了普京时代，联邦安全局重新采取警察国家的手段对付外国记者，以扣留签证和禁止进入该国等方式作为要挟，以影响他们的报道内容。

2002年5月，当时联邦安全局的反间谍部门负责人尼古拉·沃勒布耶夫告诉31名外国记者，他们的采访许可已经被吊销，因为他们在“从事非法新闻活动”，而其中18名甚至被拒绝入境，其签证也被拒发长达5年之久。从那时起，这样的手段就变得很常见。据位于莫斯科的紧急状况新闻中心称，从2000年到2007年间，有超过40名记者被禁止入境。

2006年7月，俄罗斯当局拒绝英国记者托马斯·德瓦尔的入境签证。俄罗斯联邦移民局解释称，拒绝德瓦尔的入境申请这一决定，是根据1996年安全法

作出的。其实这个解释应该是，德瓦尔写了一篇内容涵盖广泛的关于车臣战争的报道：1993 年到 1997 年，他在俄罗斯工作，报道北高加索新闻，他和另一位作者合著《车臣：一场小胜的战争》。2003 年，他作为专家目击人作证，在英国进行的针对车臣叛军领导人艾哈迈德·扎卡耶夫的引渡审判中为其辩护。2008 年 6 月，英国记者西蒙·普拉尼也被俄罗斯拒绝入境，尽管他护照上的签证还是有效的。普拉尼曾经报道过工会问题。俄罗斯当局告知他，他被视为安全威胁。

纳塔莉亚·莫拉尔是一名摩尔多瓦公民，曾经为俄罗斯独立周报《新时代》工作，在俄罗斯工作过 6 年。但在 2007 年 12 月，在结束一次以色列之行后，她被俄罗斯拒绝入境。莫拉尔写过许多关于腐败的报道，而且这些文章曾经批评过联邦安全局高层官员。她被迫飞回摩尔多瓦，并在那里被俄罗斯大使馆官员告知，她对俄罗斯国家安全构成威胁。2008 年 2 月，她与丈夫伊利亚·巴拉巴诺夫（他也为《新时代》工作）来到莫斯科的多莫杰多沃机场。她和丈夫在上次被拒绝进入俄罗斯后结婚。但她在护照查验时被截住，又被告知她的婚姻并不能解除其被拒绝入境的状态。尽管她一直为《新时代》工作，报道腐败问题，但因为无法从俄罗斯获得消息源，她的工作变得越来越难。

同时，安全机构也将他们的新闻办公室关闭。到 2005 年前后，在克里姆林宫，联邦保卫局只允许摄像和拍照请求。军事情报局撤销了新闻办公室，对外情报局拒绝对任何发生在 1961 年以后的事情作出评论，联邦安全局公共传播中心已经越来越不愿意回答记者的提问，即便面对起诉的威胁也是如此。

2009 年援助计划处（包括公共传播中心）被授予新的权力。7 月 15 日，当时的联邦安全局局长亚历山大·博尔特尼科夫让更多的联邦安全局将军能够“提出申请以执行反间谍措施，限制公民的宪法权利”（换句话说，公民的通信

隐私权将被剥夺，这甚至包括公民的住所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在博尔特尼科夫的领导下，这些将军拥有了窃听、监视和搜查的权力。

拥有这些权力者的名单制定于 2007 年，原本只限于反间谍部门、经济安全局、边防警察和联邦安全局领导层的头脑人物。2009 年博尔特尼科夫签署命令后，这个名单显著扩大，甚至包括联邦安全局援助计划处。

根据这项法律，联邦安全局在以下情况下可以采取反间谍措施：有信息显示有外国情报机构或个人进行间谍活动或其他行为，以伤害俄罗斯国家安全；有必要收集关于产生威胁的行动的情报，以保护国家机密或监控为联邦安全局提供秘密援助的人员；或者有必要确保联邦安全局自身的安全或应俄罗斯的外国友好情报机构的援助请求。

俄罗斯的记者们显然不是这个名单上的“主顾”——他们都不能获得国家机密，只有在联邦安全局官员或其他有权接触这些资料的官员们告知其相关信息后，他们才能透露这些机密或特工的姓名。但为了维护本已重重保护的机密，联邦安全局还设有专门的机构，从主要的反间谍局到军事反间谍部门不一而足，如果记者们将这些敏感信息通过报刊泄露出去，这些机构会对其展开起诉。

接受本书作者采访的律师和联邦安全局官员们都表示，援助计划处可以获准进行监控，不是为了进行刑事调查，而仅仅是为了盯紧记者。（以前，处长都必须获得反间谍部门负责人的允许才能截留记者的通信。现在联邦安全局负责与记者打交道的处长就可以自己下令进行这样的监控。）

博尔特尼科夫的命令带来了另一个问题。联邦安全局划分成行动部门和支援部门。其中前者（比如，反间谍部门或反恐部门）包括行动人员，他们负责招募特工。支援部门包括联邦安全局基建处、医务处、人力资源处和负责专门应对记者的部门（据传一直有此部门）。

授权进行窃听的权力，明显是行动部门的一项手段。索尔达托夫询问援助计划处是否是行动部门时，值班的联邦安全局公共传播中心官员回应道：“按照内部文件规定，没有人会告诉你答案。”

叶利钦掌权期间，记者曾经获得过一定程度的自由采访权，普京则试图将安全机构描画成一个正面的机构，因此严格控制哪些事情能被调查（或被刊发）。这导致苏联时代的秘密行动重生，而且，谁都不能提出任何疑问。



The  
New Nobility

De Beers Group of Companies  
The New Nobility

德比世  
新貴

**秘密：**  
**99% 不为人知的故事**



关于俄罗斯安全机构的情况，多数都被长久妥善掩盖，要么被锁进常人无法接触到的档案当中，要么就藏在我们眼前，或者就藏在我们行走的街道下。如今，一个在冷战时期修成的如同兔子窝一样的地道，还在被安全机构使用。当克格勃在莫斯科卢比扬卡广场附近扩展时，这些建筑也都被掩藏起来。经过这些建筑的路人会不由感到迷惑，因为这些建筑上没有任何指示牌。行人们更为蔓延城市当中的高墙而困惑。围墙内就是克格勃或军队的设施。但这些令人不解的情况只是整个故事的一小部分而已，最隐秘的建筑都被藏在莫斯科街道的地底下。

从莫斯科国立大学附近的一座小山上俯瞰，米丘林斯基大街从城市中心向西南方向蜿蜒。米丘林斯基这条绿树成荫的街道——穿过一个体面的居民区——它的一大部分被一个重要的情报机构建筑所占据，那就是联邦安全局学院。距离学院不远处，是几块空地。空地下有一个由地道、铁路、密室和秘密入口等组成的迷宫。

冷战时期，因为担心发生核战争，英国、美国和苏联都建设了地下要塞，这样相关国家的领导人能在受到核攻击的情况下躲避起来。苏联建设的地下工事，其规模远超英美。地下掩体、工厂和供坦克行驶的隧道将莫斯科的地下世界变得错综复杂：根据一些独立专家的说法，俄罗斯首都的地下共有 12 层隧道。其中最大的一个是地下铁路系统，被人们私下称为“2 号线”，而官方将其命名为 D-6 隧道。这条线路与莫斯科人乘坐的地铁平行，仅供高官们使用。D-6 的建设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 40 年代，其建筑工程至今尚未结束。尽管找不到任何相关文件，但据估计苏联解体时，D-6 包括 4 条线路，共分 7 层。创建于 1977 年的第十五局是克格勃内部的一个特别组织，就负责维护该地下设施的安全。但在 1991 年，当克格勃解体后，第十五局没有被纳入联邦安全局或负责保护高级国家领导人的联邦保卫局。

整整三年中，第十五局都好像消失了一样。最后在 1994 年，出现了第一份文件，提到了该局的新名称：GUSP（总统特别计划总局）。这是一个独立的安全机构，其处境也很独特；与其他多数安全机构不同，该机构并未获得独立地位，却受总统办公厅管理。GUSP 的管理规范直到 1996 年才确立，并以总统令的方式颁布。GUSP 没有得到任何议会法案的认可，也未经过议会的审议就被设立。

GUSP 的领导层执著于保证自己最大程度上的隐秘，以至于有时候都会给自己制造出麻烦。因为该机构不在俄罗斯情报机构名单之上，GUSP 的人员无权携带武器。到 1999 年，这样的羁绊才被解除。20 世纪 90 年代末，GUSP 循着联邦安全局的脚步，开始扩大自己的活动范围和资源。据报道，到 2000 年时，GUSP 的人员总数已经达到 20 000 人。到今天，GUSP 领导人还从未发表过公开言论；GUSP 不设置媒体办公室，其网站上也只有机构徽章和官方文件。

不过，GUSP 低调行事的风格，让公众对莫斯科的秘密地下设施产生了兴趣。从 20 世纪 90 年代初开始，由“地下星球挖掘者”肇始的探索行动引来越来越多的人参与。这个组织是由弗拉蒂姆·米哈伊洛夫组建的一个松散的地下探索组织。米哈伊洛夫个子很高，脸色苍白，脸上长满麻子。他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开始地下冒险：他的父亲是一位莫斯科地铁的驾驶员，经常带着他进入地铁的驾驶舱。12 岁时，米哈伊洛夫和一些朋友进行了他们的第一次地下冒险，进入蜿蜒曲折的地道、下水道系统和莫斯科地下自然形成的洞穴。没用多久，他们就有一次重大发现：斯大林时代的地下要塞，就位于列宁格勒斯基大街地下很深的地方。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米哈伊洛夫在国际媒体上受到关注。他成为一名地下导游，他的经典旅游线路总是穿过地道，到达莫斯科的一个著名景点，比如红场中央。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媒体开始对地下系统有所报道，第一个报道出现在《证据与事实》报。该报发表于 1992 年的一篇文章引来关于莫斯科地下秘密地铁系统的大量报道。一夜之间，米哈伊洛夫成为这方面唯一的专家。

但他的组织的活动并不限于发表评论和接受采访。在秘密地下设施被曝光后，米哈伊洛夫开始发起运动，反对市政府允许工程建设项目影响到具有历史意义的城市景点，并对市政府未能妥善保护这座城市中古老建筑下的供水系统而表示抗议。米哈伊洛夫警告当局，许多这样的建筑，如著名的久罗夫动物剧院，在其地下的水管爆裂而遭受严重毁损后，有坍塌的危险。

1998 年，莫斯科市政府开始发起报复：莫斯科市长尤里·卢日科夫被米哈伊洛夫触怒，他下达命令，要求改进地下通信系统的安保工作。他表示：“包括所谓的‘地下星球挖掘者’等外来人员对地下建筑的渗透行为，导致线缆被盗，

而且可能出现纵火案。大众媒体经常发布未经确证的数据，导致公众不理智的激愤。”市长的表态激起更多的组织成立起来，以维护进入莫斯科地下的权利。

尽管与莫斯科当局存在敌对关系，但在一些情况下，米哈伊洛夫还是会被叫去帮忙，因为他非常了解这些地下设施。挖掘者帮助当局成功抓捕了三名谋杀犯，他们通过挖地道的方式逃出了布提拉尔监狱。此外，米哈伊洛夫的团队在 1999 年的公寓爆炸案发生后，还协助进行了营救行动。

但当局还是对他们进行了更大程度的骚扰。2000 年 6 月，伊琳娜·博罗甘正在为《消息报》报社撰写一篇关于莫斯科国立大学地下设施的报道。在米哈伊洛夫的陪同下，她进入了莫斯科西南部，这所大学位于麻雀山的主建筑地下。麻雀山是 7 座建于斯大林时代的分层式新古典主义风格高塔之一，建成于 1953 年。中间的那座塔高 240 米，共有 36 层，两侧林立着四座巨大的学生和教师公寓。据说，这座塔里有 33 公里长的楼梯和走廊，还有 5 000 个房间。但这座塔令人印象最深刻的是它迷宫一般的，分为很多层的地下结构，这是用来在受到核攻击时让成千上万学生和教师躲避的地方。

博罗甘和米哈伊洛夫从一个接近大学主入口的喷泉下行，沿着通风管道前进。有很多通道向四面八方延伸。博罗甘说，其中有一些超过 5 米高。根据挖掘者的说法，这座地下工事的第六层，有一个通往 D-6 的秘密通道。据我所知，那个入口是通往 D-6 的第一条线路，建成于 20 世纪 50 年代，从克里姆林宫经俄罗斯国家（列宁）图书馆通往政府机场伏努科沃机场 2 号航站楼，途中还经过地下城拉门奇、莫斯科国立大学和总参谋部军事学院。（D-6 就是用来供克里姆林宫的领袖们躲避攻击的。）

米哈伊洛夫向博罗甘承认，他未经授权进入上述地区，甚至非常接近俄罗斯最敏感的地下设施，以至于他经常会受到来自情报机构的压力。米哈伊洛夫告诉

博罗甘，负责保护总统安全的联邦保卫局，已经成为对他发起诉讼的主要机构。他常被拘留、审问甚至被威胁会有牢狱之灾，因为他非法进入地下秘密设施。

为了获得保护，米哈伊洛夫向紧急情况部求助，希望该部能够使他避免受到这些压力。2000年7月，挖掘者运动正式获得该部下属单位的身份。但最后，紧急情况部也没能兑现承诺。当米哈伊洛夫被迫与情报机构建立非官方联系，以保证自己的安全时，发现自己的处境非常尴尬。结果，从2000年以后，米哈伊洛夫几乎不再陪同外国记者前往敏感地区，也拒绝对地下设施发表任何评论，因为这些设施都是保密的。

2002年10月，在杜布罗夫卡剧院人质危机期间，联邦安全局找到米哈伊洛夫的组织。挖掘者帮助反恐部队阿尔法通过下水道进入了杜布罗夫卡剧院，当时这家剧院被车臣人控制了。米哈伊洛夫后来说，有机会与情报机构合作让他非常感兴趣。危机结束后，米哈伊洛夫告诉《消息报》，“成立25年来，如果挖掘者运动没有遭到联邦安全局的审查，那是很令人吃惊的事情。这完全正确。对保密地点附近开展的活动进行控制，是非常必要的。”

米哈伊洛夫指责了其他的挖掘者，这些人并不属于他的组织，但他们“在这城市的地下系统中，进行了完全非法的活动：他们拿走属于国家的物品，将其毁坏……这些人提供的关于这些地下建筑的信息，首先很多都是错误和失真的，其次有些东西根本不能动，因为那都事关国家安全。如果我们去过那里，我们不会告诉媒体，也不会将其地址发布在网上。”

通过获得米哈伊洛夫的效忠，情报机构消除了外界活跃分子们唯一可以监控地下设施数行动的途径。不久之后，GUSP和联邦安全局又向媒体施压。2002年5月，索尔达托夫在一家周刊《维尔西亚》(Versiya)上刊登了关于居民区建设的报道，这些建筑建在联邦安全局以前的特别设施之上。这篇报道还配了一

张地图，是由索尔达托夫根据公开消息源整理的。这张地图上标明了GUSP建筑和情报机构在莫斯科的其他设施。6个月后，联邦安全局对索尔达托夫和《维尔西亚》进行了犯罪指控，因为他们泄露了关于GUSP建筑的国家机密。经过一系列审讯后，这次指控在2002年12月被撤销。

与此同时，GUSP一直在建设新的设施。根据独立信息源，D-6的建设还在继续。从21世纪前10年中期开始，超过十多位俄罗斯地方大员被GUSP领导层授予奖励，以嘉奖其“援助了特别计划”。获奖名单中包括鄂木斯克、车里雅宾斯克、基罗夫斯克地区的州长，也包括别尔哥罗德州、卡累利阿、沃罗尼日、斯塔维罗尔约、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和加里宁格勒等地区的负责人。GUSP还向圣彼得堡政府人员和俄罗斯铁路总裁等人颁发过奖项。GUSP颁奖的唯一原因就是地方当局为维护和营建GUSP的地方设施提供了支持（工事和通信设施）。另外广为人知的是，2006年，一个GUSP特别行动小组被派往鞑靼斯坦的首府喀山，很明显是为了调查位于该区域的“特殊地址”。

到2005年左右，GUSP，这个根据真正的冷战传统建设起来的情报机构，已经将苏联时代的地下帝国维护得很好，而且将其变成了至高机密。尽管这个机构在设计之初，就是独立于联邦安全局而存在的，但后者在这个机构运行过程中，似乎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该机构最近的两位负责人都是联邦安全局的高官——维克托·佐林曾经是联邦安全局反间谍部门的负责人，亚历山大·塞连科则在派往GUSP之前领导过莫斯科分部。没有办法证明塞连科是否离开了联邦安全局，或者他是否向联邦安全局局长负责。但在2000年被任命后，塞连科一直被媒体报道称为一位“联邦安全局的中将”。

在这个10年之末，联邦安全局向GUSP学习，重回苏联时代的传统，只有很少国家安全设施被公之于众，而其他设施的具体地点都被置于保密状态。



The  
New Nobility

THE NEW NIBILITY OF THE NEW  
CHINESE INTELLIGENCE CLASS

第十一章  
**监狱：  
地址、名字都不重要**



莱弗尔特沃监狱被小心翼翼地从地图上隐去。这座监狱是唯一一家没有将全部历史公布的俄罗斯监狱。此前曾经隶属于克格勃，后来归联邦安全局掌管。

在车臣人占据了一家剧院、将所有观众扣为人质这场俄罗斯历史上最大的恐怖袭击事件之后的那个星期里，本书作者正在撰写一篇严重质疑政府反应的文章：当局强攻杜布罗夫卡剧院，将芬太尼毒气喷射到剧院大厅，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就在那一周的一个傍晚，那是在 2002 年 11 月 1 日，几名联邦安全局官员来到《维尔西亚》报社，索尔达托夫和博罗甘就在那里工作。他们将索尔达托夫的电脑和报社的服务器都没收了。文章正好是那天被送往印厂的。这几名特工离开时留下传票，要求索尔达托夫前往联邦安全局军事反间谍部门回答关于他在当年春天所撰写的一篇文章的问题。但索尔达托夫很确信，这几名特工的真正目的是为了阻止他对剧院强攻事件展开独立调查。

在接受完询问后，索尔达托夫被告知，他需要向联邦安全局位于埃内杰蒂

切斯卡亚大街上的调查分部提交报告，这个地方距离莱弗尔特沃公园只有几个街区之遥。而这个公园的名字来源于弗伦茨·莱弗特，沙皇彼得大帝的亲信。作者到那个臭名昭著的莱弗尔特沃监狱报到。这所监狱很难寻找，隐藏在一个昏暗的居民楼后。普通的导游都不认识这个地方，关于莫斯科历史的书中也没有提及此处。

将索尔达托夫传唤到联邦安全局令人恐怖的监狱中询问，这样的决定并不是随便作出的。认为在巨大的压力下，在这个残酷而令人恐惧的监狱里的幽闭环境中，受审者可能会泄露信息，这其实是有一定道理的。被叫到莱弗尔特沃监狱接受询问的人，谁也不知道自己是能回去，还是会被监禁。从心理上来看，这一招被证明是非常有效的说服工具。

索尔达托夫走到2号检查站，这是一个不太引人注意的入口，通往一座黄色的砖楼。这个入口专供调查证人、嫌疑犯使用，但不是供囚犯进出的。

进入监狱后，他没见到几个人，只有内部摄像头。来访者被要求在大厅里等待陪同人员。监狱外的人员只有在联邦安全局官员的陪同下才能进入监狱。来访者也不能看到任何人的面孔，所有指令都由一个扬声器发出。这个入口的旁边有两扇同时开启的厚重的大门。

沿着一条淡蓝色和米色相间的走廊前行，索尔达托夫被引领到了三楼。那里就像个兔子窝——根本不可能弄清楚自己在什么地方。白色的窗纸将办公室的窗户都遮蔽起来，这些窗户面向的其实是监狱内部的一个长方形的庭院。

索尔达托夫到莱弗尔特沃监狱的那天，他被领到了一个很小的办公室，那里有一名年轻的联邦安全局调查员。他开始了一场烦琐的程序，填表格，就是填关于索尔达托夫的身份信息。索尔达托夫非常紧张，他想尽快回答调查员的问题，然后离开这里。但这名调查员一点儿也不着急。几天之后，博罗甘步索

尔达托夫后尘，与调查员们又重复了那些缓慢而令人痛苦的程序。

苏联时代，这家监狱由克格勃掌管。如今，它仍然是联邦安全局帝国的中心，成为安全机构权力的一个象征。苏联分裂后，这座巨大的监狱曾经一度陷入各方争夺之中——联邦安全局最后赢得了这场战争，但并不是通过公开竞争，而是在俄罗斯安全机构之间进行了一场实力之争。

尽管莫斯科所有的主要监狱都在历史学家和专家笔下被记载——甚至包括联邦安全局位于卢比扬卡广场上的内部监狱——但莱弗尔特沃监狱却是个例外。甚至连这所监狱的设计都是个谜：没有人知道为什么建筑师 P·N·科兹洛夫会在 1881 年选择将这所军事监狱修建成一个“K”字形状。（有些人猜测，这样的设计是为了纪念俄罗斯女皇卡特琳娜二世——在俄语中写做 Katerina。）在历史上，莱弗尔特沃监狱与政权之间有着紧密联系。它常被用来关押当政者的政敌，后来的苏联领导人和俄罗斯领导人也如此效仿。

一名激进的反对派领袖兼作家爱德华·利莫诺夫，曾经因为非法持有武器被关进莱弗尔特沃监狱，他在 2002 年出版的《死人的俘虏》中对这所监狱有过非常详尽的描述：“在一个地方，字母‘K’的三个部分……交汇于一点。这里有一座指挥和控制室……总有五六名到十名监狱看守，这里能看到电脑显示屏，还有麦克风。”

曾经在莱弗尔特沃坐过牢的囚犯称，那里的看守想尽一切办法防止囚犯彼此见面。护卫囚犯时，守卫会使用一种小的发声装置——一个圆形的金属装置——或者打响指来让其他守卫知道自己要通过。其他的沟通方式还包括敲击每间囚室门上的水管，这样的水管一直顺着走廊延伸。如果两名护卫相遇，其中一名会将他所带领的囚犯推进莱弗尔特沃监狱走廊里到处可见的木隔间里。

这种惯例从沙皇时代就已存在。19世纪，专门的木隔间被安置在监狱的教堂里，以防止囚犯们在做礼拜时相互见面。

据利莫诺夫估计，在监狱的房顶，共有15个活动场地，每天供三组囚犯分别使用。监狱中每四层容纳50间囚室，但只有两层有囚犯。尽管监狱总共能够容纳200名犯人，但一般来说被囚禁的犯人不超过50人。

多数囚室其实能容纳3个人，但很少有超过两人住进同一间囚室的。有一些囚室是单间，有两个囚室是6人间。这和俄罗斯的其他监狱相比，有天壤之别。其他地方的囚室里塞满了犯人。甚至连律师都表示，这座监狱实际上是这个国家唯一具有矫正功能的监狱，那里找不到毒品，也没有“绳子电报”——俄罗斯监狱的一个传统，用一种粗糙的“邮递绳”在囚室之间传送纸条、小包装的茶叶、烟草等。

娜塔莉亚·杰尼索娃是外交官瓦连京·莫伊谢耶夫的妻子。娜塔莉亚的丈夫被控犯有间谍罪。她根据个人经历描述道：“莱弗尔特沃监狱的状况，初看上去好像很差，这里的规矩也非常严格。我曾有整整10个月没被允许见过自己的丈夫。尽管法律规定一个月可以见两次，总时长可达三小时，但我和丈夫会面，从来都没有超过一个小时。很难将什么东西传递给囚犯，尤其是钱。亲友们只能将这些东西通过邮件传递，要花费一个月囚犯才能收到。要在监狱里买到什么东西，都需要用钱。”

苏联时代，莱弗尔特沃监狱被克格勃用来关押政敌和间谍嫌疑犯。20世纪90年代，作为克格勃主要的继承人，联邦安全局继承了莱弗尔特沃监狱，但联邦安全局也费尽心机才得以掌控这所监狱。

1993年，经由叶利钦命令，在弱化前克格勃权力的阵痛初期，联邦安全局短暂地失去了其调查部门。而莱弗尔特沃监狱在1994年6月被移交给内务部。

这项新的安排作出之后 9 个月，两名囚犯逃脱——这是莱弗尔特沃监狱历史上第一次发生越狱，也是对内务部无可置疑的打击。内务部被看做没有能力高效管理监狱，它在 1997 年被交还给其之前的管理者。（除了莱弗尔特沃，还有 13 座地方监狱也被交还给联邦安全局。）

1996 年，俄罗斯加入了欧洲委员会。在此过程中，克里姆林宫承诺，除了其他事情外，“从加入欧洲委员会起，在一年内改革联邦安全机构法律，让其符合欧洲委员会的原则和标准：特别是（取消）联邦安全局拥有和管理审判前拘留中心的权力”。

欧洲委员会要求俄罗斯将其调查机构与拘留机构分离，依据就是囚犯可能被调查人员施压。当内务部将监狱和其他教养所在 1998 年转交给司法部时，联邦安全局用尽浑身解数，抵制住了欧洲的压力。

2004 年，联邦安全局副局长维亚切斯拉夫·乌沙科夫在与欧洲委员会的议会代表进行会面时解释道，联邦安全局掌握监狱极为重要，可以保证“极高的安全性”。据乌沙科夫的说法，只有莱弗尔特沃符合这些要求。（2005 年 3 月，乌沙科夫的论点被一名 27 岁的年轻人质疑。此人是塔尔加特·库库埃夫，来自吉尔吉斯斯坦，他非常轻松地越过莱弗尔特沃监狱的围墙。直到那年 5 月，他才被抓获。）

最后，在 2005 年 7 月，普京签署了一项法令，将所有联邦安全局监狱（包括莱弗尔特沃）在 2006 年 1 月转交给了司法部。

起初，联邦安全局似乎同意转交。根据报告，联邦安全局的监狱被转交给了联邦刑罚局，该局还专门成立了一个部门来负责管理监狱。

但在 2005 年底，本书作者得到来自联邦安全局调查处内部的可靠情报，联邦安全局的监狱管理人员将被临时转移到刑罚局。虽然他们的正式身份属于刑

罚局，但这些官员实际上仍然受联邦安全局管理。这一情报来自不同的消息源，本书作者将此消息在 2006 年 1 月公布在独立在线杂志《伊杰尼夫尼杂志》上。这篇报道没有遇到联邦安全局的反对，2008 年，又得到了官方的确证，但却是以一种奇异的方式。

2008 年 3 月，圣彼得堡军事法院批准逮捕两名联邦安全局官员，他们的身份竟然是该市第三拘留中心的主任和副主任。这家监狱此前曾经隶属于圣彼得堡联邦安全局分部，而且根据总统令，此前已经在 2006 年被转交给刑罚局。两名官员都曾经在联邦安全局的地方分部工作，但在刑罚局接管以后，这家监狱保留了他们的职位。官方的说法是，他们已经转归刑罚局管理了，但他们仍然保留着联邦安全局的职位，并无变化。这些消息都是这次审判当中透露的，而且后来还在新闻中报道过。

俄罗斯破坏其对欧洲的承诺，并未引起普京的回应。最终，联邦安全局甚至想办法扩大了它的监狱设施。2006 年 6 月，根据一项新的法令，普京允许联邦安全局设立一个“临时”拘留所。很少有人会相信，这个所谓的临时拘留所会与其他联邦安全局本应放弃的监狱有何区别。总统令明确指出，那些受到指控并正在接受调查者，都可以被关进联邦安全局的临时拘留所。

这是联邦安全局领导层玩弄的一个很聪明的花招。直到最近，只有内务部和边防警察局拥有临时拘留所，用来临时羁押被捕者几天时间，直到正式的控诉开始。所以从逻辑上来说，这样的拘留所只有内务部才可以拥有，其雇员可以在大街上逮捕罪犯，此外边防警察也可以逮捕侵入边境者。

2003 年，边防警察局被纳入联邦安全局，这为联邦安全局提供了一个诱因和很不错的借口，使其能够将联邦边境局的行事方式扩展到整个情报部门。因

为该局有权关押非法出入境者。现在联邦安全局不仅在边境地区拥有了临时拘留所，而且在整个国家都拥有了此类机构。有了这样的设施，联邦安全局非常聪明地绕开了自己将所有监狱交还司法部的承诺，同时进一步在俄罗斯境内扩大了该局原本一直在增长的势力范围。

•



# THE NEW NOBILITY

The Restoration of Russia's Security State and the  
Enduring Legacy of the KGB

第二部

反恐档案





第二十一章

## 失误： 莫斯科剧院人质事件





2002 年秋，在一场 1995 年以来俄罗斯发生的最严重的恐怖袭击中，俄罗斯的安全机构在极端压力下应对人质事件的能力被证明极其欠缺。

2002 年 9 月，车臣人兵分几路，每组三到四个人，开始乘坐巴士从达吉斯坦的马哈奇卡拉和哈萨维尤尔特到达莫斯科。许多年来，这一直是北高加索商贩往来于莫斯科和本地的路线。这条路线比火车要快，也不需要买火车票，因为火车票需要凭护照购买。他们中的大多数在 9 月 16 日到达，其他人晚到了几天，在 9 月 19 日到达。同时，一辆装满炸药的车（上面压着许多箱苹果）以及另一辆运载三枚炸弹（被伪装成卡玛兹货车制动装置）的汽车都开到了莫斯科市。

车臣人聚集在三间租来的公寓当中，后来的几个星期中，他们就一直住在这里。他们带来的炸药被小心地藏在位于莫斯科不同区的仓库里。这些人总数有 52 人，多数人只有 20 多岁。女人们被指令在家里待命，男人们则化装成建筑工人，被送往位于莫斯科东南部梅尔尼科瓦大街 7 号的一座巨大的建筑中。

那里曾经是莫斯科轴承厂的剧院，杜布罗夫卡剧院。

这座剧院以及周围的建筑都被连线制片公司（Link Production Company）租赁了，而正是该公司于 2001 年 10 月上演俄罗斯第一出百老汇风格的音乐剧《东北风》。这部音乐剧非常受欢迎。这座建筑的很大一部分被人体自我修复研究院和一个同性恋酒吧占据。光顾这家俱乐部的主要成员是议员、腰缠万贯的商人，还有政客。

在最鼎盛的时候，这家占据三层楼的俱乐部一晚上就要接待 1 500 名客人，但从 2002 年 5 月开始，该俱乐部开始进行重建。车臣人在最后的重建阶段被雇用。很少有人注意到他们到底在做什么。剧院和同性恋俱乐部之间的大门从来都敞开着。

2002 年 10 月 19 日，一辆小汽车在波克雷舍基纳大街上的麦当劳附近爆炸；1 名莫斯科人死亡，8 人受伤。在柴可夫斯基音乐厅附近的第二辆装了炸药的车未能爆炸。这种声东击西的战略在之后的数年中被一再重复使用，尤其是在 2004 年，当时别斯兰悲剧发生之前，莫斯科的里扎斯卡娅地铁站就发生了自杀式炸弹袭击。但在 2002 年 10 月，这是联邦安全局第一次遇到这一策略。

10 月 23 日，星期三，《东北风》的第一幕快要再晚上 8 点 45 分结束。这时，三辆小面包车停在了剧院入口附近：一辆福特全顺，一辆大众凯乐威，还有一辆道奇。转瞬之间，一大群车臣人手持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和手枪冲入剧院，并向空中扫射。一些车臣人已经提前进入剧院，化装成了普通观众。

这些车臣人只有 41 人，根本没有足够的实力夺取并占据这座建筑。他们只是控制了连线制片公司租赁的地方，大概占据这座建筑的 40%。

全部观众有 920 人，其中 67 人是外国人。他们都被人扣为人质。车臣人要求观众给自己的家人打电话，要求他们组织一场游行，反对车臣战争。在

人质当中，不乏记者和警察，他们很快通知了媒体和安全机构。当车臣人明白俄罗斯当局已经知道在剧院中发生的一切后，他们命令所有入质交出手机，只有少数人想办法将手机藏了起来。

大约就在同时，联邦安全局领导层正在卢比扬卡广场的总部里，庆祝迪纳摩排球俱乐部赢得比赛。他们被紧急召唤，结束庆祝活动，前往现场处置危机。这次危机后来变成过去 10 年俄罗斯所发生的最严重的恐怖袭击事件。

在剧院外，当局并不清楚剧院里到底有多少恐怖分子，以及他们到底掌握多少枪支。（总共有 41 名恐怖分子，其中有 19 名女性，他们总共拥有 17 把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和 20 支手枪。）恐怖分子带去了 21 条装满炸药的腰带和两枚威力巨大的炸弹，很轻松就能将整个剧院和其中的所有人炸上天。就在此前的几个星期，这些炸药和炸弹被小心地集中到了同性恋俱乐部周边的建筑中。

在人质事件发生的第一天，一个名叫莫瓦萨·巴拉耶夫的 22 岁的车臣人宣布自己是这群恐怖分子的头目。他是臭名昭著的车臣武装头目阿尔比·巴拉耶夫的外甥，后者在 2001 年就被击毙。（莫瓦萨的真名是莫瓦萨·萨拉莫夫，在他的舅舅被杀后，改姓巴拉耶夫。）杜布罗夫卡剧院恐怖袭击，如同后来人们所知道的，起初被误认为是一场个人的复仇行动。巴拉耶夫有两名副手：经验丰富的车臣战士鲁斯兰·埃尔穆尔扎耶夫，29 岁，是著名的武装头目艾哈迈多夫兄弟的侄子；另一名副手是“亚述人亚希尔”（关于此人再没有其他确定的身份）。埃尔穆尔扎耶夫后来证明是这次行动的真正指挥者。女性则由埃希拉·维塔利耶娃领导，这是一名 42 岁的车臣人，在第一次车臣战争中，她曾经是另一名车臣领导人沙米利·巴萨耶夫的厨子。

这些恐怖分子向不同国家拨打了数百个电话，很快就将流言传播出去，称他们被从外部控制住了。巴拉耶夫说，他是著名的车臣武装头目沙米利·巴萨

耶夫的手下，而在这场危机结束后一个星期，沙米利承认为策划这次袭击负责。

车臣人在杜布罗夫卡的策略，与巴萨耶夫 1995 年在俄罗斯南部小城布登诺夫斯克的一家医院里执行的一次臭名昭著的恐怖袭击相似。首先，车臣人以杀死人质来威胁当局，同时寻求公众舆论的支持。在人质事件中，车臣人允许一些人进入剧院。他们当中有的是记者，其中包括伦敦《星期日泰晤士报》的记者马克·弗兰凯蒂、独立电视台的一个拍摄组，还有《新报》的安娜·波利特科夫斯卡娅；其他人包括著名俄罗斯医生利奥尼德·罗沙利、政客伊琳娜·哈卡马达，以及歌星约瑟夫·科布宗。

恐怖分子选择了一位医生，马里纳·什科里涅科娃，代表他们发表声明。此人正好也是观众。她带着恐怖分子写下的条件，穿梭于剧院内外，最后回到了这座建筑。恐怖分子很快开始让每一位来访者带走几名人质。等到危机的第二天，已经有 150 名人质被释放，其中多数是儿童、妇女和外国人。

1995 年在布登诺夫斯克，巴萨耶夫在控制了医院里的人质后，立刻杀死了其中一些男人，以显示他的要求是严肃的，而且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巴萨耶夫的手下也能够抵抗得住突袭，最后演变成了一场与特种部队之间的战斗。巴萨耶夫最后胁持人质逃走了，但莫瓦萨·巴拉耶夫的手下却无法抵抗最初的进攻。他们没有办法像沙米利·巴萨耶夫在布登诺夫斯克医院里那样，将剧院变成一座要塞。当时，巴萨耶夫手下的 200 名恐怖分子将人质作为人盾，挡住每一扇窗户。

在人质事件开始后几个小时，这座大楼的绝大多数区域已经被特种部队占领。对莫瓦萨·巴拉耶夫来说，唯一可行的选择就是让克里姆林宫相信，这些恐怖分子已经准备好毁掉整个剧院，并与人质同归于尽。为了令当局感到惊恐，并展示自己的意志，巴拉耶夫站在电视摄像机前，身边是一群女人弹，她们身上都绑着自杀式炸药腰带，头罩黑纱。

车臣人的首要条件是在一周内结束车臣共和国境内的战争。他们希望再现巴萨耶夫的成功历史，他在布登诺夫斯克扣留了 1 500 名人质，并以此要挟与位于莫斯科的俄罗斯领导人通过电话谈判。在那场危机的后期，巴萨耶夫成功获得了来自莫斯科的承诺，将停止在车臣领土上的军事存在。但是，俄罗斯领导人处理那次事件的表现遭到批评，而人质当中 100 多人死亡——其中很多是死在俄罗特种部队的手下——受伤者超过 400 人。在车臣，结束第一次车臣战争的大功被记在了巴萨耶夫头上。而在莫斯科，布登诺夫斯克则被当局看做一场巨大的失败。

在杜布罗夫卡剧院恐怖袭击的第一天，当俄罗斯当局的官员们聚集在剧院之外时，他们意识到必须避免再次发生像 7 年前在布登诺夫斯克那样的事情。普京任命联邦安全局副局长弗拉基米尔·普罗尼切夫和内务部副部长弗拉基米尔·瓦西里耶夫共同领导解救剧院人质行动。他们获得克里姆林宫的授权，可以展开强攻剧院计划，必要时，也可以展开谈判。

聚集在这一地区的士兵已经多达数百人，他们都来自内务部，负责在剧院建筑周围设立警戒区。几十名联邦安全局官员与此同时对该地区所有人展开询问，以防附近有恐怖分子的眼线，在附近的学校里还设立了一个筛查站。

唯一需要和恐怖分子面对面接触的是来自联邦安全局特别行动中心的官员，他们受亚历山大·吉洪诺夫将军的领导。特别行动中心包括三个部门：反恐小组阿尔法（或者叫做 A 处），该小组相当于美国的精英部队三角洲部队；信号旗特种部队（V 处），是第二个反恐单位；还有特别行动处，这是一个规模很小的联邦安全局精英团队，其组建的目的在于冒各种危险追捕罪犯。只有 A 处和 V 处接受过解救人质的行动训练。

传统上，A 处和 V 处的官员同时也拥有联邦安全局的职位。这些掌握强大

权力的组织与常规的军事单位极为不同。A处有四个分支，V处有五个。在危机时刻，这些分支都变成了攻击小组，每组有 15 名突击队员。在杜布罗夫卡人质事件中，两个分支常驻车臣，只有一个分支待命。特别行动中心将所有剩下的分支都部署参与这次行动——三个分支来自 A 处，三个来自 V 处。V 处一个小组的负责人是谢尔盖 · 沙夫林中尉。

他身材高大，不苟言笑，说话慢条斯理，长着一张方脸，留着小胡子。沙夫林当时 37 岁，并不是一个典型的联邦安全局官员。他在 20 世纪 60 年代从边防警察局转到特别行动中心。尽管边防警察局被视为原克格勃的一个分支，但他们一直与卢比扬卡保持着距离，他们更像战士而不是特工。沙夫林是一位授勋的军官，也是信号旗分支的指挥官。

冷战期间，信号旗成员曾经受训赴国外执行任务。他们受过外语培训，到处去旅行，其中包括拉丁美洲和欧洲。在国内，他们受的训练包括渗透进最为严密防守的战略地点（比如核电站）以找到安全漏洞。绝大多数时候，他们都能成功完成任务。通常来说，他们很瞧不起克格勃其他部门当中负责内部安全的同事们。

信号旗在冷战之后日子并不好过。叶利钦在 1993 年 10 月与议会当中的强硬派发生激烈冲突，信号旗官员拒绝接受袭击俄罗斯总统府的命令，后来也拒绝接受袭击议会的命令。因为这样不服从命令的行为，信号旗被移交给了内务部两年。但在几百名官员当中，只有 50 名转到了内务部，剩下的都选择了离开。1995 年，该机构其余的人员被送回联邦安全局。沙夫林没有离开信号旗，而是被派往车臣。杜布罗夫卡危机爆发后，沙夫林已经在很多热点地区执行了 14 次任务。在格罗兹尼的一场袭击当中，他带领自己的部队安全撤离，并因此于 1996 年获得俄罗斯英雄勋章。

但在杜布罗夫卡门外的冷雨和泥泞中，沙夫林并不知道自己是否能够拯救自己的部队。“所有人都害怕，恐怖分子会让我们进到剧院中，然后在外面的某个人会通过遥控器将我们全部炸飞。”沙夫林告诉索尔达托夫，“那原本可能就是故事的结局。我们等待着，我们甚至相互道别。但最后的结果却截然不同。”

特种部队接到命令，要击毙所有恐怖分子。沙夫林回忆道：“就在强攻之前，我们收到了这样的命令。因为知道这座建筑中已经被埋了地雷，也知道里面的炸药足够将整个建筑夷为平地，又考虑到这些爆炸装置都是复式的，那意味着只要有一个恐怖分子漏网，就能将所有炸药引爆，如果想活捉某人，将会造成悲剧性的后果。肯定会有人找到机会引爆炸药，如果是这样，我们就谁也救不了。”

10月25日，一个周五的晚上，大概到11点左右，本书作者进入了剧院旁边学校，所有人质的亲属们都等在这里。一张挂在墙壁上的名单，让我们得知亲属们汇报失踪的人质的准确数量。当时，总数已经高达698人，不过最后这个数字上升到了920。到26日凌晨两点左右，一位朋友接到了一名人质的电话。此人是《莫斯科真理报》的记者。她转述称，恐怖分子已经宣布他们计划在早上6点时向人质开枪射击。

为了更接近剧院，本书作者和两位同事获得了进入附近建筑物的许可。15分钟之后，我们被迎接进剧院大门口右侧一座建筑的房间里，就在迈尔尼科瓦大街和杜布罗夫斯卡娅第一大街交汇处。通过楼上的窗户，我们能够清晰看到剧院和前面的广场。我们有两台望远镜和两台照相机，但没有注意到装甲车与军人的分布与前一晚有何不同，此前恐怖分子曾经要求特种部队远离该区域。就在剧院门口，停着两辆小面包车，一辆红色的，一辆白色的，恐怖分子就是乘坐这两辆车来的。唯一的不同之处是，这两辆车的前灯都灭了，恐怖分子没

有将车熄火，这意味着，车上也可能装了炸弹。两位内务部突击队员在危机的第二天夜里试图去关闭汽车发动机，这带来了悲剧性的结果：其中一位突击队员被打伤，恐怖分子从剧院的窗户里开枪射击。

下面的内容都是由索尔达托夫和博罗甘当时亲手记录下来的：

凌晨 3:00 ~ 4:00 灯火通明的广场上一片寂静。

5:00 剧院入口处的灯光突然灭了，这是个坏兆头：就在前一天，车臣恐怖分子表示，如果灯灭了，他们会将此看做对方要强攻大楼的信号，他们会开始射杀人质。

5:35 手雷爆炸的声音传出来，接着是玻璃被打碎的声音。强攻剧院的行动已经开始了。一阵阵枪声从剧院侧面入口对面的工厂里传出来，距离大约在 200 米外，接着传来机枪的声音。

6:05 收音机上说行动人员声称已经收到来自人质的电话。他说恐怖分子已经失去耐心并已经开始处决人质。根据官方的说法，所有的枪击都是恐怖分子的行为。现在，我们认为很明显，这是俄罗斯部队强攻行动的开始。过了一阵儿，恢复安静；我们能够看到内务部的部队正在重新集结。剧院里短暂地平静了一会儿。一辆蓝色的吉普车关掉车灯，发动机却在运转。这辆车靠近主入口，四名全副武装的战士出现在了大楼左侧的桥上。他们的制服表明，是“冲锋枪”的人，“冲锋枪”是内卫部队（从属于内务部）中的特种部队。

6:35 内卫部队的 6~8 名士兵跑过广场，冲向主入口，踢开大门，并朝向玻璃射击。

同时，救护车不断涌到广场上来。一分钟之后，装甲车也赶了过来，

这些车辆原本停在杜布罗夫斯卡娅第一街和梅尔尼科瓦街上。装甲车在剧院入口处 120 米的地方停了下来。从大楼里面传出两声枪响，这辆装甲车上的重机枪马上还以颜色。

联邦安全局特别行动中心的部队带着两名女性从大楼里出来，突然之间整个大楼都响起了枪声。大约 10 名士兵藏在大楼右侧的草丛里，另一支小分队藏在剧院的左侧。

我们听到大楼里传出两声爆炸，伴随着白光。这肯定是手雷的声音。这以后停车场周围的士兵全都穿过广场，向主入口跑去。

6:40 一小组士兵抬着一盏大灯，穿过一楼大厅，朝着大楼侧翼的方向前进，那里有一个图书馆。

6:47 在内部的三处地点，士兵们开始击碎玻璃，将那些写着巨大的字母“东北风”的海报撕下来。这些海报盖住了一楼人口大厅的玻璃幕墙。

6:50 有人被拖出了大楼。几秒钟之后，我们看到两名士兵背着一位身穿灰色汗衫的年轻人。我们看不出来这人是化了装的恐怖分子、人质还是记者。

7:00 主入口的大门已经被打开。三辆卫士吉普车被开到大楼附近。就在我们窗户下面，没有乘客的巴士沿着梅尔尼科夫大街行驶。就在主入口门前，现在有几十个人了。他们大声呼喊着“快点”。一名女性人质几乎是爬着从大楼里出来，其他人都不能走路了。一具尸体被抬了出来，然后又是一具。

7:03 还是能听到枪声。同时，一群人被簇拥着走出大楼。一个女孩正被抬出来，然后是好多尸体。

7:06 许多尸体陆续被抬出来。戴白色头盔的营救人员加入特种部队，

参与救援。大量的尸体就被排成一排，摆在主入口前。尸体有 20 多具。从他们的衣服状况来看，他们大多是被营救者用肩膀扛出来的，大多数是女人，有些甚至很年轻。上帝保佑，我们想，除了这么多死者，他们总算找到了一些幸存者。几辆救护车装满伤者之后离开广场。

四辆巴士停在了大楼右侧；从这个有利位置，我们能清楚地看到那里。同时，主入口的左侧，营救者们继续将尸体抬出来摆放整齐；现在已经有几十具了，而且数量还在快速增加。几分钟之后，整个地面都是尸体；左侧的楼梯上摆满了各种颜色的毛衫，都是人质身上掉下来的。因为没有足够的空间，所以尸体被叠放起来。我们还在想，那些尸体当中是否还有人活着，但这种可能性看上去很小。

第一辆坐满被营救的人质的巴士离开了人口的区域。但人质们看上去很奇怪，好像睡着了或者神志不清。几分钟之后，一些破布被拿出大楼（可能是桌布或者窗帘之类）被盖在另一辆巴士上那些动不了的人身上。

在主入口处，尸体还在不断增加。另一辆巴士离开了。

与此同时，电视台开始播出消息，称一名行动小组成员宣布强攻结束：人质获得自由，恐怖分子全部被击毙，却只字未提是否有其他受害者。这条消息宣布之后，又有两具尸体被抬出来。

7:43 ~ 7:50 另外两辆装满人质尸体的大巴离开，这些尸体的表情都很奇怪。

7:50 一道屏风被放置在剧院入口前，将视野阻挡住了。

8:00 这次行动的联合指挥官瓦西里耶夫宣称，总共有 36 名恐怖分子被击毙。莫瓦萨·巴拉耶夫也在其中。他还说，在几名企图自行逃出剧院时，行动人员被迫强攻大楼。

瓦西里耶夫的消息宣布完不久，我们的一位同事警觉地喊了一声：“快看！他们正在将尸体搬上大巴——他们甚至从椅子上掉了下来！”然后他将望远镜递给我们。就在这时，独立电视台的一名记者表示，他能看到经过的巴士上，人质们的脸色全都“一片乌青”。

8:45 停车场的右侧，我们能看到尸体袋被装上巴士。一辆巴士开过来，尸体被装了进去。

11:00 还继续有死者被从杜布罗夫卡剧院抬出来。即使当我们要离开那间公寓时，还有一些尸体被放在主入口的台阶上。

从一开始，俄罗斯当局就准备好了应对车臣人引爆炸弹的可能。但在强攻时，却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情。这些身上绑满炸药的女恐怖分子，并没有将自己和人质都炸飞，而是脸上盖着纱巾，和人质一起躺在地板上。特别行动组的战士们得到命令，对恐怖分子格杀勿论，所以根本没有机会在后来去问这些车臣人为何没有引爆炸弹。沙夫林说：“我们进入大厅时，看到了一名女性人弹。她坐在一把椅子上，眼睛睁开着，手里拿着电极，她只需要将其接触就能引爆。她为什么没有那么做，我们不得而知。也许她在等待某种指令或者命令吧，她完全有足够的时间。”

这场突袭事件之后，人们才知道特种部队将芬太尼气体射进了剧院，这是一种麻醉气体，他们原本想通过这种方式让恐怖分子陷入沉睡。这种气体的药性比吗啡要强 300 倍，但对一个人产生效力不过需要两分钟。当这种气体被射入剧院时，恐怖分子立刻都昏迷了过去。

根据沙夫林的说法，特别行动成员们并不相信许多人质在强攻后能够活下来。因为考虑到会有爆炸，当特种部队进入剧院后，联邦安全局使用了致命的

毒气，不顾一切地支持特种部队，根本没考虑其结果如何。行动成员们以为形势毫无希望，使用了所有可能的手段。因为没有发生爆炸，这次强攻被看做成功了；在当时，当局根本没有考虑毒害人质的结果。

最后，130名人质死亡，只有5人死于恐怖分子之手。根据俄罗斯官方的说法，芬太尼是一种呼吸系统麻醉剂，死伤者如此之众，只是因为人质在经过三天的危机后，身体太虚弱。但帕维尔·菲诺格诺夫，在杜布罗夫卡剧院人质事件中失去了自己32岁的哥哥后，告诉博罗甘：“我的哥哥伊戈尔是一位特种部队军官，而且最近刚刚接受了训练，包括模拟毒气攻击，而且他成功地完成了这次训练。他的遗体完好。”实际上，官方根本没有准备好释放毒气之后的应对措施。没有建立临时医院，手边也没有足够的氧气，更没有为中毒者准备好解药。很快事态就变得明晰起来，事先没有人接到使用芬太尼的命令。“在总部，对这次行动的预测是不会产生损失，将会有枪战，会有爆炸，也会有大量的伤亡。但到底发生了什么呢？强攻结束了，没有发生爆炸，800人或更多的人不得不接受治疗才能清醒过来。事实上，谁都没有为此作好准备。”沙夫林回忆道，“我们还以为会有爆炸。我们认为总共的幸存比例可能会少于10%。”

联邦安全局的特别行动成员和其他部门严重错误估计了形势，他们没有设想过炸平剧院的威胁只不过是恫吓。联邦安全局的实验室提供了这种毒气，但没有人考虑过使用之后如何解毒。特别行动组的成员们最后决定不再重复发生在布登诺夫斯克的事情。将军们想要保证普京在叶利钦曾经失误的地方取得胜利。10月24日，人质危机的第二天，米哈伊尔·列昂季耶夫，第一频道的一位政治评论员，他被认为非常接近普京。他在自己的节目中表示：“这次事件的启示就是，我们都在为布登诺夫斯克的事情付出代价——因为政府与这帮恶棍和流氓达成了政治协议而带来了耻辱。当有一个人开始谈论代价和谈判时，我

们算一算在这 7 年中，我们为布登诺夫斯克和哈萨维尤尔特付出了多少生命的代价……我们有罪——我们所有人都有罪，我们让他们有机会考虑布登诺夫斯克的事情有可能再现。”

这次强攻之后，当时的一位行动组成员，联邦安全局的将军亚历山大·兹达诺维奇也开始邀功。10月26日，在被要求比较杜布罗夫卡剧院人质事件和布登诺夫斯克和人质事件时，兹达诺维奇表示：“我想说的第一件事情是，我们的特种部队一直随时准备着解决问题。我认为，那次（在布登诺夫斯克）的情况是决策层缺少当机立断的政治意愿。”

那些质疑这次行动的人都受到了惩罚。莫斯科回声电台被媒体部正式警告，如果播出对恐怖分子的采访，电台将会被关闭。电视频道上，莫斯科的节目播出被暂时停止。独立电视台对危机的报道也遭到了普京的批评。与此同时，治疗那些因吸入毒气而中毒的病人的诊所也被禁止向记者提供关于患者的信息。当局表明，不会泄露任何关于这次行动的情况。

10月27日，星期天，就在强攻剧院后的那天，当时还在为周报《维尔西亚》工作的两位作者意识到，这一周等待自己的报道被刊发，无异于浪费时间。于是决定将报道发布在网站Agentura.ru上。星期一，著名意大利记者吉利艾托·切萨将他们的报道转载到意大利《新闻日报》上。

接下来的那个星期五，也就是11月1日，当《维尔西亚》决定继续报道时，一群联邦安全局官员来到了编辑部，并开始搜查，声称他们要寻找索尔达托夫在当年5月发表的一篇文章的相关信息。几台电脑，包括编辑部的服务器都被没收了，还有几位记者被命令前往联邦安全局接受讯问。星期天的时候，索尔达托夫接到了联邦安全局调查局阿列克谢·戈尔恰科夫的电话，并被叫去接受质询。

一个月过去了，本书作者和《维尔西亚》的其他人都受到了一系列的讯问。这段时间过得很难。我们能感到极大的压力，而且所有受讯问的记者都被要求签署保密协议。

2002年11月底，索尔达托夫接到了联邦安全局莫斯科分部的一位少将弗拉基米尔的电话，他在反恐部门工作，也是一个消息源，能够时常提供关于恐怖组织的有用信息。弗拉基米尔要求见面，并选择在莫斯科动物园门口碰头，这个地方位于市中心对外贸易展览中心附近。

当索尔达托夫与弗拉基米尔在公交车站见面后，这位曾经在过去两年中一直断断续续合作的线人，拒绝坐在作者的车里，并建议绕着公园围墙步行。“你看，安德烈，你知道，我们都陷入了大麻烦。”弗拉基米尔说道，“我被命令来告诉你，他们已经准备好结束调查了，但我们必须达成一项协议：忘记杜布罗夫卡剧院。”弗拉基米尔实际是在建议我们，不要再进行深入的调查了。当时，对那次行动，还有许多问题待解，包括毒气的性质，以及联邦安全局在面对恐怖袭击时作出的决定。索尔达托夫和博罗甘还在不断收到关于杜布罗夫卡人质危机事件的情报，并且试图继续调查。

索尔达托夫非常吃惊，他与弗拉基米尔之间的联系竟然已经被联邦安全局领导层得知，而且弗拉基米尔竟然被联邦安全局利用来说服《维尔西亚》停止调查。（就在这次会面前一周，索尔达托夫和博罗甘写了一篇报道，披露了许多细节。这些内容都是由莫斯科检察院的一位调查员提供的，他声称并不是所有恐怖分子的炸药都是可用的，多数都是假的，而且克里姆林宫早就知道这些情况。）

本书作者也获得了信息，死亡人数高于官方公布的130人这个数字。但在人人自危的情况下，要了解更多的情况变得越来越难；消息源担心《维尔西亚》

所有的记者都在受调查和监视。

当他们围绕公园散步时，索尔达托夫严词拒绝放弃自己的调查。

“忘了这事吧，没什么可调查的了，也没有人对这个感兴趣——杜布罗夫卡剧院是一场胜利！”弗拉基米尔反对说。弗拉基米尔向索尔达托夫解释道，这次行动被描述为成功的，是为了打击恐怖分子，让他们不再气焰嚣张地在未来发起类似的袭击。这是联邦安全局为何对公布确切死亡数字没有兴趣的原因之一：“安德烈，你知道，根据自杀式炸弹袭击者们的规矩，如果你杀死了6个人，你就赢了。”

弗拉基米尔警告索尔达托夫，如果他不停止调查，他将会不断被叫去接受讯问。索尔达托夫反唇相讥，只要自己被讯问，就会被他的记者朋友们报道出来——这也会给联邦安全局带来压力，而不仅是自己会有压力。最后，事情正是这样发展的：联邦安全局不断对索尔达托夫进行讯问，而记者们则不断地写出类似报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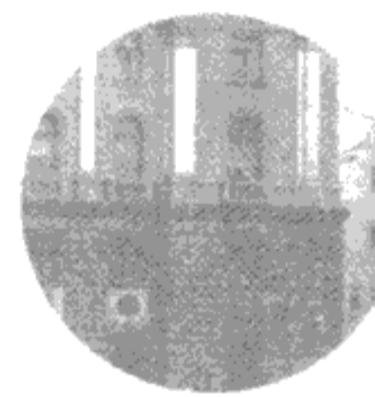
几个星期之后，对索尔达托夫的讯问停止了，联邦安全局也归还了《维尔西亚》的电脑。联邦安全局从未告诉索尔达托夫，这个案子是否已经结束，但已经不再问他关于这个案子的情况了。

在人质危机后几个星期，克里姆林宫宣布打击恐怖主义获得成功，而策划强攻计划的将军们都得到了表彰。这个国家的最高荣誉——俄罗斯联邦英雄勋章——也被颁发给联邦安全局局长帕特鲁舍夫、他的副手弗拉基米尔·普罗尼切夫（他们在联邦安全局的总部里指挥了这次行动），还有特别行动中心的指挥官亚历山大·吉洪诺夫。联邦安全局莫斯科分部的负责人被提升。当局表态说，安全机构的作用在20世纪90年代被弱化，现在需要的是支持而不是责备，如此轻描淡写，就让这样的决定显得入情入理。

尽管政府试图将莫斯科剧院危机描述成俄罗斯的一场胜利，但这次行动实际表明安全机构在遇到异常重大的人质事件时，其应对能力严重不足。除了造成大量的人质死亡外，杜布罗夫卡剧院危机表明了一个耻辱的事实：即便配备武器来解决恐怖主义威胁，联邦安全局的行动仍旧协调不足，而且把事情搞砸了。

The  
New Nobility

The New Nobility © 2002, 2003 Penguin Books Ltd. This  
product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author.



## 第十三章

# 悲剧： 别斯兰危机



在莫斯科发生灾难性的杜布罗夫卡剧院人质危机两年后，车臣恐怖分子在北高加索地区发动了一系列残酷的攻击。又一次，安全机构没有能够快速而高效地应对危机（尽管安全机构自身的组织结构等已经有所改观），在遇到危机形势后，其领导能力严重缺乏。

第一次攻击发生在 2004 年 6 月 21 日，当时超过 200 名叛军到达与车臣接壤的印古什共和国的纳兹兰和卡拉布拉克。这些军事人员分成若干小组，每组有 20 人或 30 人，他们强攻入 15 座政府建筑，其中包括第 503 军团总部、内务部总部，还有联邦安全局边防警察基地、一个军火库及当地警察总部。

这些叛军中有车臣人和印古什人，仍然由车臣叛军头目沙米利·巴萨耶夫领导。他们的主要目标是执法部门的人员。这些人身穿迷彩服，头戴面具，他们在街上拦住行人，要求其表明身份，并杀死任何身上带有执法部门成员身份证件者。在突袭期间，他们甚至建起自己的检查站。

根据官方公布的数据，叛军杀死了 62 名执法部门官员，其中包括印古什内

务部长、两名检察官和 9 名联邦安全局地方官员。这次袭击得到了高度协调：当叛军在两座城市筛查执法人员时，35 名武装人员前往内务部位于纳兹兰的军火库，在那里找到超过 1 500 支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和大量的弹药。他们抢走了内务部的卡车，上面装满了武器，然后扬长而去。装载弹药花费了三四个小时，在此期间，叛军继续攻击了军方设施，阻止了任何想要收回枪支的努力。整个攻击事件持续不到个小时，联邦军队直到第二天才到达纳兹兰，此时战斗已经结束了。

在纳兹兰发生的袭击，发生在安全机构正处于变革和软弱无力的时期。在莫斯科，高级官员们想要表明，战争确实已经结束了，只需警察做一些工作即可。这样的态度在那些易受攻击的地区，导致安全机构应对重大事件的方法有所不同。更多的责任被推给了内务部，而该部本质上只是一个警察组织。联邦安全局也插手其中，如同其在军队中所做的一样，但在 2004 年夏天，联邦安全局决定将警察活动交还给警察部门。在新的治理结构下，权责不明确，安全机构相互扯皮，各方难以协调的问题很快登峰造极。2004 年 7 月，在北高加索，形势变得极为复杂：至少联邦安全局的三个部门和一些地方机构、军事情报部门和内务部都在该区域展开行动。而各部门之间少有，或者根本没有协调。

8 月，克里姆林宫作出了一个关键性的组织结构变革，组建 12 个“行动管理小组”来治理混乱不堪的北高加索地区，而所有这些小组都由内务部监管。成立这些管理小组的目的是为了在面对恐怖袭击时，协调该地区的安全机构。这一变化将应对攻击的责任交到了警察手里，而不是联邦安全局或军方。这 12 个管理小组分别由内卫部队的一名上校指挥，他们也拥有地方反恐机构负责人的头衔——这让指挥者在面对恐怖袭击时，成为权力仅次于地方领导人的官员。遇到人质事件或者叛军袭击，12 个管理小组的指挥员应该担负起责任。他们能

够独立于莫斯科作出决策。建立 12 个管理小组也是权力移交的一个重要标志。在 20 世纪 90 年代，应对所有重大恐怖袭击的工作，都由莫斯科中央政府负责。新的体系在于向地方放权，让地方指挥人员发挥更大作用。（但是克里姆林宫将这些指挥官的身份置于保密状态，所以在其决策失误后，公众无法让其承担责任。）

2004 年 8 月 24 日，两架国内航班，一架是图-134，一架是图-154，分别在 10 点 30 分和 9 点 35 分，从莫斯科的多莫杰多沃国际机场起飞。在大约 11 点时，两架飞机几乎同时坠毁，相距数百英里：在两个事故中，总共有 89 名乘客丧生。几天之后，事态逐渐明朗，两架飞机是在飞行中被两名女人弹炸毁的。

8 月 31 日，星期二，另一名女人弹在莫斯科市中心的利兹斯卡亚地铁站附近将自己炸飞。另有 10 人死亡，51 人受伤。当时是星期二晚间，地铁站附近有许多高官，其中包括莫斯科市长。所有这些攻击似乎都是用来转移官方注意力的，以掩护将在 24 小时内进行的更大规模攻击。

2004 年 9 月 1 日，超过 40 名恐怖分子配备从印古什偷来的枪支，在奥塞梯北部的别斯兰劫持了一所学校。总共有 1 100 人被扣为人质，其中包括大约 770 名儿童。在危机的最初两天中，恐怖分子不断骚扰当局，要求与政府高官直接对话，而且每次有人来谈判，就会释放一部分人质，以表明谈判的诚意。他们允许前印古什总统鲁斯兰·奥舍夫进入学校。作为交换，26 名人质被释放，以表诚意。但这些恐怖分子拒绝与记者打交道，声称他们可能是联邦安全局的暗探。（著名记者安娜·波利特科夫斯卡娅可能被允许进入了学校，但她却在 9 月 1 日，在飞往该地区的飞机上神秘中毒。对她进行的医学检验的结果不翼而飞，更强化了她被安全机构下毒的观点。）在人质危机的最初几个小时里，他们处决了几十人，这些人的尸体被从学校窗户里扔出来。

9月3日，星期五，人质危机进入第三天，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政府军队将会对学校展开强攻。在学校周边建立的安全警戒线也不是特别严密，更没看见调动新的军事人员。

但到星期五早上，记者当中开始传播消息，恐怖分子可能会允许医务人员挪走被他们打死并从窗户里扔出来的尸体。

当这些持枪者允许四名来自紧急状况部的医疗工作者乘坐两辆救护车接近学校时，两枚炸弹在学校体育馆爆炸，而那里聚集着人质。当时是9月3日下午1点零5分。

爆炸几乎将学校的屋顶掀起来，部分墙壁也倒塌了。惊慌失措的孩子们发现逃跑的机会到了。恐怖分子们开火，迫使安全部队攻入大楼。

当枪战开始后，联邦安全局特别行动中心，包括受过反恐训练的精英都准备不足。尽管有足够的地面部队，10个攻击小组中有两个没有立即到达出事地点，而是正在距离别斯兰30公里的一幢类似的建筑中进行攻击训练。学校附近的特别行动中心官员甚至连防弹背心都没有穿。看到孩子跑出来，恐怖分子开始开枪时，他们没有选择，只能强攻学校。10名军官死亡，这是特别行动中心所遭受的最严重损失。

别斯兰行动很快变成了一场城市巷战。一些当地的持枪者从学校里跑出来，将被释放的孩子带走。其他人持枪向相反的方向跑去。到下午两点左右，其中一位对着我们喊道：“我们需要猎枪子弹，请帮我们找一些！”到那时，战斗已经远远超出了学校所在的区域。一些人一直不停地开枪射击，另一些人担心恐怖分子隐藏了起来，所以疯狂地寻找所有看上去可疑的人。两名本地民兵捉住了一名妇女，他们认为这女人是恐怖分子，多亏了她的丈夫突然到来，才将其解救。

大约三个小时后，当地军队似乎开始相互厮杀了。我们非常吃惊，形势竟然变得如此混乱无序。大约到 5 点，我们设法靠近学校，和其他几十位奥塞梯人一起站在学校附近。但我们并不是很确信行动是否还在进行。此时的莫斯科，国家电视台报道行动已经结束。6 点，索尔达托夫接到莫斯科回声电台的电话，而就在这一刻，爆炸声传来。“发生什么事了？”他被问道，“我们收到的消息是行动已经结束了。能否解释一下刚才那声音是什么？”实际上，直到 11 点 15 分，爆炸才停止。最后一声爆炸是参加这次行动的第 58 军坦克射出的炮弹，打击的是占据学校地下室的最后三名武装分子。总共有 334 名人质被杀，其中包括 186 名儿童。这是一场灾难。

别斯兰人质事件为俄罗斯安全机构应对大规模人质事件和恐怖主义的能力蒙上了一层阴影。各个部和各种精英部队都接受了召唤，但他们看起来像一只损坏了的手表的部件：各部分目标一致，各司其职，而整个机制却失灵了。

从一开始，别斯兰的人质危机就很明显是国家级别的。但因为害怕承担失败的责任，莫斯科的联邦安全局将军们有意将这次危机定为地方级别。重新组织后的系统，也就是在一个月之前才被批准，本该将 12 位指挥官中的一位派来负责指挥应对这样的事件。但在别斯兰人质危机期间，指挥官被指定为联邦安全局北奥塞梯负责人。危机爆发的第一天，普京派联邦安全局局长尼古拉·帕特鲁舍夫和内务部部长拉希德·努尔加利耶夫到别斯兰，但他们很快就离开了那里。这两位官员甚至都没有到达别斯兰城里。他们到达机场，停留的时间也就刚够等下一班返程飞机起飞。学校在早上 8 点被占领，到中午的时候，联邦安全局和内务部的一把手虽然来到了别斯兰但很快又回到了莫斯科，往北 932 公里，去会见普京。“我根本没有在别斯兰见到帕特鲁舍夫和努尔加利耶夫。”

联邦安全局北奥塞梯领导人瓦列里·安德烈耶夫这样表示，他被指定负责这次行动。2005年12月15日，瓦列里是在北奥塞梯最高法院审讯唯一一名被活捉的恐怖分子努尔帕希·屈拉夫时说这番话的。

这场悲剧发生一年后，在2005年9月2日，普京与“别斯兰母亲委员会”的成员会面，他被问道：“为什么帕特鲁舍夫和努尔加利耶夫他们没有在9月1日出现在别斯兰？他们来到了机场，但他们很快就离开了。为什么他们中的有些人没有留下来呢？”普京回答说：“这种情况偶尔发生，因为有许多位将军，他们之间相互妨碍，所以他们就离开了。”

让情况更为恶化的是，两组行动成员被派来，第一组是官方的，由安德烈耶夫负责，第二组是半官方的，包括莫斯科的联邦安全局将军在内。两位将军，弗拉基米尔·普罗尼切夫和弗拉基米尔·阿尼西莫夫都是联邦安全局的副局长，他们被当做“顾问”介绍给安德烈耶夫，但并没有明确的职责。2005年12月15日的审判中，安德烈耶夫表态称，联邦安全局局长帕特鲁舍夫告诉他，普罗尼切夫的到来将会“为行动带来实际帮助”，而阿尼西莫夫被派来的具体作用是什么则没有人提及。

因为担心得罪当地人，当局没有能够有效地在被占领的学校周围设置安全警戒。

这导致冲突规模迅速扩大，不仅是特种部队，连恐怖分子都感到意外。当地人首先行动起来，开车将孩子们从燃烧着的学校里带走，这是行动指挥者没有能力领导这场营救行动的最佳证明。别斯兰现场挤满了高官，其中还包括联邦安全局副局长和其他莫斯科联邦安全局将军。当然其中也包括亚历山大·兹达诺维奇，9月3日本书作者在营救行动成员当中看到了他。但尽管有这么多大人物在场，指挥者似乎没有明确的职责分工，原本应该由特种部队展开的行动，

最后演变成了某种形式的街头枪战，最后只有动用坦克才得以平息，而这已经在强攻开始几个小时之后的事情了。营救人质的行动似乎根本无人指挥。两点时，经过几乎一个小时的枪战，我们看到南奥塞梯（一个从格鲁吉亚独立出来的国家）的总统爱德华·科科伊季命令俄罗斯军人加强封锁。他是另一个共和国的总统，但他也成为决策者之一。

别斯兰发生的一切残酷地暴露出俄罗斯安全机构根本没有能力快速而高效地解决危机。莫斯科将权力下放，而且派了几十位官员专门来到发生危机的地区，这一切都没能避免令人恐惧的结果发生。最后，经过混乱而令人惊恐的三天后，334名人质（其中186人是儿童）丧生。





New Nobility  
New Nobility

www.nobility.com

## 质疑： 混乱的反恐对策



经过杜布罗夫卡剧院和别斯兰危机之后，不断有声音促请议会调查事件详情和安全机构在这些重大事件中杂乱无章的应对。

莫斯科剧院人质事件中，右翼力量联盟（Union of Right Forces）的自由派政治家，同时也是国家杜马的发言人，伊琳娜·哈卡马达；就是被车臣攻击者请入剧院的许多人之一。在剧院第一次见到车臣人的时候，她就意识到跟他们谈判将十分困难。“你知道，我有一种印象，他们并不是口头上的殉道者，这种决绝可以从他们的眼睛中看出来。我看着他们的眼睛，感觉到他们已经准备赴死了，如果当时已经到那一步的话。”哈卡马达希望他们不要伤害孩子们，先将他们释放。“我想把孩子们带出来。我开始询问并向他们解释，孩子不应该被卷进来。我当时感觉可能已经说服了其中的一位，我看到他的眼睛一亮，然后他开始跟我说自己也有一个小孩子。但在这一刻，他们的头目出现了，并将他支走，还告诉我，‘就这样吧，不要再用你那些要求来烦我了！’”

强攻剧院而且许多人死于毒气后，哈卡马达和她党内的其他人开始敦促议

会展开调查。该党的另一位领袖，也是叶利钦时代的高官，鲍里斯·涅姆佐夫，希望调查能够在三个主要问题上给出实实在在的答案：这些手持武器的恶棍怎么会出现在莫斯科市中心？被释放的人质是否得到了及时和完全的医疗救护？政府为何要将这些信息隐瞒？

10月29日，人质事件刚过去没几天，哈卡马达要求议会对这场灾难展开全面调查。但在议会下院的441名议员当中，只有44人支持她的要求。“我不想责怪任何人，但我们认为不仅需要议会的调查，也需要国家介入调查。”她说道。议会中亲克里姆林宫一派的领导人维亚切斯拉夫·沃洛金声称，她的建议“不合时宜”。他还接着说：“在官方调查得出结论之前，任何同步的调查都只能被看做自我炒作的借口，是在利用人们的悲剧获得政治资本。”

所以，没过几天，议会就宣布不会展开全面调查。这个动议被否决，是因为另一个民主政治派别民主党没有对其表示支持。10月29日，普京邀请民主党的领导人格里戈里·亚夫洛夫斯基前往克里姆林宫，感谢他在人质危机期间对当局的支持。“你是参与救援并作出积极贡献的少数人之一，”普京说，“而且与其他许多人不同，没有用别人的不幸来为自己贴金。”

哈卡马达和涅姆佐夫的政党是一个小党，成员包括经济改革者阿纳托利·丘拜斯，他们决定自己成立一个委员会。从10月底到11月初的好几天里，他们召集大量专家来解决关于人质事件的几个悬疑。这次调查的结果在11月20日公布，多数篇幅都被用来讲述芬太尼气体的医学作用。接受采访的一名医护人员表示：“没有人警告过我们，剧院里到底是什么情况。我们只知道会有很多伤员，没有人说过有人使用了毒气，也没有人告诫我们应该带上防护设施，以便保护自己不受遗留下来的毒气伤害。我们不得不自己估测伤员们的情况。”委员会的这份调查报告得出结论：“在强攻期间，导致被营救的人质伤亡数量剧增

的主要原因是官员们失职，没有安排在第一时间对受害者进行救护，也未能及时将他们送往医院，同时，整个营救行动的安排协调严重不足。”除了其他许多问题外，这个调查委员会还发现，人质们身体虚弱，如果将他们的身体摆放得更加有助于呼吸，许多人的伤亡原本是可以避免的。

当局对车臣恐怖分子展开了犯罪调查，但却没有付出进一步的努力，对安全机构或克里姆林宫应对危机的做法进行追究。受害者家属都弄不清楚人质事件期间到底发生了些什么，备受打击。家属们唯一可以用来质疑国家的方法就是要求获得赔偿，但当他们这么做了以后，却被指责为想要从这场悲剧当中获利。最后，唯一获得的补偿就是赔偿他们亲属的财物。帕维尔·菲诺格诺夫的哥哥伊戈尔因为毒气死亡。她在接受采访时告诉博罗甘：“当局没有付出任何努力，哪怕是告诉我们一丁点信息，到底我们的亲人是怎么被杀死的，谁应该承担责任。”菲诺格诺夫和其他一些受害者家属向位于斯特拉斯堡的欧洲人权法庭提出申诉。“总统办公厅向总检察署和所有参与调查这次恐怖袭击的人施压，”他说道，“而施加这些压力的目的就是不让他们泄露任何信息。”杜布罗夫卡剧院受害者的亲属们成立了自己的委员会，但他们在调查报告中表示：“对安全机构在《东北风》事件当中组织和执行的营救行动没有依法进行客观评估，而且进行调查所必需的许多事实被隐瞒，这导致在别斯兰发生了更加可怕的悲剧。”

最后，俄罗斯政府没有承担任何压力，也无须为他们作出的决定和在杜布罗夫卡剧院发生的大量伤亡承担责任。不管是议会、受害者亲属还是媒体抑或检察官，都不愿意进行全面而独立的调查。安全机构和克里姆林宫不想面对这样的调查——他们也如愿以偿了。

两年后，当别斯兰人质事件发生时，同样的失职再次出现，要求议会展开

调查的声音也再次响起。2004年9月7日，普京在一个特别新闻发布会上对外国记者表示，应该对这次悲剧进行一次“内部”调查。当有人问起是否会进行议会调查时，他回答：“那样的调查最后又会变成一场政治秀。”

但在北奥塞梯发生大规模游行示威后，普京在9月10日同意在议会上院联邦委员会内部成立一个委员会，来调查别斯兰恐怖袭击。一小撮受到克里姆林宫控制的议员想要对这次调查进行限制。但国家杜马的发言人鲍里斯·格雷兹洛夫宣布，国家杜马将成立自己的委员会来调查别斯兰事件。9月20日，一个由11名上院议员和10名国家杜马成员组成的议会委员会宣布成立。委员会由亚历山大·托尔申负责，他是联邦委员会发言人，也曾经是一名苏共官僚。两年之后，该委员会在2006年12月发布报告。总体来说，这份报告确认了官方对于人质事件的说法，仍然是国家反恐系统内的口径。该报告得出结论，安全机构的行动是正确的，“采取了必要措施保护人质健康与生命，将这次恐怖袭击的危害降到最低限度”。报告指出的唯一错误在于对现场行动人员的组织混乱（但这项批评的对象并不包括北奥塞梯总统），还有训练上存在的问题。

别斯兰事件中的受害者家属要求进行独立调查，并对高层安全官员进行惩罚。2005年9月，别斯兰悲剧发生一年后，普京邀请了受害家庭中的8位代表前往克里姆林宫，会面持续了两小时45分钟。遵照其他受害者家庭的嘱托，这些代表向普京询问了联邦安全局局长帕特鲁舍夫、内务部部长努尔加利耶夫以及所有执法机构等的责任问题。

普京受到一位受害人家属阿扎马特·萨巴诺夫的追问，他甚至提出安全机构的这些高官是否应该辞职谢罪。普京承认，他们下台是人之常情。“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已经辞职了。”他说道。但是，不论是帕特鲁舍夫还是努尔加利耶夫都没有接到要求其下台的命令。

另一位受害者家属阿内塔·加季耶娃问，普京能否将瓦列里·安德烈耶夫辞退，正是他当时负责指挥行动的。“你让安德烈耶夫下台了吗？”她问道。

“是的，我们不再让他负责行动工作了。”

她反问一句：“那么，为什么他得到了晋升，而且被派到了新的岗位上？他现在是联邦安全局学院的副院长。他能教什么呢？”

当另一位受害者家属再次提出这个关于安德烈耶夫的前途问题时，普京只是回答道：“我会处理这件事的。”

尽管承受着巨大的公众压力，安全机构内部谁都没有因别斯兰的强攻行动明显缺乏协调指挥而受到惩罚。

2005年12月27日，副总检察长尼古拉·舍佩尔表示，他的部门对此事的调查表明，安全机构对人质危机的应对不存在任何错误。但当地的人们不断对当局施加压力，最后几只替罪羊被抓了出来：米罗斯拉夫·艾达罗夫、塔伊姆拉斯·莫尔塔佐夫和古拉姆·德里亚耶夫，这三个人都是当地警察局的底层警员。这三个人被控犯有玩忽职守的刑事罪行，但在2007年获得赦免。

2007年6月，俄罗斯全国反恐委员会组建了一个特别工作小组，受帕特鲁舍夫领导，职责是应对“恐怖主义意识形态”。2008年4月24日，帕特鲁舍夫批准了一项计划，该计划规定了情报机构从2008年到2012年的一整套指导纲领。本书作者掌握了这项计划内容。这项计划当中的措施包括专门培训课程，被称为“堡垒”，是培训记者如何掩盖恐怖主义攻击。本书作者认为，这套由安全机构编制的课程，是对记者进行的某种洗脑，旨在掩盖恐怖袭击的发生和反恐行动。内务部官员们表示，如果一名记者未参加这项课程，将被禁止进入事发区域，官方授权进入的人数将极为有限，接受过“堡垒”培训

的人将可优先进入。文件表明，安全机构被要求“制定规定，对接受过该课程培训的记者进行授权，颁发专门的证书，这将成为记者在反恐行动中获得行动人员授权的条件”。这项要求与俄罗斯媒体法律相抵触，法律中并没有提及记者要想得到授权就必须参加培训课程。

这份文件提到的另一点是，联邦安全局和对外情报局及其他国家机构被要求制定统一的回应措施，以应对海外恐怖组织的宣传中心策划实施的具有“反俄罗斯性质的行动”，“包括阻止在柏林设立一个审判车臣战争罪行的国际公开法庭”。设置该法庭的主意是由德国议会在 21 世纪初的几年提出的。

莫斯科的安全机构领导们，一次又一次地将车臣人的恐怖袭击归咎于外界——渗透进车臣的基地组织、宗教极端主义分子，或者为武装分子提供援助的外国情报机构。在“9·11”恐怖袭击之后，联邦安全局局长表示，车臣是抵抗基地组织的另一条战线，而且最残忍的恐怖袭击都是由阿拉伯人提供资助的。两名在车臣作战的阿拉伯军事头领是埃米尔·哈塔布和阿布·阿勒瓦利德，他们被控组织了 1999 年 9 月的莫斯科公寓爆炸案。阿布·阿勒瓦利德被联邦安全局指责曾经接受 450 万美元的资金援助，用于在 2004 年发动莫斯科地铁恐怖袭击。2004 年 10 月，联邦安全局的北高加索发言人声称，基地组织和穆斯林兄弟会是车臣事端的始作俑者。

但对外部敌人的注意力可能被错置了。确实有阿拉伯人卷入车臣问题，但他们基本上都是受车臣人指挥。恐怖分子在俄罗斯行动的策略与方法，绝大多数都是由沙米利·巴萨耶夫策划的。他对游击战的运用得心应手，这毫无争议，但他最喜欢做的事情还是扣押人质。

1991 年，车臣民族主义总统焦哈尔·杜达耶夫最终宣布独立的时候，鲍里

斯·叶利钦宣布整个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并派驻军队前往车臣边境。作为回应，当时还只有 26 岁的巴萨耶夫和两个朋友劫持了一架刚刚飞离俄罗斯矿水城机场的飞机，将其劫持到安卡拉，并威胁将炸毁飞机，除非俄罗斯结束紧急状态。这次劫持事件在土耳其得到了和平解决，巴萨耶夫被允许安全回到车臣。而之后 15 年中出现的许多最重大的恐怖袭击中，都带有他的印记。恐怖分子在俄罗斯领土上制造的最引人注目的恐怖袭击，其手法都与基地组织很不一样：在俄罗斯，女性人弹成为首选，这些将来的“殉道者”从未受过训练，也不会成对出现，这与基地组织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最常见的手法不同。使用“黑寡妇”似乎是巴萨耶夫的手法，甚至还比巴勒斯坦的女人弹更早出现。

俄罗斯官员似乎也在近年来明显改变了对恐怖主义的定义，对抗恐怖主义的重点更多地从防止针对平民的暴力事件转向了防止国家的外部威胁。

由叶利钦签署的 1998 年俄罗斯反恐法，号召“打击恐怖主义”，其中对恐怖主义的定义是：

针对个人和组织的暴力或威胁使用暴力，以及摧毁（损坏）或威胁摧毁（损坏）财产和其他物质实体，比如威胁造成人员伤亡、严重损坏财产，或者其他存在社会危险性的结果，且目标是侵犯公共安全，将导致民众受到恐吓；试图影响政府采纳有利于恐怖分子的决定，或者满足他们非法的物质或其他利益；试图危害政治人物和其他公众人物的生命，目的在于结束他们的国家活动或其他政治活动，或因为此类活动而展开报复。

但在 2006 年，一部名为《关于反恐怖主义》的新反恐法替代了 1998 年的反恐法，而且提出了对恐怖主义的完全不同的定义：

恐怖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暴力，旨在影响政府部门、地方政府机构或国际组织的决策，其行为方式是对民众进行恐吓或其他的非法暴力行为。

这项新政策将重点放在了恐怖主义是针对国家的，而此前的政策则将恐怖主义定义为针对平民的行为。值得记住的是，联邦安全局负责进行反恐的部门完整名称是“保护宪法制度和打击恐怖主义处”，其中“宪法制度”被理解为这个国家的现行政权。

在普京掌权的日子里，政敌都变得虚弱，媒体变得顺从，俄罗斯的情报机构根本不怕指责。普京是他们唯一需要买好的人。联邦安全局一再遭遇失败的历史，以及克里姆林宫这些年来反应遵循了一条“红线”：如果这些失败导致人员伤亡的悲剧，但没有威胁到现政权的地位，这些将军们都可以得到原谅。但如果同样的失败的确让当局处于危险之中，那么那些责任者将会被找出并被施以惩罚，即便他们在联邦安全局内部位高权重。

2002 年的杜布罗夫卡剧院人质事件没有威胁到克里姆林宫的安全，而且之后联邦安全局的将军们不仅免于受罚，甚至还受到了奖励。联邦安全局负责在首都防止恐怖袭击的部门负责人维克托·扎哈罗夫被提拔为中将，联邦安全局局长帕特鲁舍夫被授予国家最高奖励。

这些奖励潮涌而来，甚至于莫斯科杜马的 35 名成员全部有份儿。2003 年 2 月，在该市议会大楼里举行了一场严肃的庆功活动，他们全都被认为“参加了杜布罗夫卡剧院的特别行动”。第一项奖励被颁发给尤里·卢日科夫，莫斯科的市长。

但在 2004 年，当武装分子袭击了印古什时，形势就完全不同了。在很短的时间内，整个地区陷入巴萨耶夫武装分子手中。这次普京很快就作出了强硬的

回应。7月19日，他撤了联邦安全局副局长阿纳托利·叶日科夫的职务，北高加索地区行动负责人被撤职；内卫部队的一名突击队员维亚切斯拉夫·蒂霍米洛夫也被除名，北高加索内卫部队的突击队员米哈伊尔·拉本奈茨也被除名。不到一个月时间，另一名联邦安全局高官亚历山大·日丹科夫，被悄悄调离职位，成为反恐部门的一名负责人，到2004年底，他成为联邦安全局地方分部的负责人；谢尔盖·科里亚科夫则被调到了西伯利亚的一个地区。

在苏联时代和后来的俄罗斯武装力量中，排名第二的高官是陆军大将，相当于美国的四星上将。联邦安全局局长帕特鲁舍夫在2001年7月授勋陆军大将。这是一项非同一般的成就。20世纪90年代，这项军衔职务曾经很难获得且令人羡慕，而且并不是每一位联邦安全局局长都有资格获得；普京自己在担任联邦安全局长期间也没有获得过这样的军衔。而在安德罗波夫掌权的日子里，克格勃经历了里程碑式的历史，该机构内部同时涌现出四位陆军大将。这样的成就在普京成为总统后，又重现了一次。2005年5月，联邦安全局副局长和边防警察局局长普罗尼切夫，曾经负责在杜布罗夫卡人质事件中指挥行动小组，被提拔为陆军大将。2005年12月，联邦安全局第一副局长谢尔盖·斯米尔诺夫，被提拔为陆军大将。2007年3月，两位联邦安全局副局长——亚历山大·博尔特尼科夫（负责经济安全）和奥列格·瑟罗莫洛托夫（负责反恐情报工作）——也获得了同样的军衔。此时，联邦安全局已经出现了四位陆军大将，军事情报局只有一位，而内务部只有两位。

在俄罗斯，公众通常不知道联邦安全局官员犯下的罪行。该机构会阻止外部任何人对其参与的事件进行调查。

通过外部控制，20世纪90年代克格勃的所有旧分支都创立了特别机构，

被称为内部安全局，以制止腐败。克格勃的继承者在 1992 年也成立了这样的机构。

内务部的行动人员在发现安全机构的雇员和犯罪活动有瓜葛时，会向安全局的领导汇报，这很快成为一项惯例。安全机构也一定从一开始就知情：逮捕嫌疑犯，必须由内务部和相应的内部安全局组成的联合小组执行。

对安全机构的唯一外部控制机构，是在 20 世纪 90 年代确立的，那就是总检察院，这是一个专门机构，负责监管包括联邦安全局在内的情报机构。但总检察院的权力，从一开始就受 1995 年法律中的一条规定的限制。

为联邦安全局提供关于组织、战术、技术和执行联邦安全局机构活动的途径等机密信息者，其背景信息不受总检察院的监督。

2002 年，联邦安全局进一步限制了总检察院的权力。总检察长弗拉基米尔·乌斯季诺夫和联邦安全局局长帕特鲁舍夫联合签署了一项法令，确定了对检察院管辖权的新的限制。该文件规定，“这种管辖必须能够确保人权得到保障，还要保证行动命令得到执行”，同时还规定“官方的行动和其他工作的相关文档，必须根据监管相应保密档案的程序来进行管理，而且作为一项规矩，需要先得到联邦安全局的允许，以便遵守保密要求。只有在极为罕见的情况下，总检察院才有资格要求获取此类文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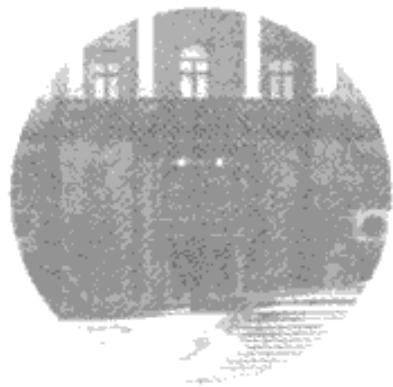
2006 年 2 月 11 日，普京签署了一项新的法令，要求将相关信息列为国家机密。原来的版本包括 87 条，新法令则有 113 条。3 条新条款，分别是第 90、91 和 92 条，规定情报机构、反间谍机构和打击有组织犯罪的部门人员的身份为机密。这些规定，原本旨在保护在犯罪组织和恐怖组织中卧底的情报官员，但很快就被转为其他用途。

2007年，本书作者正在为《新报》撰写一篇关于俄罗斯情报机构内部个人犯罪记录的报道。作者向总检察院的一位官员提出采访申请，询问联邦安全局、联邦保卫局和对外情报局中卷入犯罪事件官员的情况，并没有要求提供人名，而只是想了解犯罪情况的细节。作为回应，本书作者收到了军事检察院的来信，声称“所要求的所有信息，根据《国家机密优先法》的第90~92款规定，都被视为国家机密，恕不能提供”。然后，莫斯科区军事法院院长亚历山大·别兹纳斯尤科也对同一要求作出回应，他表示，关于情报机构人员的判决数据是机密，而且是“绝密”。

最后，本书作者完成了这篇报道，但却没有得到需要的信息。

普京作为总统，第一次向议会联席会议演讲时说过：“我们只坚持一种可能的独裁——法律的独裁。”8年过去了，当梅德韦杰夫接任普京的工作时，他在自己的就职演说中宣称：“我们必须完全尊重法律，克服法律虚无主义。”两人的言论都指向俄罗斯在苏联解体之后许多年来最深刻的失败——未能依法治国。苏联时期是以党治国，但俄罗斯本应该不同，在这个国家里，法律能够约束每一个人，将不会有权力的滥用，没有个人能够超越法律。新的监管资本主义、犯罪还有政府行为的法律近年来获得通过。但要做到依法治国还是难上加难。除了制定法律和建设法律体系，依法治国另一个必不可少的部分是安全机构的角色——他们有权执行法律，并调查违法的行为。但安全机构在这项工作上根本不称职。它们还处在自身角色的初期阶段，逃脱义务，只是国家的代理人，而不是法律的代理人。





The  
New Nobility

The Remaking of the Chinese Elite in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

第十五章  
**沉默：  
越权杀戮**



在历史上，克格勃应对恐怖分子的经验非常少，因为在苏联领土上几乎没有发生过恐怖袭击。克格勃曾经专注于搜捕间谍和持不同政见者。那些可以被称为恐怖主义的暴力行动，大多数都是由犯罪分子发起的。20世纪80年代，只有四次恐怖袭击发生在苏联，而且全都是由个人发动的劫机事件，目的在于逃离该国。最著名的一次发生在1988年3月8日，奥维奇金一家——一位母亲和10个孩子——试图胁迫机组成员将其带至伦敦。飞机没有前往英国首都，而是降落在了列宁格勒附近的一个空军基地，而且飞机也遭到强攻。3名乘客、1名机组乘务员和5名家庭成员被杀。

新的恐怖主义的10年，始于1991年。沙米利·巴萨耶夫劫持了一架飞机，并以车臣独立的名义发起了这次恐怖行动。从那以后，恐怖袭击每年发生。恐怖分子劫持飞机、直升机、大巴，甚至连幼儿园都不放过。1995年，袭击规模变得更大，布登诺夫斯克的整个市医院被巴萨耶夫控制，他要求俄罗斯军队撤出车臣。

接替了克格勃的安全机构在恐怖主义升级时，面对着新的挑战；它们不得不改变其组织结构和应对策略。第一个问题是找到人员组建一个反恐部门。苏联时的克格勃有两个部门专门负责应对恐怖分子：第一个部门是第五局的一部分，负责政治调查和监控国内恐怖主义组织；第二个部门包括K处，负责海外反恐情报和防止外国恐怖分子渗透。

1991年，当一个新的负责与恐怖主义斗争的处成立时，其雇员来自原来的第一局。许多之前参与过瓦解持不同政见者组织的官员被授予新的反恐任务。老克格勃的技术和做法对持续数年的反恐战争来说，可能并不适用。一般来说，克格勃特工的战术一般都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完成，但预防和打击恐怖主义却经常要求在短时间内付诸行动和作出反应。

1998年8月13日，联邦安全局卢比扬卡总部的大厅被炸坏，两名联邦安全局卫兵受轻伤。1999年4月3日，第二次袭击几乎就在同一个地点发生，当量为1.5公斤TNT（三硝基甲苯，又叫黄色炸药）的炸弹被引爆，不过这次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两次爆炸都是由一个名为“新革命行动”的左翼极端主义组织执行的，具体负责的是四名具有理想主义情结的20多岁的年轻人。他们的这次袭击受到了德国“红军派”的启发。第一次爆炸后不久，歹徒的身份就被确认，但联邦安全局选择了对这个组织进行监控，而不是将其成员立即逮捕——如果这样做，原本可以避免第二次爆炸发生。对这些歹徒进行审判时，联邦安全局宣称发现了一个强大的恐怖主义组织，有500名成员，他们试图颠覆政府。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联邦安全局急于寻找新的成员来抗击恐怖主义。历史上就对北高加索人心存疑忌，所以联邦安全局基本上没能够招录到车臣人。因为急于为其文职工作输入新鲜血液，联邦安全局求助于内务部，因为该部官员被认为更加残酷，而且其打击车臣人和莫斯科的其他种族犯罪团伙经验丰富。这样

的经历被认为颇有助益，因为联邦安全局认为，车臣军事头目通过车臣人在莫斯科的有组织犯罪团伙，获得资金和武器。

联邦安全局和内务部的特别部门负责应对车臣人。联邦安全局的分部试图通过任何必要途径渗透进这些犯罪组织，包括庇护向该部门效忠的犯罪团伙头目。并不意外，这个部门被指控高度腐败。同时，其运作效率极高——因为总有大量无价的情报。

结果，到 20 世纪 90 年代末，俄罗斯安全机构采取了严酷手段对付恐怖主义。其重点是使用残酷和残忍的法外杀戮行动，而且因为担心情报泄露，行动都是通过高度机密和不受控制的特别行动部门执行。这些手段在 1999 年第二次车臣战争爆发后被扩大使用。

军事行动进行后不久，联邦安全局在 2001 年 1 月控制了车臣。联邦安全局掌控该地不过 31 个月——从 2001 年 1 月到 2003 年 7 月——控制权和责任都被移交给内务部。

再次掌控车臣期间和之后，联邦安全局在车臣的特别部门执行了法外杀戮。内务部和军事情报局同时部署人员，目标相同。

军事情报局派两个特别行动旅执行这些任务，这两个旅分别名为“东方”和“西方”，其中甚至包括车臣人。他们的首要任务是消除任何可疑的武装人员。2004 年 8 月，国防部长谢尔盖·伊万诺夫与特别行动指挥官会面，宣布他将支持他们并提供更多的高端武器。

内务部也派出了清除小组到达该地区，行动通常持续一个月。这些所谓的“临时行动小组”驻扎在车臣共和国，但也有的被派往达吉斯坦和印古什。一名参加过这些活动的官员告诉本书作者：“我们的小组只有四个人：一名司机，三名军衔最低也是少校的行动成员。我们被派往该地区，有一个目标名单。待任

务结束后，我们需要提供的证据就是用一次性成像相机拍摄的尸体照片。”

联邦安全局有两个部门参与该地区的行动。起初是所谓的紧急行动特别小组（SSG），其中包括联邦安全局地方分部的行动成员和来自内务部特别行动旅的成员。2002年4月，10个紧急行动特别小组被组建起来，以便锁定和刺杀车臣叛军领导人等目标。为了执行清除武装分子的任务，他们独立于联邦安全局的车臣分部行动。

2004年4月4日，三个车臣兄弟——吕斯塔姆·伊拉耶夫（30岁）和他的弟弟伊弗（21岁）、阿德兰（17岁）——以及第四个人卡兹别科·巴塔耶夫（20岁），在车臣小村庄阿欣诺夫斯卡亚被捕获。四个人都是从巴穆特逃出来的难民，这个村子在战争中被轰炸摧毁了。凌晨4点半，大约20名武装人员，多数戴着巴拉克拉法帽（一种完全围住头和脖子的羊毛兜帽，仅露出双眼，也有的露出鼻子），乘坐三辆装甲运兵车来到亚希塔·伊拉耶娃（伊拉耶夫三兄弟的母亲）家附近，要将他们都带走。抓人者们并没有表明身份，但他们说的是毫无口音的俄语，而那些没有将脸遮住的人看上去都是俄罗斯人的面孔。四个车臣人再也没有露过面。

尽管家属们向内务部车臣事务局和本地检察官提出要求，但仍然没有得到任何关于他们被捕的解释。此事发生后几个月，被绑架者的亲属收到一封来自亚历山大·斯捷潘诺夫（阿赫考伊·马尔丹村的调查人员）的来信，确认四个人都已经被乘坐装甲车的“不明身份的人员”带走。他在信中写道，已经对此事进行了刑事立案，并将很快向他们通报调查结果。根据《新报》的报道，四个人被联邦安全局紧急行动特别小组第12组带走，而且这个案子还在一份提交给国际赫尔辛基人权联合会的报告中被提到。

失踪者中的两人，吕斯塔姆和伊弗，曾经在车臣总统拉姆赞·卡德罗夫的

安全机构工作——该部门后来被俄罗斯安全机构怀疑，因为卡德罗夫鼓励以前的叛乱分子加入其中。他们的尸体可能永远都找不到了。总体来说，俄罗斯特种部队使用极端手段清除证据，已经成为他们一贯的做法。其中一种手段被称为“粉碎”，在尸体上捆上炮弹，然后再捆上一些TNT炸药引爆。这个小伎俩，如同两位曾经在车臣战场服役的特种部队军官所说，是为了“确保不会有任何东西剩下。没有尸体，没有证据，没有麻烦”。

毫无疑问，不光是俄罗斯人在车臣战争中使用残忍的暴力。车臣叛军也用同样的残酷手段报复，他们经常将俄罗斯士兵作为目标，而且会在战区之外，对无辜平民展开恐怖袭击。

联邦安全局还向车臣派驻了特别行动中心的作战单位。据信号旗部门副指挥谢尔盖·沙夫林上校称，包含30多名行动人员的两个部门分别被全天候部署在车臣。这些小组执行这个10年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清除行动。2005年3月8日，车臣总统阿斯兰·马斯哈多夫被特别行动中心的攻击小组追踪，并在车臣小村托尔斯泰-尤尔特被杀。其中一名军官因为在这次刺杀行动中的贡献而被授予俄罗斯英雄勋章。

俄罗斯的此类非法刺杀行为，在最近几年中一直持续不断，并且也不以为然。2009年9月2日，俄罗斯最大的几个人权组织召开了一次新闻发布会，宣布“行刑队”仍然在北高加索活动。“我们可以将其手段描述为‘行刑队’。我们不应该害怕使用这样的词汇，因为他们杀戮平民，促使高加索陷入战火。”著名的人权活动家莱夫·波诺玛瑞说道。他是一个叫做“为了人权”组织的领导人。“‘行刑队’被非法使用……从2000年开始，‘记忆’就已经开始跟踪非法监禁、刑讯和非法处决等的线索。”人权组织“记忆”的亚历山大·切尔卡索夫

说道。根据“记忆”的记录，车臣有79人在2009年被绑架。“在车臣经过两年的平静期之后，我们又发现了新一轮的自杀式爆炸、绑架和谋杀……我们后退了三年。”切尔卡索夫遗憾地表示。

根据“记忆”组织的计算，毗邻的达吉斯坦自2009年2月开始，发生了25起绑架案，其中12起最终导致受害者被谋杀。新闻发布会后一个星期，32岁的建筑工人瑟尔拉祖丁·乌马罗夫被人从达吉斯坦共和国德尔本特区的加拉绑架。9月9日，他被一位熟人、警察阿泽尔叫去会面，结果被一些不明身份、戴着面具的人抓走了。第二天，他支离破碎的尸体被人发现。安全部队确认，他是被当局处决的，但他们声称，此人是在反恐行动中被杀的。

“他的脸被人打得变了形，我费尽力气才辨认出他来。”他的妻子、33岁的古尔本尼斯·巴杜洛瓦表示，“他的眼球没有了，两只手也都骨折了。”

几个月之前，乌马罗夫和他的叔叔曾经被当地执法部门拘留，因为怀疑他们参与了武装叛乱。乌马罗夫的叔叔受审并被判有罪，乌马罗夫被释放并送回达吉斯坦，两个月之后死亡。

法外杀戮似乎与法律相冲突。俄罗斯没有对车臣宣战，只有反恐行动。在反恐行动中，执法部门本应遵守《俄罗斯刑法典》。恐怖主义是一种被刑法典所规定的罪行，这意味着，恐怖分子应当被羁押、诉讼、审判。如果确实有罪，他们应该被送入监狱。（俄罗斯没有死刑。）刑法典当中根本没有未加审判而当即处以死刑的规定。前联邦安全局将军和国家杜马安全委员会的副主席瓦列里·加特连科在2005年底对本书作者评论过“格杀勿论”政策。“你们说这是屠杀，这么说不对，”他表示，“没有人允许任何人去做这样的事情。”他补充道，小型的叛乱组织“躲在森林里，有一个策略来对付这样的组织……有一个作战单位专门负责在森林里盘查所有人，原则就是没人被允许在森林里闲逛。如果

枪战开始，我们的作战单位，恕我直言，为了保护自己而处于战争状态……但这并不是屠杀，屠杀是一个来自词典里的表达法。”

当被问及他如何称呼这些行为时，他回答道：“清除，或者称为武力斗争……对我来说，‘直接清除’这个词相当于谋杀。这样的行为是错误的。但我们在进行战争，不管你怎么称呼它。这些小组并不是惩罚或者报复的工具，而是一种斗争的形式。”在车臣的俄罗斯安全机构还采取了其他的策略。其中一个被称为“反向抓捕”，这项非常富有争议的做法，是通过抓捕恐怖分子的亲人来逼迫恐怖分子嫌疑人投降。“反向抓捕”这个词汇第一次被公开使用，是总检察长弗拉基米尔·乌斯季诺夫在2004年10月29日当着国家杜马这样做的。当时他表示，“反向抓捕”将会对以后的恐怖主义行为产生震慑效果。“如果人们——如果你还能将他们称为人类的话——采取恐怖主义行为，通过扣留其亲属，来向恐怖分子表明，这些家庭会遭到何种待遇，或许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挽救其他人的生命。”

尽管俄罗斯立法者从未允许“反向抓捕”政策，但这种策略其实被广泛使用。第一次这类抓捕发生在2004年3月，车臣战地指挥官穆罕默德·汉比耶夫的40多名亲属被逮捕。结果，汉比耶夫向联邦政府投降了。第二次抓捕相关人等亲属是在别斯兰人质危机期间。阿斯兰·马斯哈多夫妻的亲属，包括她的父亲都被拘留了。同样，2005年8月12日，车臣战地指挥官多库·乌马罗夫的妹妹娜塔莎·胡玛多娃被当局抓走。

经过漫长而血腥的冲突之后，俄罗斯与车臣又产生新的芥蒂。2004年5月，普京命令成立了一个特别部门，来服务于亲克里姆林宫的车臣总统。“卡德罗夫卫士”——前车臣总统艾哈迈德·卡德罗夫的保镖——被派到车臣内务部，而且使用同样的绑架和“反向抓捕”策略。根据“记忆”组织的说法，2004年12

月逮捕阿斯兰·马斯哈多夫的亲属，就是由卡德罗夫卫士执行的。

2006年，巴萨耶夫在一次爆炸中身亡前一个月，他重新组织了车臣叛军的军事组织结构。之前，他们还是一个传统的军事组织，由旅、团、营等构成，甚至还有自己的反恐中心。但在面对俄罗斯小分队四处执行法外杀戮时，车臣人从一个准军事组织体系转换为许多由三到五人组成的小型分队，专门对俄罗斯执法人员展开攻击。

2006年11月，车臣指挥官阿里·塔奇耶夫（化名马加斯）在接受一个支持分裂的网站采访时表示，这种小分队的形式，就是专门用来“针对准备执行军事行动来清除他们的特定人员”。这些变化得到了本书作者在俄罗斯情报机构内的消息源确认。情报机构现在面对的是新一代的军事人员：2008年，车臣年轻人被吸引到了圣战组织中，替代富有经验的35岁左右的叛军。圣战组织将自己的触角伸到了车臣边界之外，延伸进印古什、卡巴尔达-巴尔卡尔、达吉斯坦内部。叛军大规模行动的战术转变为伏击战。

2007年到2009年之间，许多俄罗斯高官遭到车臣恐怖分子伏击丧命。2008年1月12日，卡巴尔达-巴尔卡尔共和国有组织犯罪部门的阿纳托利·凯尔洛夫中校，就在纳尔奇克被刺杀。3月7日，北奥塞梯相同机构的负责人马克·梅采伊夫被机枪打死。2009年6月12日，达吉斯坦的内务部长阿季尔盖赖伊·穆罕默德塔吉罗夫将军，在首府马哈奇卡拉被刺杀。叛军重新采用了自杀式炸弹。2008年11月，在北奥塞梯首府弗拉季卡夫卡兹的炸弹袭击中，一名女人弹杀死了11人，并造成多达40人受伤。2009年6月，一个人弹在格罗兹尼杀死两名警察。2010年3月29日，女人弹们来到了莫斯科：两名来自达吉斯坦的妇女几乎是同时在俄罗斯首都的地铁里引爆身上的炸弹。这次爆炸事件导致40人死亡。

与此同时，由俄罗斯军队领导的军事行动却在逐渐减少：2007年，普京将在车臣的俄联邦军队从5万人缩减到2.5万人。联邦军队现在和卡德罗夫的军队数量相等。

整整三年，卡德罗夫一直在敦促俄罗斯安全机构和军队撤退。他在很大程度上（通过说服和其他手段）成功将法外杀戮小分队和俄罗斯在车臣的其他攻击行动剩余人员请了出去。

2009年4月，克里姆林宫宣布长达15年的车臣战争结束。梅德韦杰夫总统命令在车臣地区结束“特殊安全治理”，并宣布在车臣的反恐行动结束。



# THE NEW NOBILITY

The Restoration of Russia's Security State and the  
Enduring Legacy of the KGB

第三部

深潛海外





吉利控股集团

## 暗杀： 远程绝杀敌对分子



New Nobility  
新贵族



为了应对车臣恐怖主义，俄罗斯安全部队的反击行动已经逐渐越过国境，开始对国外的恐怖分子进行法外刺杀。

2004 年 2 月 13 日中午 12 点 45 分，一辆白色的丰田陆地巡洋舰载着车臣叛军头目、副总统扬达尔比耶夫，以及他 13 岁的儿子，在做过周五的祷告离开清真寺后，车行至卡塔尔的首都多哈时，连车带人被炸。扬达尔比耶夫的车驶离清真寺不过 300 码就爆炸了。扬达尔比耶夫受重伤，并在几个小时后被宣布死亡。没有人为此次袭击负责，这是自 1996 年车臣总统焦哈尔·杜达耶夫被杀以来，针对车臣叛军最严重的爆炸事件。1996 年的那次，俄罗斯军事情报部门成功锁定了杜达耶夫的手机信号，并发射导弹将其击毙。

针对扬达尔比耶夫的刺杀是俄罗斯情报机构采取新战术对付车臣叛军的迹象。20 世纪 90 年代，战场主要在车臣，但现在俄罗斯情报机构已经开始在世界各地追踪车臣领导人。俄罗斯当局公开认定扬达尔比耶夫是恐怖分子，因为他参与了杜布罗夫卡剧院袭击事件，但是将其从一个阿拉伯国家的首都引渡出来

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伊斯兰世界中多数人是同情车臣的。

扬达尔比耶夫 1952 年出生，其家庭被苏联从车臣驱逐到哈萨克斯坦。20 世纪 80 年代末，北高加索的知识界首先因民族主义情绪而蠢蠢欲动。扬达尔比耶夫在苏联时代是一名诗人和儿童书籍作家，并卷入当地的政治活动。他组建了自己的民族主义政党，而且在 1993 年成为车臣副总统，杜达耶夫为总统。在 1996 年到 1997 年间，当车臣事实上处于独立状态时，扬达尔比耶夫担任代理总统。这段时间混乱不断，各派势力纷纷崛起。1997 年，他在车臣总统选举中屈居第三，落在阿斯兰·马斯哈多夫和沙米利·巴萨耶夫之后。

扬达尔比耶夫在 1999 年离开车臣前往阿联酋，被马斯哈多夫任命为车臣驻穆斯林国家代表。（他以新身份在喀布尔设立了一个车臣大使馆，还在坎大哈设立了领事馆。）21 世纪初期，尽管扬达尔比耶夫已经在 2001 年被列入国际刑警组织的通缉名单，但他还是以当地埃米尔客人的身份来到卡塔尔。2003 年 5 月，俄罗斯正式要求从卡塔尔引渡扬达尔比耶夫，而 6 月，联合国安理会反恐委员会就将他列入“制裁名单”。针对扬达尔比耶夫的攻击发生一个星期后，也就是在 2 月 18 日晚上，卡塔尔当局在俄罗斯大使馆附近一座租来的别墅中逮捕了三名俄罗斯人。这次逮捕行动为人所知，是因为俄罗斯外交部长伊戈尔·伊万诺夫发表的声明。伊万诺夫承认，三个人都是俄罗斯情报机构的特工：

他们都是俄罗斯公民，其中一位还拥有外交护照，他们也都是俄罗斯情报机构的雇员。他们在大使馆管理范围之内行动，其在卡塔尔的居留是合法的，而且他们在没有违犯当地法律的情况下完成任务。其任务具有情报分析性质，与国际反恐行动相关。

尽管伊万诺夫声称俄罗斯“没有参与这次事件”，他还是指出，俄罗斯政府

甚至最高层曾经“不止一次地要求卡塔尔紧急引渡扬达尔比耶夫，此人应为成百上千名俄罗斯人的身亡负责，包括他在卡塔尔直接指挥的恐怖主义行动，导致莫斯科杜布罗夫卡剧院的大量人员伤亡”。俄罗斯政府指责扬达尔比耶夫帮助策划了这次人质扣留事件，证据就是他和莫瓦萨·巴拉耶夫（人质事件中的一个指挥者）在人质危机事件期间，被情报机构截获的两次通话。

卡塔尔政府还以颜色，公布了一份声明，其中提到了三名俄罗斯人的名字，包括俄罗斯驻卡塔尔大使馆一秘亚历山大·费季索夫，他因为有外交身份所以被放回大使馆，但被禁止离开该国。另外两人是阿纳托利·亚布洛奇科夫（有时候被写为“别拉绍夫”）和瓦西里·普加乔夫（或“博加乔夫”）。亚布洛奇科夫和普加乔夫被卡塔尔指控刺杀了扬达尔比耶夫，还试图刺杀他的儿子达乌德，并被控向卡塔尔走私武器。两名特工在审判期间作出了详细的供述。俄罗斯表示，他们认罪是因为熬不住酷刑。

这些行动得以执行的方式，可以从车臣公布的信息当中一点一滴汇集起来。车臣人将其描述为卡塔尔审讯嫌疑犯后的结果。虽然还有许多问题待解，也有许多漏洞，但审判在俄罗斯的要求下未向公众公开，更详细的细节无从获得。

2004年1月22日早上7点半，亚布洛奇科夫和普加乔夫抵达多哈机场。本书作者的消息源提供情报表示，两位军官都是俄罗斯军事情报局的雇员。俄罗斯报纸《生意人报》后来报道称，根据他们从卡塔尔检察院的消息源获得的情况，刺杀扬达尔比耶夫的命令是由俄罗斯国防部长谢尔盖·伊万诺夫直接下达的。

两个小时之后，两辆有外交牌照的车子，一辆吉普切诺基，一辆日产派美，从阿联酋进入卡塔尔境内。两辆车中装满炸药。亚布洛奇科夫和普加乔夫当时正在一栋由俄罗斯大使馆租住的别墅中与大使馆一秘费季索夫会面。

准备行动花费了三周时间。2月13日，三名俄罗斯人乘坐一辆拥有外交牌照的三菱帕杰罗，来到多哈喜来登酒店外的停车场。亚布洛奇科夫换乘一辆租来的厢式货车，前往清真寺，并在那里等待扬达尔比耶夫。当扬达尔比耶夫乘坐丰田陆地巡洋舰到来并将车停在清真寺前时，亚布洛奇科夫回到喜来登酒店与费季索夫会面。回到清真寺后，亚布洛奇科夫将炸弹安装在了扬达尔比耶夫的车下面。爆炸发生后，这些特工们回到了喜来登的停车场，普加乔夫就在那里等待他们。他们再次更换座驾，然后回到别墅。

因为他们拥有明显的斯拉夫人外貌，所以亚布洛奇科夫和费季索夫引起注意并且被清真寺停车场的保安辨认了出来。在他们租住的别墅中发现了关键证据，包括炸弹的残迹和对扬达尔比耶夫进行监控时拍下的照片等。

在袭击发生时，卡塔尔还没有一个专业的反间谍机构。埃米尔向美国情报机构求助，可能正是在美国帮助之下，追踪到了俄罗斯特工的手机。美国助理国务卿帮办史蒂文·皮弗在接受莫斯科报纸《新闻时报》采访时表示，美国并未向卡塔尔提供“非常重要的技术支持”来追踪被控的刺杀行为。在被美联社要求对这份声明发表评论时，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的一位官员回应称，应埃米尔的要求，华盛顿派了一个炸弹专家组前往卡塔尔。他还补充道，美国专家“并未参与逮捕或调查嫌疑犯”。

克里姆林宫勉力应付此事——从高官出访到压制媒体不一而足——就为了将被羁押者救回俄罗斯。在外交层面上，普京数次将俄罗斯安全会议的负责人，也是前外交部长伊戈尔·伊万诺夫派往卡塔尔进行谈判。在卡塔尔，俄罗斯为被捕的特工聘请了俄罗斯最好的律师事务所叶戈罗夫-普吉恩斯基-阿法纳谢夫律师事务所的律师。这是一个明确的信号，表明是普京在提供支持，因为这家律师事务所的老板尼古拉·叶戈罗夫曾经是普京的大学同学，并且与普京关

系密切。独立电视台驻莫斯科的一位主持人利奥尼德·帕尔夫诺夫，在爆炸之后，获得机会采访扬达尔比耶夫的遗孀。这次访谈于5月的一个周日，在独立电视台的王牌节目也是最受人尊敬的一档节目《刚刚发生》中播出。这档节目在俄罗斯东部播出，但几小时后，还没来得及在西部和中部地区播放，这档节目中的访谈部分就被独立电视台管理层删节了。在写给帕尔夫诺夫的一封信中，独立电视台管理层表示，联邦安全局下令将这段节目删除，声称这样的节目会对正在卡塔尔进行的审判产生影响。帕尔夫诺夫表示了反对，并将这封信交给《生意人报》。两天之后，帕尔夫诺夫被开除，这档节目也被砍。根据独立电视台网站的消息，帕尔夫诺夫违反了与电视台签署的合同，“不接受公司的领导”。

2004年2月26日，两名卡塔尔公民在莫斯科的谢列梅捷沃机场被扣押。联邦安全局官员声称，他们被怀疑与车臣叛军有联系，但这两名被扣押者伊巴特·艾哈迈多夫和纳泽·易卜拉欣·米达伊是卡塔尔奥运代表团成员。他们从白俄罗斯到西伯利亚旅行，途径俄罗斯。后来他们被关进了莱弗尔特沃监狱。扣留卡塔尔的两位奥运会运动员，明显是俄罗斯试图要与卡塔尔人做交易。

3月23日，普京亲自给卡塔尔埃米尔打电话。通话之后，费季索夫被允许回到莫斯科，两名卡塔尔公民也在莫斯科被释放。4月，审判在卡塔尔进行，但应俄罗斯的要求，审判不对外公开。在后续的几个月中，俄罗斯秘密特工受到审判而且被判谋杀罪。两人都被判终身监禁——而不是死刑，检察官曾经要求对他们判死刑。夏天时，卡塔尔政府承诺将两名官员交还俄罗斯，表面上是让他们在俄罗斯监狱服刑。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卡塔尔甚至修改了刑法，允许罪犯被移交到其祖国服刑。之后不久，俄罗斯和卡塔尔签订了一份囚犯交换协议。

12月23日晚，一架通常为高官服务的俄罗斯政府飞机上，乘客却是两名囚犯，飞机在莫斯科的伏努科沃机场降落。选择伏努科沃机场是因为这是贵宾

机场，供普京出国等专用。就在那里，这两名囚犯和俄罗斯官员会面，尽管没有媒体到场，还是传出消息，他们受到了红毯待遇。这些特工受到了英雄归来的礼遇。

就在同一天，卡塔尔官方通讯社宣布：

卡塔尔已经同意俄罗斯政府的要求，将两名俄罗斯公民移交该国，根据卡塔尔审判的结果，在俄罗斯监狱度过剩余的刑期。根据在针对特定案例的相关适用法律基础上达成的协议，两国已达成共识。

在莫斯科，议员和政府官员们忙于争论该向国家英雄颁发何种奖励，甚至没有人假装在遵守卡塔尔政府的说法。“在俄罗斯人的眼睛里，他们是无辜的。没有必要再进行任何的法庭程序。”普京的新闻秘书德姆特里·巴斯科夫在2005年1月这样说道。2005年2月，俄罗斯联邦刑罚局的负责人尤里·加里宁宣称，他知道在卡塔尔被控有罪者的下落。“我们那几位从卡塔尔移交过来的公民，被关在我们的监狱当中。”加里宁在Ren-TV（俄罗斯最大的私营电视台）的节目中如此评论道，“我没有其他更多信息了。或许他们正在什么地方接受治疗，或许正在解决什么程序问题。你看，卡塔尔法庭宣判的刑罚，不能作为我们将某人关押在监狱里的理由。”

卡塔尔的行动原本就是作为俄罗斯情报机构的一个展示。紧接下来三名俄罗斯嫌犯被逮捕，并被卡塔尔法庭判刑，然后胜利回归俄罗斯。这一切创造出一个新的策略——根据此项策略，情报机构将会在国境之外展开行动。俄罗斯官员表示，他们对以色列人在海外追捕恐怖分子的行动印象深刻。对扬达尔比耶夫展开刺杀以后，精英部队信号旗的联邦安全局中校问索尔达托夫：“看看摩萨德，我们为什么不能用同样的手段对付恐怖分子？”

只由军官组成的信号旗于 1981 年在克格勃内部组建，以在战时执行深度渗透、破坏、清除目标等任务。20 世纪 80 年代，信号旗中能够非常熟练地说多国语言的军官，被改换身份送往西方。然而，到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信号旗被转为反恐机构，之后将重点放在了追捕车臣恐怖分子上，但在这个过程中却丧失了宝贵的技能——这是该机构内部军官们常常引以为憾的事情。同时，克里姆林宫似乎从其前辈那里学到了一些经验，也就是说在那些愿意改写自己的政策以利于政府采取此类战术的国家，杀戮是最有效的办法。从一开始，克里姆林宫就认为卡塔尔能够被说服，而这一猜测被证明是正确的。

卡塔尔事件发生两年后，2006 年 6 月 3 日，快到下午 3 点时，一辆雪佛兰豪放载着 5 名俄罗斯外交官，在距离俄罗斯驻巴格达大使馆 1 200 英尺处，突然被一辆小厢式货车和一辆小轿车截住。持枪者就在高档社区曼苏尔袭击了这辆载着外交官的车辆。其中一位外交官，维塔利·蒂托夫受到重伤，而且在当天晚些时候死亡。另外 4 人都遭到绑架。6 月 19 日，伊拉克武装分子要求俄罗斯部队在 48 小时内从车臣撤退，并释放被关押在俄罗斯的穆斯林囚犯，否则这些外交官将被处决。6 月 25 日，恐怖分子交出一份关于人质的录像，其中一人被斩首，另一人被开枪射杀，还展示了第三个人的尸体。第二天，俄罗斯确认 4 名外交官全部身亡。

6 月 28 日，普京命令俄罗斯情报机构找到并刺杀在伊拉克绑架并杀死俄罗斯大使馆人员的武装分子。当时的联邦安全局局长帕特鲁舍夫表示，特种部队将会尽一切力量消灭恐怖分子。“我们应该保证，一切恐怖分子只要犯下罪行，就必须承担责任。”他说道。帕特鲁舍夫补充说：“这不是一次普通的任务，而是我们的行事原则。”（俄罗斯情报机构就是这么理解反恐的。）

实际上，俄罗斯在境外执行暗杀的政策其实已经筹备了很长时间。俄罗斯

议会花费数月讨论通过法律，授予联邦安全局在外国土地上刺杀恐怖分子的权力。据国家杜马安全委员会副主席米哈伊尔·葛里斯汉柯夫的说法，这项法案的第一份草案在 2006 年 3 月呈交杜马。在普京发表宣言之后一个星期，国家杜马和联邦委员会就批准情报机构在国外执行刺杀。这项联邦法案在 7 月 5 日得到杜马批准，而联邦委员会（俄罗斯议会上院）的特别决定就在 2006 年 7 月 7 日得到批准。根据这些反恐法案，总统现在能够命令俄罗斯特种部队或者情报机构在国外执行任务。

已经满目疮痍的阿布哈兹共和国似乎成为该法案通过之后的第一个目标。阿布哈兹位于格鲁吉亚的西北角，曾经是一个人们乐于前往的度假胜地，但为了从格鲁吉亚独立出去，战争将该国的经济摧毁，而且将其变成了一个俄罗斯的封闭的卫星国。阿布哈兹从各个方面来说都是封闭的——但只对俄罗斯开放，两国之间有可跨越的国界，俄罗斯还重新开放了一条通往该国首府苏呼米的铁路。为了加强与阿布哈兹的联系，莫斯科让该国居民很轻易就可以获取俄罗斯居民身份，而且该国国民多数都拥有两国护照。

2007 年 8 月 17 日下午 1 点半，当地著名的激进穆斯林团体领袖哈姆扎特·吉采巴，就在小镇古达奥塔的城中心被射杀。吉采巴对拳击兴趣浓厚，在该共和国也是一位著名的战斗英雄，他在 1992 年到 1993 年的格鲁吉亚与阿布哈兹的战争中成名。在战争期间，他是沙米利·巴萨耶夫的车臣军团成员，也是 1996 年在土耳其水域的阿夫拉西亚渡轮上劫持俄罗斯和外国游客的恐怖分子之一。2000 年以后，吉采巴回到阿布哈兹，并在那里领导一个地区性穆斯林团体。同时，吉采巴与车臣叛军和沙米利·巴萨耶夫之间保持着密切关系，他的妹妹就嫁给了沙米利·巴萨耶夫。

众所周知，阿布哈兹的穆斯林接受来自土耳其的资金支持，土耳其还有一

个很大的阿布哈兹群体，但对这样的援助真正感兴趣的其实是北高加索的军事分子。哈姆扎特·吉采巴与车臣叛军和他们的土耳其支持者关系密切，他也被俄罗斯情报机构看做土耳其人和车臣叛军资金链条的中间环节。根据本书作者掌握的情况，吉采巴还为在 2005 年 10 月袭击了纳尔奇克并逃到阿布哈兹的军事分子提供庇护。阿布哈兹容忍了他的存在，部分原因在于他在独立战争中的贡献，还有一部分原因就是该国执法机构的软弱无能。

哈姆扎特·吉采巴被两名杀手在一个清真寺前用机枪射杀。两名杀手坐在一辆克莱斯勒轿车里一直等他出现。一个小时之后，这辆车被人发现起火了。当地警方表示，这辆车是在谋杀发生之前几天，被人从普索河附近的俄罗斯与阿布哈兹的边界开过来的。阿布哈兹海关的摄像头拍到了克莱斯勒的车牌号，但是阿布哈兹不对所有驾车进入该国的人登记，因此他们无法确认司机的身份。阿布哈兹人于是转而求助俄罗斯边防战士，但俄罗斯人称，他们从未看到这样一辆车穿越边境。一位接近阿布哈兹政府圈子的官员告诉本书作者：“我们毫不怀疑，这是联邦安全局的行动：吉采巴是瓦哈比激进穆斯林团体的领袖，而俄罗斯政府没有其他办法应对这一团体。”

大约在同一时间，阿塞拜疆还出现了大量车臣人被杀的情况。伊姆兰·加齐耶夫是车臣驻阿塞拜疆代表处的副主任，2007 年 11 月 8 日，他在首都巴库被杀。杀手在加齐耶夫下车的时候开枪。凶器被遗留在现场，是一支贝加尔手枪，装有消音器。贝加尔是一种短枪管的微型黑色手枪，看起来几乎像个玩具，在 20 世纪 70 年代开发出来，专门配给军队内的高级军官，但内卫部队和克格勃也很喜欢这种手枪。各反恐部门都用贝加尔作为辅助武器，并用其犯下许多罪行。因为这种手枪可以射穿防弹背心，因此被西方人成为“匪枪”。

在巴库发生的第一次引人关注的暗杀，不仅是为了震慑散居当地的车臣

人。2007年初，在阿塞拜疆的车臣流亡者议会同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发出吁请，声称在阿塞拜疆的车臣难民状况“严重恶化”，最严重的是，“我们这些来到这个国家寻求难民身份和庇护的公民，人身安全受到威胁”。这个委员会引述了一些事件，包括“人员被绑架”，尤其详述了鲁斯兰·艾利耶夫的案子，此人在2006年11月从巴库消失。2007年3月，他的尸体在小村萨玛什基附近被人发现。联邦安全局特工已经在阿塞拜疆执行任务多年。最著名的案件发生在2002年，当时两国关系严重恶化。在巴库，五名联邦安全局官员被逮捕。被捕时，他们携带假文件及监视设备。他们未经审判，被逐回俄罗斯。

过去，阿塞拜疆当局一直容忍车臣人在他们的领土上存在。但在杜布罗夫卡剧院人质危机之后，车臣在巴库的代表处被关闭。加齐耶夫被杀后，阿塞拜疆国家安全部未发表任何评论。但散居当地的车臣人将手指向了俄罗斯，而且这看上去并不像是毫无根据。

到2007年，俄罗斯与阿塞拜疆间的关系有所缓和，本书作者在内务部的消息源确认阿塞拜疆的执法部门存在协议，允许俄罗斯特别行动部门在其国内展开行动，而且可以在两国边界自由穿行。当本书作者将此情况报道在《新报》上后，不论是俄罗斯还是阿塞拜疆，都没有作出任何否认的表示。

2008年到2009年，在土耳其发生了一系列针对车臣人的刺杀事件。土耳其早就被俄罗斯情报机构指责为车臣叛军提供援助，而且大量的车臣难民在该国寻求庇护，主要聚居在伊斯坦布尔。2008年9月，前车臣战场指挥官加伊·艾迪苏尔塔诺夫在伊斯坦布尔被暗杀。他在这座城市的巴萨克塞西尔区的街道上被人开枪射杀。2008年12月10日，前车臣军事首领伊斯兰·雅尼贝科夫，在他的妻子和孩子面前被暗杀。他头部中了三枪，当场死亡。与俄罗斯特

别行动部队关系密切的俄罗斯杂志《特种部队》表示，伊斯兰·雅尼贝科夫在俄罗斯被人称为乌尔苏尔，也是遭到俄罗斯当局通缉的恐怖分子，他在 21 世纪最初几年中，在叶先图基和矿水城等城市以及卡拉恰伊-切尔克斯共和国参与过恐怖袭击。穆萨·阿塔耶夫（也被称为阿里·奥萨耶夫）是另一名车臣叛军，2009 年 2 月 26 日他在伊斯坦布尔被射杀。

俄罗斯声称，这些杀戮都是因为金钱争端。但这样的解释却留下许多疑问待解，而且有证据表明，这些杀戮事件给土耳其之外的官员们带来了烦恼。2009 年 3 月 21 日，土耳其的《沙巴报》报道，土耳其和法国情报机构在伊斯坦布尔进行了一次会谈。这次会谈主题就是解决许多车臣人被杀的问题。这份报纸引用了其中法国代表团的一名联络法官费利佩·多尔塞的原话：“我们接到来自秘密警察对外安全总局（DGSE）的情报，针对车臣人的暗杀行动还将发生在法国……针对车臣人的谋杀在土耳其接二连三地发生，这引起我们的注意；我们认为发生在土耳其的谋杀彼此具有一定相似性。我们为居住在法国的车臣人建立起了特别情报组。我们根据接到的一份情报正在展开调查，寻找俄罗斯与这些事件的关联。”《沙巴报》表示，法国情报机构相信，这些暗杀是由俄罗斯的联邦安全局策划的，而且法国已经将一些居住在该国的车臣领导人转移到别的住处，并改换了他们的身份。伊斯坦布尔的副检察长图兰·乔拉卡德曾经作为法国代表团的成员之一参加这次会议，他告诉《沙巴报》，谋杀车臣人与有组织犯罪并无关系。但这些暗杀并未影响到俄土关系。

利特维年科中毒事件，让俄罗斯情报机构在海外的形象更加冷峻。亚历山大·利特维年科是前联邦安全局中校，他被派到一个部门去打击有组织犯罪；这个部门最终被解散，但其使用的残忍手段却不断受到质疑。利特维年科在

1998 年参加了一个公开的新闻发布会，在会上，他表示联邦安全局命令他杀死寡头鲍里斯·别列佐夫斯基。两年后，利特维年科逃到伦敦寻求政治避难。俄罗斯反过来指责他违反联邦安全局的规定。在伦敦，利特维年科得到了别列佐夫斯基的资金支持。利特维年科不断公开批评俄罗斯政府，而且在伦敦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他指责联邦安全局组织了 1999 年的莫斯科公寓爆炸案。之后，他还宣称联邦安全局正在与基地组织合作，而且参与了俄罗斯记者安娜·波利特科夫斯卡娅的暗杀事件。

利特维年科在 2006 年 11 月死在伦敦；英国专家认定，他是被高度放射性物质钋-210 毒死的。他在医院病床上的最后声明中，指控是普京下令毒杀他。英国调查人员证明，这些核原料来自俄罗斯，同时要求前克格勃官员引渡安德烈·卢戈沃伊。卢戈沃伊在 20 世纪 90 年代成为成功的商人，他在 2006 年 11 月 1 日与利特维年科见过面，然后就回到了俄罗斯。俄罗斯当局拒绝引渡卢戈沃伊，因为这违背俄罗斯宪法。卢戈沃伊后来完全否认自己有罪，并表示有人试图要陷害他，他身上被人有意涂上了钋。

英国皇家检控署从未指明利特维年科被杀的动机。但私下里，英国记者们收到军情五处反间谍机构的介绍，这次下毒是由克里姆林宫策划的，但政府没有直接指控俄罗斯政府。当俄罗斯拒绝引渡卢戈沃伊后，英国驱逐了在俄罗斯驻伦敦大使馆供职的 4 名俄罗斯外交官。作为回应，俄罗斯驱逐了英国外交官。一个英俄联合反恐小组也被解散。在俄罗斯，卢戈沃伊被选入议院，并被邀请加入安全委员会，正是这个委员会监管俄罗斯情报机构，并负责监管与其相关的法律起草工作。

利特维年科被谋杀是 10 年之内俄罗斯人在海外被暗杀事件中最引人注目的。钋明显来自俄罗斯，而且如果没有俄罗斯官员的帮助，根本不可能将这种

核原料带到英国境内。但没有什么信息表明利特维年科被杀是由俄罗斯领导人下令的，或者此事是某人受贿后的行为，也无法表明是有人雇杀手行凶。俄罗斯不积极配合英国的调查，而且卢戈沃伊被选入俄罗斯议会，这都被西方看做明显的信号，那就是这次毒杀事件得到了政府的支持。但在俄罗斯，这被解读为，这个国家不会受到外界的摆布——这种情绪也被成功地转变为一场宣传运动，将反西方情绪玩弄于股掌之间。关于利特维年科为何被杀以及是谁下的命令，作者都没有找到具有结论性的证据。卢戈沃伊被选入议会让其获得了赦免权，这表明他得到了某位非常坚定的领导者的支持。



The  
New Nobility

THE NEW NATION



THE NEW NATION

**情报：**  
**重点在前苏联加盟国家**



当苏联克格勃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被分成不同机构后，新俄罗斯领导人决心创建一个情报体系。这类似于西方国家的情报体系，在这种体系下，每一个机构的职权在地域上和结构上都有不同。对外情报由一个机构负责，而国内安全则由另一个机构掌管。对外情报机构类似于美国的中央情报局或英国的军情六处，内部安全机构则近似于美国的联邦调查局和英国的军情五处。

在普京担任总统期间，曾经有人猜测，他会允许联邦安全局吞并对外情报局。但联邦安全局并没有获得新的部门，最后也没有想办法去吞并这些机构。联邦安全局似乎不需要这样做——确实如此，经过一段时间后，它本身就暗暗转型成为第三个国家对外情报机构，其工作重心主要在前苏联国家。

在苏联时代，克格勃的情报和反间谍分支内部紧密联系，不论在莫斯科的总部，还是在全国各地的地方分支中，都是如此。除了在国外进行间谍活动外，克格勃总是忙于收集“当地的情报”，这其实是一种委婉的说法，其真实含义是招募居住在苏联的外国人，意图将来把他们派往自己的祖国成为间谍。这套体

系能够起作用，原因就在于苏联这个警察国家，有机会真正监视每一个在该国的外国人。

克格勃的地方分部受命应对在该国游历的外国游客。每一个地方分部都有一个被称为“第一处”的部门，负责招募外国人。之后，苏联解体，克格勃被拆分成为各自为战的部门，第一处被交到联邦安全局手中，其功能也保留了下来。但这些部门缺乏相互协作，无法高效发挥作用。缺乏这种高效协作的组织结构，被联邦安全局当做借口要求成立一个部门，以便大幅扩充自己的实力，并在国外展开行动。

2002年6月，本书作者收到一封来自联邦安全局官员的信，此人要求匿名。在信中，他指出，按照法律规定，联邦安全局有权作为情报机构运行。他在信中说，1999年，叶利钦总统签署了一份关于情报机构的密令，除了其他事项之外，这份密令创立了一个处，在联邦安全局内部协调“行动情报”。这个新处建立在分析、预测和战略策划部之内，其负责人是维亚切斯拉夫·乌沙科夫少将。此人曾经在卡累利阿与联邦安全局局长尼古拉·帕特鲁舍夫共事。

本书作者询问联邦安全局的官方发言人安德烈·拉留申，关于叶利钦密令的情况。尽管拉留申没有确认这份密令确实存在，因为这是机密，但他认为：“基本上，这样的密令有存在的合理性。如果没有这样的总统令，那么联邦安全局和对外情报局之间就会出现矛盾。只要情报和反间谍职能是分设在不同机构中，这样的总统令就是必要的。否则，如同美国的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偶尔会相互干扰一样，联邦安全局和对外情报局之间也会出现矛盾。”情况很快就变得明晰起来，新处的功能远远超过普通的协调作用。

苏联解体后，对克里姆林宫来说，莫斯科在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中保持其影响力至关重要。俄罗斯的安全机构寻求与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之间的特殊关系，

甚至帮助它们填补其安全机构真空。1992年4月，俄罗斯对外情报局与独联体国家的安全机构签订一项协议，这些国家之间建立起松散的同盟关系，并同意相互之间不刺探情报。

因为除俄罗斯之外的多数国家，几乎没有什么情报行动，这份协议实际上是偏向于一方的。结果，俄罗斯对外情报局以一种“老大哥”的姿态，经常访问独联体国家首都，并参与多边或者双边会谈——有时候他们会受到主宾国国家元首的接见。但没过多久，事情变得清晰起来，在后苏联共和国中维持政治现状并不有效。21世纪最初的10年中，在被称为“颜色革命”的一系列民众反抗声浪中，20世纪90年代建立起来的政权像多米诺骨牌一样逐一陷落：格鲁吉亚的玫瑰革命（2003年），乌克兰的橙色革命（2004年），吉尔吉斯斯坦的郁金香革命（2005年）。这些政权变更既没有被莫斯科预见，也没有被及时预防。

很明显，至少有一些苏联共和国将要离开俄罗斯势力范围，并需要得到更为严密的监控。在莫斯科，最后关注的是西方情报机构在该地区的存在，因为颜色革命被克里姆林宫视为西方活动的直接结果。尽管俄罗斯的对外情报机构有权在前苏联加盟共和国展开行动，但他们已经同意不在这些国家内从事间谍活动。联邦安全局却从未签署过此类协议，并可以不受任何约束。联邦安全局的新处被授以负责俄罗斯近邻的任务。根据本书作者的消息源，这个处的结构是沿着地理路线组建，其官员也被授予出国的权利。2003年6月30日，《联邦安全局机构法》的一份修正案通过，规定联邦安全局将拥有一个特别部门，负责对外情报工作。2004年，这个处变成了一个完整的部门，被称为行动情报部（DOI），其负责人维亚切斯拉夫·乌沙科夫被提拔为联邦安全局的副局长。在这个新成立的完整部门当中，乌沙科夫的位置被谢尔盖·贝塞达所取代，他是一位很有影响力的将军，此前曾经在负责监督总统办公厅的机构工作，并在那

里建立起重要的关系网。

很难追踪这个部门都展开了哪些行动，但是其核心官员却在转折时期前往新独立的前苏联加盟共和国。2002年，本书作者在《维尔西亚》周刊上面发表了关于该部门行动的系列文章的第一篇。（这组报道刊登在2004年的《莫斯科新闻》上，最后在2006年开始刊载于《新报》。）到那时，独联体国家的记者开始向本书作者提供关于联邦安全局领导层在这些记者所在国家行动的信息。

根据这些外部的报告，联邦安全局的踪迹出现在白俄罗斯和摩尔多瓦。在白俄罗斯，联邦安全局被指控试图在2003年的总统大选中影响该国的政治形势。在摩尔多瓦，据传乌沙科夫将一位当地身份显赫的政治家揽入自己的部门。

还有一件事情也为外界所知，那就是在另一个受到俄罗斯支持而要从格鲁吉亚独立出去的地区阿布哈兹，该地区2004年总统选举候选人曾经与联邦安全局的领导层展开会谈。联邦安全局将军们前往阿布哈兹支持亲莫斯科的候选人，但最后此人却落选了。这次访问导致在格鲁吉亚的联邦安全局情报地位大为下降，而且该部门甚至没有成功预测到大约四年后，格鲁吉亚会入侵南奥塞梯。

同时，联邦安全局积极参与俄罗斯疆界之外各国的政治活动，尽管这些活动是否有效还不清楚。2005年5月12日，联邦安全局局长帕特鲁舍夫当着国家杜马宣称，联邦安全局协助揭露了一场针对白俄罗斯政治体制的阴谋。根据帕特鲁舍夫的说法，国际非政府组织于2004年底，当乌克兰正处于橙色革命期间，在斯洛伐克首都布拉迪斯拉发开会“计划推翻白俄罗斯总统亚历山大·卢卡申科”。令人吃惊的是，白俄罗斯的克格勃并没有对联邦安全局这样公开干预该国内政表示愤慨。第二天，白俄罗斯克格勃确认了联邦安全局的说法。几天之后，独联体国家安全机构的领导人在哈萨克斯坦的阿斯塔纳会面。这次讨论的主题在会议后期变得清晰起来，当时帕特鲁舍夫再次警告大家警惕“颜色革

命”的危险性。这次，他得到了白俄罗斯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哈萨克斯坦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支持。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严格限制政治反对派，也限制言论自由。

在普京当权的 10 年中，联邦安全局在海外的野心进一步加强。2009 年春天，这个部门的一名上校告诉索尔达托夫，该部门已经将活动范围扩大到了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而这一说法也得到了第二个消息源的证实。2009 年 5 月，联邦安全局部门负责人谢尔盖·贝塞达被提升为联邦安全局行动情报和国际关系局负责人。他之前的职位由奥列格·赫拉莫夫接任，他被认为是中东问题专家。

同时，专门生产肩章和勋章的戈里宗特公司，按照联邦安全局的要求为该部门专门制作了一枚勋章。这枚勋章的图案是地球，这正是俄罗斯对外情报局用来象征全球影响力标志。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希望在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中保留势力范围，但并不是所有成员国都乐意再次置于莫斯科老大哥的监视之下。

白俄罗斯、亚美尼亚、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是同盟关系，它们都允许俄罗斯军事基地存在于自己的领土。阿塞拜疆、格鲁吉亚、摩尔多瓦和乌克兰慢慢滑向北约，部分原因是俄罗斯支持了这些国家内部的地区分裂运动：纳戈尔内·卡拉巴克从阿塞拜疆，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从格鲁吉亚，德涅斯特河东岸共和国从摩尔多瓦，克里梅从乌克兰。同时，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一直对苏联时代就移居本国的俄罗斯族裔心存疑忌，已经开始清除安全机构中的俄罗斯人。

20 世纪 90 年代下半叶，克里姆林宫急于和这些国家的安全机构建立特殊关系。它作出了两次尝试，但都以失败告终。第一次尝试是在 1997 年 3 月，建

立了一个独联体国家安全机构领导人理事会和特别行动部门。这个理事会由联邦安全局局长负责，执行分部则由联邦安全局国际关系局负责管理。但这个理事会的功能只是顾问性质，其活动只限于莫斯科的传统势力范围：最活跃的成员有白俄罗斯和亚美尼亚，它们都是莫斯科最亲密的盟友，而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拒绝加入。第二次尝试是在 2000 年，建立了一个独联体反恐怖中心，总部设在莫斯科，中亚分部设在吉尔吉斯斯坦的比什凯克。

尽管这个中心被看做超国家机构，实际却受到联邦安全局控制：俄罗斯说了算，而且占据了一半的职位，提供一般的预算，而其他独联体国家分享剩下的职位。这个反恐中心由联邦安全局的第一副局长任负责人，联邦安全局监督在中亚进行的“集体”反恐演习每年 4 月进行一次。事实上，反恐中心是俄罗斯将独联体国家纳入自己势力范围的一种机制。

但是反恐中心最后还是没能存续。其职权是建立一个数据库，让所有成员国的安全机构分享情报。但共用情报的想法，在成员国得知数据库将会被放在莫斯科后，也最终流产。独联体国家内存在太多的猜忌，都不愿意将情报数据交给俄罗斯。不久，反恐中心变成了另一个一潭死水般的官僚组织。

进一步看，一些独联体国家只是不接受这种俄罗斯在它们领土上帮助其反恐的理念。土库曼斯坦、阿塞拜疆和乌兹别克斯坦拒绝派代表前往该中心，而在 2005 年的玫瑰革命之后，格鲁吉亚也不再向该中心派遣代表。

反恐中心不断试图扩大其在中亚的势力，甚至不顾这样做可能会支持当地的集权政府。2005 年 5 月，乌兹别克斯坦城市安集延发生的暴动被该国安全部队严厉镇压，导致数百人伤亡。联邦安全局将军、当时的反恐中心负责人鲍里斯·梅利尼科夫，公开宣布支持乌兹别克斯坦政府，并建议反恐中心帮助乌兹别克斯坦国家安全局。但最后，反恐中心没能将俄罗斯的势力范围延伸到 20 世

纪 90 年代就已经稳固下来的区域之外。

与此同时，阿富汗战争中美国和联军在中亚的存在，都被莫斯科看做 19 世纪俄国和英国在这一地区斗争的延续，但这次斗争双方变成了俄罗斯和北约。这促使莫斯科改变了战术，因为之前的努力都没能有效控制这一地区安全机构，必须寻找新的联盟。新尝试的关键就是乌兹别克斯坦，该国总统伊斯兰 · 卡里莫夫是一位从苏联时代走来的强人。乌兹别克斯坦对美国来说是极为重要的区域，飞往阿富汗的“掠食者”无人机都从这里的基地起飞。俄罗斯想将该共和国继续纳入其传统势力范围。

然而，卡里莫夫想要镇压该国内部的伊斯兰反对派，这是一个被称为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IMU）的组织。其成员多数都逃往阿富汗，有些逃往俄罗斯。这个想法很简单：如果美国人能够在阿富汗境内追捕该组织成员，俄罗斯安全部队就能帮助其追捕逃往俄罗斯的敌人。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俄罗斯成为中亚政权政治反对派的安全港。使用旧式但仍然有效的护照，利用俄罗斯松散的边境控制，难民，这些政权的政敌，和塔吉克斯坦、阿塞拜疆、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哈萨克斯坦等国的伊斯兰活动分子涌进俄罗斯。在多数情况下，难民都是世俗的反对派分子，或者是来自伊斯兰解放党的伊斯兰教徒。这个政党在 1953 年成立于耶路撒冷，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来到乌兹别克斯坦。该党虽然反对武力，但却支持推翻伊斯兰世界的世俗政府，重新创立伊斯兰王国形式的伊斯兰国家。20 世纪 90 年代末，伊斯兰解放党已经拥有强大的群众基础，甚至被看做对塔什干的卡里莫夫政权的威胁。乌兹别克斯坦安全机构在 1998 年开始逮捕该党成员。对俄罗斯来说，伊斯兰解放党不是威胁：该党的活动分子只是在布道或者散发传单。

但卡里莫夫并不愿意容忍任何的反抗，因为害怕俄罗斯可能利用被驱逐的

持不同政见者来培养叛乱分子。乌兹别克斯坦的情报机构创造了一种战略来进入俄罗斯逮捕可能给卡里莫夫制造麻烦的人。俄罗斯安全机构，包括联邦安全局，要么参与了这些计划，要么对其置之不理。

人权活动家叶连娜·里亚宾尼纳向本书作者回忆道：“2000年后的几年中，生活在伏尔加地区的乌兹别克斯坦公民，被该国情报机构怀疑为伊斯兰解放党成员的，开始陆续消失。”这位不断抽烟的里亚宾尼纳，是民权援助委员会的中亚政治流放援助项目的负责人。这个非政府组织位于莫斯科。她在法庭上花费几个小时为难民们辩护，反对对他们的非法驱逐。其中一些人后来进了乌兹别克斯坦监狱。鞑靼斯坦首府喀山的马德拉萨的一名老师阿里舍尔·奥斯曼诺夫，从1998年开始就受到乌兹别克斯坦的通缉，原因就是所谓的“试图颠覆该国宪法政权”。但奥斯曼诺夫却获得了俄罗斯的公民身份，也就不会被引渡。2004年，奥斯曼诺夫被俄罗斯警察扣留并被判几个月监禁，因为他非法持有武器。2005年7月24日，他本应该被释放，但他妻子表示，他消失了。后来才弄清，他从监狱里直接被劫持，送往机场并飞向乌兹别克斯坦。2005年10月24日，俄罗斯国家新闻社报道，“根据联邦安全局和乌兹别克斯坦国家安全局的打击国际恐怖主义联合计划，奥斯曼诺夫被交给了乌兹别克斯坦。”2005年11月，他被判在乌兹别克斯坦服刑8年。

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阿塞拜疆等国的安全机构与俄罗斯之间也使用同样的策略。2004年，塔吉克斯坦情报机构成功劫持了著名的塔吉克斯坦政治家马赫马鲁齐·伊斯坎达罗夫，他曾经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塔吉克斯坦内战中担任战地指挥官。1998年达成和平协议后，他进入政府并被任命为国家天然气公司总裁。同时，他也成为反对党民主党的领导人。2003年，他对总统埃莫马利·拉赫蒙试图延长自己总统任期的行为提出反对。不久之后，他离开塔吉

克斯坦来到俄罗斯。2004年11月，塔吉克斯坦总检察院指控他犯有恐怖主义罪行，并发布对他的逮捕令。他很快就在莫斯科被扣押，但俄罗斯公共检察院却推翻了对他的引渡请求。2005年4月5日，伊斯坎达罗夫被释放。

两星期之后，他消失了，然后出现在塔吉克斯坦的监狱中。伊斯坎达罗夫设法送出来一封信，他称自己原本住在莫斯科郊外一个朋友家里。4月15日晚上，他与自己的朋友出门散步，遇到两名身穿俄罗斯交通警察制服的人。他们给他戴上手铐，把他推上车。行驶500米后，换了一辆车，有人把他带到了一个蒸汽浴室。第二天他们开车将其送到一个森林并交给了不明身份的人，据他推测，这些人来自俄罗斯情报机构。他们遮住他的眼睛，并将他送上一架飞机。在飞行过程中，这些人也没有对他宣布任何信息，伊斯坎达罗夫认为那是一架军用运输机。4月17日早上，他到达杜尚别机场，并被塔吉克斯坦安全部的官员接走。2005年10月，他被判监禁23年。

伊斯坎达罗夫被以假名“热内蒂·彼得罗维奇·巴拉宁”送往杜尚别。俄罗斯机场管理者告诉伊斯坎达罗夫的律师，“巴拉宁”这个姓在他们的数据库中并未注册。而同意他登机则表明伊斯坎达罗夫从俄罗斯离开的路上，得到了联邦安全局的暗中帮助，因为联邦安全局就负责维护边境，而且与边境事务相关的数据库也是联邦安全局负责维护的。他的律师向欧洲人权法庭提出控诉，表示伊斯坎达罗夫被非法引渡出了俄罗斯。该法院随后询问了俄罗斯当局，希望其能够说清楚是否参与了这件事。2005年9月24日，俄罗斯官员格奥尔基·马图什金作出回应称，俄罗斯当局与伊斯坎达罗夫被劫持一事毫无关系，但是他的说法却与塔吉克斯坦的回应相冲突。博罗甘获得了塔吉克斯坦外交部发送给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办公室的一份声明，该声明说：“嫌疑人伊斯坎达罗夫被俄联邦情报机构正式移交给塔吉克斯坦。2005年4月17日，他被关进塔吉克斯坦

**共和国安全部的拘留所。”**

如同伊斯坎达罗夫被神秘胁迫飞往杜尚别所显示的，多数情况下，俄罗斯情报机构对中亚情报机构在俄罗斯境内展开的行动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但这套劫持体系还不够完善，缺少一些重要的元素：一个协调中心，对参与劫持的特工的免责制度，还有转移被扣押者的合法性。这一行为似乎是违犯俄罗斯法律的，根据该国法律，正式引渡行为必须遵守一些成文的程序，且需要上报总检察长。这套新的体系就是为了彻底规避合法的引渡。

## 第十八章

# 黑客： 复杂而隐秘的关系





在物理世界之外，俄罗斯安全机构与非官方的黑客们保持着复杂的关系，比如那些向敌对国家网站发起攻击的黑客。

2005 年，一群亲克里姆林宫、反西方的铁杆网络活动分子开始在俄罗斯的网上论坛中聚集。其中一个此类论坛由网站 informacia.ru 管理。这些活动分子们与国家并无关系，而且他们也不是电脑技术的专家，但他们很熟悉网络世界。在被车臣叛军的网上活动触怒后，他们感到俄罗斯政府在应对那些号召暴力反抗的网站（包括号召使用武器和炸弹）时打击乏力。他们决定使用自己的手段。他们向一位专家支付了 500 美元请他写了一个程序，能够对网站展开“拒绝服务”攻击——一个很简单却非常有效的搞垮网站的方法，至少是能暂时搞垮，其原理就是涌人大量外部请求和发送信息。

2005 年 8 月，这个组织注册了自己的网站 anticenter.org。该网站有一个黑色背景的标志，图案是一个准星，瞄准了一个看似戴头巾的阿拉伯模样的人。这家网站称自己主张“非暴力反恐”，号召对一些网站展开攻击，并将它们描述

为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网站。其名单上前几位的是车臣叛军的网站。“我们组织最主要的目标是完全毁掉宣传恐怖主义和暴力、捏造事实而且欺骗读者的网站。”车臣叛军的 5 个主要的网站都名列其中。他们还宣布将要攻击一个边缘反对党，全国布尔什维克的网站。

anticenter.org 号称发动过 25 次网络攻击，其中许多都是针对车臣人的。比如，2005 年 12 月 5 日，该网站宣称，“当天多数时候，chechenpress.info 这家网站都无法登录。登录该网站的最后一个镜像，也变得极为困难。”12 月 2 日，他们“搞垮了 iman-tk.fastbb.ru 网站”。12 月 1 日，“非暴力反恐黑客的活动，导致 chechenpress.net 网站遇到大麻烦。最后几个小时中，我们看到同一网站的最后一个镜像出错，这就是 chechenpress.info 网站，这个网站早就成为人民攻击的目标。我们呼吁所有的访问者下载程序攻击最后一个镜像，chechenpress.info”。

2006 年，不知是何原因，这个组织关闭了 anticenter.org。但在其最后彻底消失之前，圣彼得堡的电脑程序员安东 · 莫斯卡尔注意到这一点，提前采取措施下载了该网站上的所有内容。2007 年 5 月 28 日，莫斯卡尔在家里接到一个电话，此人声称自己是联邦安全局全国反恐委员会的“斯坦尼斯拉夫”。他提出了一项简单的要求——他正在寻找非暴力反恐组织，并且有兴趣多了解一点莫斯卡尔所下载的内容。

在一次 20 分钟的谈话中，话题很快转到了莫斯卡尔的爱国主义，还有迫不及待需要对抗恐怖分子网站等内容，这位程序员试图向斯坦尼斯拉夫解释，他根本不赞同 anticenter.org 网站的观点，也与该网站没有任何关联，只是复制了上面的内容。但斯坦尼斯拉夫却并不相信，将自己的办公室电话留给了莫斯卡尔，貌似想要得到他的帮助。他似乎想要招募莫斯卡尔来追踪网站。他告诉莫斯卡尔，如果有更多关于 anticenter.org 网站黑客们的信息，就给他打电话。

在旷日持久的车臣战争期间，以及中间的平静期，克里姆林宫感到非常恼火，因为车臣叛军通过网络和外界媒体的交流畅通无阻。最重要的车臣网站就是kavkaz.org，由莫夫拉蒂·乌都戈夫创立。此人从第一次车臣战争起，就是车臣的主要发言人。这个网站也很快成为主要的传声筒，发布车臣领导层的观点，是针对俄罗斯军队的高效宣传手段。

第一次车臣战争期间，俄罗斯记者和外国记者曾经试图穿越俄罗斯防线，但最后却在防线外得到了许多情报。电视和媒体受到车臣叛军的欢迎，他们允许拍摄被毁的俄罗斯装备，还有俄罗斯士兵的尸体。与此同时，乌都戈夫在网上发表言论，并频繁出现在电视上。俄罗斯在第一次车臣战争中的失利在莫斯科被解释为对“信息战”准备不足。1999年，第二次车臣战争爆发，俄罗斯军队尽一切努力组织记者从叛军手中获得情报。

1999年12月，俄罗斯军队攻入格罗兹尼，几名记者留在该城市中，其中包括路透社记者玛莎·艾思蒙特和自由电台的记者安德烈·巴比茨基。他们的报道激怒了俄罗斯当局，联邦安全局的发言人亚历山大·兹达诺维奇指责外国情报机构编造新闻，干扰战争。两名记者遭到恐吓并被逮捕。

俄罗斯报纸和电视频道似乎已经得到了教训：记者被要求不得报道车臣方面的情况，因为这样很危险。因为现场没有记者，媒体开始通过kavkaz.org网站直接接收来自叛军的消息。比如在2000年5月7日，俄罗斯军队否认了叛军所说的，击落一架俄罗斯苏-24喷气式轰炸机的消息。但之后一张车臣士兵手持该飞机零件的图片开始出现在kavkaz.org上，军队被迫承认车臣叛军的说法是事实。

这家网站设计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影响外国人，网站有俄语、英语、土耳其语等不同语种，其关于车臣军事首领的新闻、访谈、视频和照片等，引起了

新闻媒体以及世界各地专家们的注意。2000年5月，英国战争与和平报道组织的专家迈克尔·兰德尔告诉自由电台，尽管kavkaz.org网站不时夸大其词，但其提供的情报多数还是有根据的。他夸奖这个网站，说它帮助将车臣的情况展现在公众视野中，其披露重点是虐待车臣平民等问题，以及被俄罗斯人扣押的俘虏等。

1999年8月31日，kavkaz.org第一次遭到黑客袭击。他们在网站的首页上发了一张米哈伊尔·莱蒙托夫的照片，此人是著名的俄罗斯诗人和俄罗斯帝国在北高加索的标志，他身穿突击队员制服，手持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网站上出现不少留言，如“这家网站已经应俄罗斯公民要求关闭”，署名“西伯利亚旅”。2002年1月，kavkaz.org再次受到攻击，当时西伯利亚城市托木斯克的一群学生发动了一次“分布式拒绝服务”攻击。这群学生有7个人，带头的叫德米特里·亚历山德罗夫，他曾经在1996年从车臣逃到了托木斯克。学生声称，他们已经压制叛军网站三年，对其展开攻击，并向该网站位于美国和加拿大的服务提供商发送恐吓信。联邦安全局位于托木斯克的分部似乎完全知晓这些黑客的行动，而且还发布了一份媒体声明，维护学生的行动，称其行为是合法的，是“作为市民表达立场，这是值得尊敬的”。

当学生们发动袭击时，俄罗斯情报机构已经掌握了非常尖端的网络技术。如果他们想要加入到针对车臣网站的网络战争中，肯定可以这么做，但他们选择不这样做。

克格勃在电子情报领域的继承者是联邦政府通讯与信息局，是在克格勃第八和第十六处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负责编码和解码以及拦截无线电信号等。

如同美国的国家安全局一样，通讯局负责信息安全和通信情报工作。但该

局却并不满足于美国国家安全局的那点权力，俄罗斯的通讯局继承了克格勃很知名的数学学校，该学校后来成为联邦安全局的密码研究院；其位于海外的设施包括两个通信情报/电子情报基地，一个位于越南的金兰湾，另一个位于古巴的卢尔德。还有第三总处，负责海外的监听工作。通讯局外部只有少数人知道这个机密的第三处的官方名称及其活动。

通讯局的信息技术机构受到美国专家的高度重视：据说它有权力也有能力渗透到俄罗斯所有政府和私营信息服务机构。据说它还成功收集到外国投资企业的情报，包括机密的银行转账信息等。从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开始，通讯局对控制网络，至少是俄罗斯国内的网站兴趣浓厚。在 1996 年的听证会上，该局副局长弗拉基米尔·马尔科门科中将告诉国家杜马，“互联网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该局有权监控电子、金融和证券的交易，以及其他形式的通信，包括私人浏览互联网。通讯局最主要的关切倒不是车臣的宣传，而是保护网络通信不受国外情报机构的人侵。专司信息安全的专业人士，没有兴趣走在俄罗斯针对车臣人的网络战争前沿。

通讯局的第三处在 2003 年被纳入联邦安全局。在那时，与政府没有直接联系的黑客似乎是俄罗斯政府攻击车臣叛军网站的最合适工具。俄罗斯官员们公开宣称，他们对车臣网站不满；非官方的黑客们心领神会地付诸行动，而政府则对这些违法者们坐视不管。

不久之后，独立的黑客受克里姆林宫的鼓励，其攻击范围已经超越了车臣网站，同一个黑客组织开始攻击反对派的政治组织以及媒体的网站。他们将目标锁定在极端主义组织（比如全国布尔什维克党）、反对派组织（比如加里·卡斯帕罗夫的组织）以及主流媒体（比如报纸《生意人报》和莫斯科回声电台）。

本书作者相信这些黑客当中的特定组织可能不是受到安全机构的指使，而

是受到了总统身边人的指使。其他的青年运动组织都是由克里姆林宫组织的，所以，黑客可能也是这样。克里姆林宫对网络上的非传统手段表现出兴趣，包括动员年轻人扩大宣传效果。2009年5月，“克里姆林宫校园博客”启动。这是一个教博客们如何散布观点的论坛，由具有政治背景的技术人员阿列克谢·恰达耶夫领导，而他是格莱布·帕夫洛夫斯基的助手。格莱布在普京时代，曾经应克里姆林宫的要求，策划过无数次网络宣传运动。这所学校的人員包括从俄罗斯各地区挑选出来的80人，而其中每个人负责指导几名其他的活动分子。等到毕业时，学生们将按照部署在网络上发动信息运动。

在这些实例中，克里姆林宫都没有使用联邦安全局的资源来攻击那些令人厌烦的网站，而只需往正确的方向引导成长中的大量“爱国黑客”。

2005年10月13日，在纳尔奇克的一次重大恐怖袭击后，俄罗斯外交部抱怨，车臣网站仍然在一台瑞典服务器上坚持运行。“不幸的是”，外交部网站上表示，“瑞典当局到现在都没有采取任何实质步骤阻止车臣网站的信息传播”，这家网站这时已经变成了kavkaz-tsentr。官方的表态似乎刺激了非官方的黑客。24小时之内，俄罗斯网站mediaactivist.ru发动了针对kavkaz-tsentr和莫斯科回声电台、《新报》、自由电台等的攻击。这场攻击运动被公开宣传而且还有自己的口号：“我们让kavkaz-tsentr的走狗闭嘴！”这像是一场垃圾邮件攻势：mediaactivist.ru公布了几个邮件地址，黑客们用他们的信件展开攻击。

但抗议声逐渐减弱：受到攻击的媒体向mediaactivist.ru的服务提供商发出警告，网站被转移。

2005年10月16日，另一家网站，名为网络反恐地下社区（www.peace4peace.com）被建立起来，并开始对kavkaz-tsentr发起拒绝服务攻击。在一份声明中，黑客们表示：“我们是各有专长的黑客。我们中的多数早已不按法律行事，但这

并不意味着我们不爱国，我们会维护世界和平。”

俄罗斯外交政策以及非官方的黑客的努力在一定程度上获得成功。2006年5月，瑞典当局关闭了kavkaz-tsentr。这家网站被移到了格鲁吉亚，后又于2008年转到爱沙尼亚。

2007年4月，外国政府网站第一次遭到袭击。爱沙尼亚决定将一座苏联战争纪念碑移出首都市中心的决定，激怒了克里姆林宫。在俄罗斯媒体发动抗议爱沙尼亚的大规模民族主义运动后，俄罗斯黑客在4月27日发动了一系列针对爱沙尼亚政府、议会、银行、报纸、电视台网站的攻击。这些攻击当中，大多数都是“拒绝服务”类型。这些攻击从个人使用低技术含量的手段如ping-floods（一种简单的拒绝服务攻击，攻击者通过不断给被攻击者的电脑发送回应要求数据包，让电脑不堪负累），到租用昂贵的用来发送垃圾邮件的僵尸网络等方式不一而足。俄罗斯否认自己参与其中，但爱沙尼亚的外交部长乌尔马斯·帕伊特指责克里姆林宫直接参与了这些网络袭击，而且爱沙尼亚之后要求并得到了北约的帮助，以应对类似新形式的攻击行为。

到底谁是这些攻击行动的幕后策划者，从未公开得到确认。爱沙尼亚未能提供俄罗斯政府参与其中的证据。在2007年9月，该国国防部长承认，他拿不出证据来证明俄罗斯政府与网络攻击有关。“当然，现在我无法确定地说这些网络攻击是由克里姆林宫或其他俄罗斯政府机构安排的。”雅克·阿维克索在接受爱沙尼亚“第二频道”的电视采访时说。与此同时，此领域的高级专家拉法尔·罗霍钦斯基则表示，他发现了政府资助这些网络信息流动的迹象。他指出，有大量被拦截的电脑，在一周时间内整齐划一地开始和停止攻击，这表明它们是被租来实现这一目标的。最后，俄罗斯政府没有受到谴责，也没有采取任何外交措施。

2008年6月，立陶宛又成为被攻击的目标。当该国议会投票决定禁止公开展示纳粹德国和苏联的标志时，这个前苏联加盟共和国激怒了俄罗斯。立陶宛的态度引来大量网络攻击：6月30日，全国通信监管办公室表示，大约300家网站，包括全国民族机构、证券交易委员会等公共机构的网站，还有大量私营公司的网站，都受到了攻击。它们的网站内容被替换为苏联的红旗，还有反立陶宛的口号。

2008年8月，与格鲁吉亚在南奥塞梯地区发生军事冲突时，也出现了针对格鲁吉亚互联网设施的网络攻击。根据一份“灰鹅工程”报告，俄罗斯论坛stopgeorgia.ru和xakep.ru的成员们“花费大量时间讨论各种不同攻击方式的优缺点，其中包括分布式拒绝服务攻击的策略和工具……论坛的领袖提交的一份分布式拒绝服务攻击的工具分析，指明了一种基本但却有效的工具。一些论坛成员在使用这种工具方面遇到困难，这表明论坛当中有许多成员的技术只有中低水平”。这些攻击搞垮了几家格鲁吉亚政府网站，迫使该国政府将网站的服务器地址放在美国。格鲁吉亚外交部为了发布即时信息，被迫使用了博客账户。

2007年，informacia.ru开始引来更多注意。这家网站好像同时被黑客和情报机构使用。2007年5月，索尔达托夫在《新报》发表了一篇关于非官方黑客的报道，黑客们在informacia.ru对此作出了回应。两年后，2009年7月，informacia.ru被用来对付一名英国外交官。伦敦小报《太阳报》刊登了英国驻叶卡捷琳堡的副总领事詹姆斯·哈德森的视频截图，视频显示相貌酷似哈德森的人同时与两名妓女行苟且之事，他被迫辞职。这段长4分钟18秒的视频最初于7月6日出现在informacia.ru网站上，然后被叶卡捷琳堡的《共青团真理报》和八卦网站life.ru发现。《太阳报》在7月9日刊登了一篇关于此事的报道，就在

同一天，哈德森辞职。本书作者并不清楚informacia.ru是如何获得这段视频的。俄罗斯一贯有这种用令人无话可说的材料发动攻击的传统——这被称为“有根据的诋毁”——但这种手段被用在一名外交官身上，倒是非常罕见。

一个月后，美国外交官凯尔·哈彻出现在另一段视频当中，也被发布在了informacia.ru网站，并被《共青团真理报》转载。在哈彻的例子中，这名外交官没有被迫辞职。美国大使为他的雇员挺身而出，而联邦调查局对此展开调查并宣称，这段视频造假。国务院称这段视频是炮制出来的蒙太奇，其中包含一段真实视频。“哈彻先生成为俄罗斯媒体和网络进行的一场诬陷行动的目标，以败坏他的名声和他的工作，”国务院发言人伊恩·凯利表示，“我们对这种污蔑行为表示愤慨。”

此前，informacia.ru就因为与情报机构的密切关系而为人所知。2008年，黑客们再次创建了anticenter.org并重新开通一个网站，antiterror.tv。该网站声称，已经击倒了200家网站，而且追查到了这些非法网站的网络地址，并将这些信息转交联邦安全局。

这些反恐组织的出现，表明非官方的黑客们已经成为俄罗斯网络战前沿的一部分。通过允许尚武的民族主义民众通过网络战对付俄罗斯的敌人，安全机构成功与那些为非作歹者划清界限，同时也实现了更重大的目标。



苏联解体后，在克格勃重组的最初年代中，联邦反间谍局只存在了很短的时间。1995年，联邦反间谍局重命名为联邦安全局。重新命名后的这个机构被授予更加广泛的权力，已成为新俄罗斯“安全”的守护神。15年过去了，可以就俄罗斯的安全和其安全机构所作的贡献得出一些结论了。

联邦安全局和俄罗斯在普京掌权的10年中，面对的最大挑战是北高加索的恐怖袭击浪潮。在杜布罗夫卡剧院人质危机中，联邦安全局的强攻行动被称为一场胜利，以期避免另一场灾难。但两年后，又一次攻击发生在别斯兰的学校里时，安全机构的领导人完全没有拿出果断的行动——而且甚至未能赶到现场。

联邦安全局坚持认为，车臣的冲突是被外国势力挑动和支持的。事实上，车臣人最具破坏性的手段，都是由车臣的武装头目策划出来的。在反恐战争中，俄罗斯的安全机构似乎错误估计了敌人的性质。面对游击战时，安全机构以牙还牙，展开一系列行动，清除了一代车

The  
New Nobility  
The Development of Russia's Security Services and Their Role in Society Since 1991

结 论

臣武装头目和领导人，其中包括阿斯兰·马斯哈多夫、沙米利·巴萨耶夫和扬达尔比耶夫。但当这些领导人被杀光后，马上有新人接替他们的职位。目前，俄罗斯安全机构一直没有找到一种有效的手段来应对恐怖主义。

这种失败在 2010 年 3 月 29 日周一再次被凸显。当时两名女人弹在上班高峰期，在地铁里引爆了身上的炸弹。第一枚炸弹在早上 7 点 56 分爆炸，当时一辆地铁刚刚开进卢比扬卡站，这站距离联邦安全局总部不过很短的距离——这枚炸弹似乎完全就是针对联邦安全局的。然后，在早上 8 点 39 分，第二枚炸弹在文化宫花园地铁站爆炸，就在著名的高尔基公园附近。结果，总共 40 人死亡，84 人受伤。

联邦安全局声称，这些爆炸事件是对当月初联邦安全局小分队在北高加索刺杀武装分子的报复行为。但这一说法听起来很可疑：这样的恐怖袭击通常需要数月策划，而且武装分子们早在两年前就承诺要让俄罗斯的城市和市民感到恐惧。爆炸案也重新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这在杜布罗夫卡剧院人质危机和别斯兰屠杀事件之后就被问及：如果情报机构得到克里姆林宫如此多的支持，其名义就是为了保护安全，为何他们还是没能制止这样致命的屠杀？爆炸事件明显暴露出联邦安全局在北高加索“格杀勿论”政策的缺陷，但不论是联邦安全局还是克里姆林宫丝毫都没有表现出改换方向的意图。普京宣称“恐怖分子将会被消灭”，而梅德韦杰夫称爆炸案制造者是禽兽，并声称“我坚信，我们将会找到他们并将其悉数消灭”。

当普京在 2000 年被选为总统后，安全机构，主要是联邦安全局与他一起崛起，希望从 20 世纪 90 年代那漫长的 10 年中重生，在那个时代，他们被新资本主义洪流和变数横生的政治所遗忘。普京，曾经担任克格勃官员 16 年，实际帮助安全机构在俄罗斯权力和声望版图上占据了重要席位。由于克里姆林宫对安全机构的信任，他们成为俄罗斯新贵，却并未带来预期的效果。

联邦安全局花费大量精力追查外国间谍，但他们使用的横遭非议的策略，却

引起人们的疑问，那就是这些威胁是真实存在，还是被捏造出来的。同样，因为害怕非政府组织可能会激起民众对克里姆林宫的反对，联邦安全局将这些组织当做目标。这明显是误判：这些受到质疑的组织太小，难以构成显著威胁，不可能在俄罗斯得到广泛支持，更不会宣扬反抗政权的理念。

普京打开大门，让许多安全机构特工在国家的各种机构中爬升，也许是期望他们成为维护安全与秩序的前哨。但等他们尝到甜头后，这些人开始窝里斗，拼命争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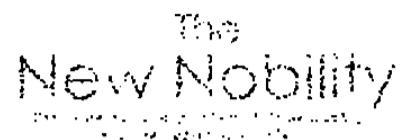
当普京被指责参与了1999年莫斯科公寓爆炸案，以便在民众中制造恐慌，并成功掌权后，联邦安全局面对着深刻的挑战。尽管还不清楚这些爆炸案背后主使到底是谁，很明显联邦安全局试图压制对此案件的疑问，而其做法只会进一步促成阴谋论的形成。

20世纪90年代，叶利钦担任总统期间，一方面试图建立公民社会，另一方面也在建立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融洽关系。但普京有意识地试图压制公民社会，压缩政治上和公共生活中的讨论空间。安全机构参与到了政治当中，以保护普京，或许也是为了展示他们的权力和对克里姆林宫的忠心，或者他们错误判断了针对这位广受欢迎的总统的反对带来的威胁。

联邦安全局本应该是法律监管下的国家机器中的一个齿轮而已。但在今天的俄罗斯，法治的目标依然遥远，而安全机构似乎已经表明，他们的利益还有他们所保护的国家的利益，是超越法律的。俄罗斯联邦安全局的思维方式毫无疑问是在沙皇历史和苏联历史的影响下形成的：它多疑，缺乏向外看的胸襟，而且拉帮结派。

很明显，时代呼唤改变，但答案并不在于过去的教训。尤里·安德罗波夫的牌匾可能会让安全机构对自己的身份颇有优越感，但这并不是在现代民主制度中的高效模式。在高贵的鲁比利温卡攫取价值连城的房产，可能会让那些已经走到自己职

业末期的将军们心安理得，但这无法培养出新一代聪明的领导人和在民主社会中令人尊敬的执法者。普京给将军们赋予更多的特权和好处，他们却躲避危险和责任，而且被证明未能履行职责，导致人们不断质疑他们在俄罗斯未来中应扮演何种角色。如果梅德韦杰夫总统真的要带领俄罗斯走向现代化，结束已经在过去数年中大行其道的“法律虚无主义”，他将需要国家的守卫者真正为此使命而生，而不是一个身陷过去的泥潭中的机构。



## 附录一

# 联邦安全局组织结构

## 高级管理层

局长，国家反恐委员会主席

- 第一副局长
- 第一副局长，边防局局长
- 副局长，国家反恐委员会办公室主任
- 副局长，联邦安全局国务秘书
- 副局长
- 副局长

## 部门

1. 反间谍局

- 反间谍行动部

- 反间谍行动协调与分析处
- 特别行动处
- 机构反间谍处
- 偷查行动情报支援处
- 情报安全中心
- 军事反间谍部

该局负责反间谍行动，包括对军工单位、俄罗斯陆军和海军进行监督，追查攻击政府网络资源的黑客。

## 2. 宪法保卫和反恐局

- 行动组织处
- 行动搜索处
- 反恐怖主义和政治极端主义处
- 打击国际恐怖主义处
- 特别行动中心

该机构负责在国内与海外打击恐怖主义（包括与其他国家的情报机构合作），并进行政治监控与从事特别行动。

## 3. 边防局

该局包括在莫斯科的总部、一个情报部门、位于地方的处级单位，以及部署在俄罗斯边境的边防部队。

#### 4. 经济安全局

- 工业企业反间谍支持处（P处）
- 交通部门反间谍支持处（T处）
- 金融系统反间谍支持处（K处）
- 内务部、能源部与司法部反间谍支持处（M处）
- 打击走私与贩毒处（N处）
- 行政服务处

该局负责监督重要的行业和公司，以及内务部、能源部和司法部。

#### 5. 行动情报与国际关系局

- 行动情报处（DOI）
- 分析处
- 战略规划处
- 非保密信息部
- 国际合作处

该局前身为分析和预测部，负责向联邦安全局领导层、克里姆林宫以及海外情报行动和国际活动提供评估报告。

#### 6. 组织人事局（人力资源）

- 特别注册处
- 组织规划处
- 人事处

## 7. 后勤保障局

- 金融与经济处
- 物质与技术支持处
- 基本建设处

该局负责为联邦安全局总部提供保障和维护，同时负责为联邦安全局修建军事设施。

## 8. 科学与技术局

- 武器订购与配给和军事与特别装备处
- 行动技术措施处（监听与拦截信息）
- 信息技术研究院

该局负责为行动提供技术支持。

## 9. 监察局

- 检察处
- 审计处
- 内部安全处

该局负责对雇员进行评估，对联邦安全局成员的犯罪行为进行调查。

## 局长直管的分支部门

- 调查处（联邦安全局最主要的调查机构，负责监督联邦安全局地方分部的调查机构）

- 行动搜索处（监视部门）
- 无线电通信情报第十六中心（电子情报）
- 特别装备中心（包括爆破小分队）
- 通信安全中心（负责政府通信软件的保护）
- 国家机密授权、鉴定与保护中心
- 行政处
- 条约和法务处
- 联邦安全局接待办公室
- 援助行动处（针对行动散布假情报，包括公共传播中心）
- 登记与档案处
- 特别通信处
- 航空处
- 军事医疗处
- 值班处
- 军事动员处

## **联邦安全局地方分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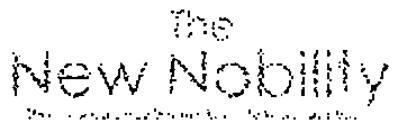
根据联邦安全局管理规定（第 960 号总统令，2003 年 8 月 11 日发布），联邦安全局组织体系如下：

- 地方处级机构（地区安全组织）
- 武装部队、战地以及其他军事编制中的处级单位
- 边防局的处级单位
- 航空分部，特别训练中心，特别行动分部，以及所有企业、教育机构、

科研机构、专家、司法鉴定、军事医疗、军事建设分部（还有其他学院和分部），都要为联邦安全局的活动提供协助。

- 联邦安全局其他行使独立职权的处级单位。

2010 年，由 960 号总统令规定的联邦安全局的中央机构，在经过 2005 年到 2006 年的改革中得以改进。这些改革是由第 1383 号总统令（2005 年 12 月 1 日）和第 1476 号总统令（2006 年 12 月 26 日）规定的。具体细节均来自 Agentura.ru 网站的公开材料。



## 附录二

### 联邦安全局的演变

1991年12月3日 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解散了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

1992年1月24日 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创建了俄罗斯联邦安全部。

1993年12月21日 安全部被更名为联邦反间谍局。叶利钦在总统令中表示，“整个系统从全俄肃反委员会，到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内务人民委员会、国家安全部、内务部、国家安全委员会，其实根本没有真正得到改革。近年来的重组努力都是外部的，而且都是表面工作……政治调查体系仍然得到保留，而且很容易就会复辟。”

1994年1月5日 联邦反间谍局的调查处被移交到检察院。联邦安全局的监狱，包括莱弗尔特沃，被移交给了内务部。边防部队则独立出去，成为专门机构。

1994年11月26日 联邦反间谍局策划对车臣首府格罗兹尼的进攻，但最

后造成灾难性后果。

**1995年4月3日** 联邦反间谍局更名为联邦安全局。

**1995年6月14日** 俄罗斯南部城镇布登诺夫斯克被沙米利·巴萨耶夫领导的车臣叛军占领。6月19日，强攻失败后，俄罗斯当局被迫允许巴萨耶夫（带着一些人质）回到车臣。最后，共有129人死亡。

**1996年1月9日到18日** 萨尔曼·拉杜耶夫在紧邻车臣的达吉斯坦共和国对克兹利亚尔展开攻击。车臣叛军被俄罗斯军队、特别行动部队、联邦安全局特种部队包围，并受到攻击，但最后还是成功脱逃回到车臣。

**1996年8月31日** 在哈萨维尤尔特签署停火协定。协定的签订标志着第一次车臣战争结束，并促使俄罗斯军队在1996年12月31日撤出车臣。

**1997年9月** 设立专门打击有组织犯罪的部门，分析和打击犯罪组织行为处。

**1998年7月6日** 宪法保卫处成立。分析和打击犯罪行为处解散。经济反间谍处被改组为经济安全部。

**1998年7月25日** 普京被任命为联邦安全局局长。

**1998年10月8日** 联邦安全局特别行动中心成立。该中心包括两个联邦安全局特别行动单位：阿尔法和信号旗。1999年7月，原属于联邦安全局莫斯科分部和经济反间谍处的单位也被移交给该中心。

**1999年4月3日** 经济安全局成立，创建工业企业反间谍支持处（P处），交通部门反间谍支持处（T处），金融系统反间谍支持处（K处），内务部、能源部与司法部反间谍支持处（M处）和打击走私与贩毒处（N处）。

**1999年8月16日** 尼古拉·帕特鲁舍夫接替普京担任联邦安全局局长。

**1999年8月28日** 宪法保卫和反恐局在反恐处和宪法保卫处的基础上成

立。这是俄罗斯历史上第一次将反恐与政治监控部门合并在同一个国家安全部门中。

**1999年9月9日** 莫斯科东南部的一座公寓大楼发生爆炸，94人死亡。四天之后，也就是在9月13日，莫斯科南部卡希尔斯科亚高速公路附近的一个公寓小区的地下室发生巨大的爆炸，导致118人死亡。

**1999年11月16日** 援助计划处成立。该处包括公共传播中心（媒体办公室）。

**2000年2月7日** 时任总理和代理总统的普京，签署了“武装部队中的联邦安全局处级单位规定”。根据这项规定，军队反间谍机构权力将得到扩充，负责监控可能发生的危及军队内部体制的威胁。

**2000年3月26日** 普京当选为俄罗斯总统。

**2001年1月22日** 联邦安全局被指定负责在车臣的反恐行动。

**2002年10月23日** 莫斯科杜布罗夫卡大街上的一座剧院被车臣人占据。这次悲剧也被称为杜布罗夫卡剧院人质危机，事件持续三天。10月26日，联邦安全局特种部队强攻剧院，共有130人死亡，大多数是因为特种部队所使用的毒气芬太尼中毒死亡。

**2003年3月11日** 普京总统撤销了独立的电子情报局（FAPSI）和边防局。边防部队并入联邦安全局，电子情报局则由联邦安全局和联邦保卫局瓜分。同一天，联邦安全局航空处成立。

**2003年6月30日** 《联邦安全机构组成法》的修正案签署，规定联邦安全局成立一个专门机构负责对外情报工作。

**2003年7月4日** 在车臣执行反恐任务的地方行动机构领导权从联邦安全局移交到内务部。

**2004年7月11日** 普京对联邦安全局作出结构性调整。副局长人数减少，所有“部”都被命名为“局”。

**2004年9月1日至3日** 在北奥塞梯的别斯兰，一座学校被车臣人占领，共有334人死亡。

**2005年7月12日** 根据总统令，联邦安全局监狱，包括莱弗尔特沃在内，被移交给司法部。这次调整到2006年1月才完成。

**2006年3月6日** 普京签署一项反恐法案。根据这项法律，联邦安全局成为打击恐怖主义的主要机构，同时成立全国反恐委员会（NAK）。该委员会是一个由联邦安全局局长领导的部门间高层机构，其职能为协调安全机构的反恐行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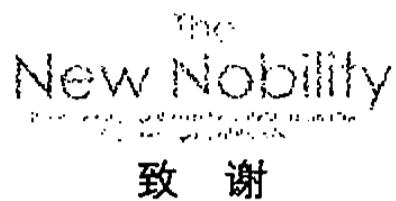
**2006年7月5日和7日** 联邦安全局获得授权，在海外清除恐怖分子。

**2006年8月28日** 普京改变了联邦安全局、联邦保卫局、特别装备局、对外情报局制服的颜色，从绿色变为黑色。

**2007年1月31日** 普京宣布大幅增加联邦安全局资金，但没有公布具体数额。

**2008年5月12日** 亚历山大·博尔特尼科夫被任命为联邦安全局局长。尼古拉·帕特鲁舍夫被任命为俄罗斯安全会议的一位秘书长。

**2010年3月29日** 莫斯科再次发生恐怖事件：在拥挤的莫斯科地铁上，两名女人弹几乎同时引爆了身上的炸弹。40人殒命。



## 致 谢

本书耗费数月写成，但却建立在对俄罗斯情报机构历时 10 年的报道基础之上。每一年，消息源都会消失一些，内部人士也越来越不愿意透露情况。

我们在 2000 年 9 月开设网站 Agentura.ru 后，就开始收集信息。在那些年中，许多朋友都鼓励我们继续自己的报道。如果没有他们的帮助，就不可能有这本书。

我们永远不会忘记 2002 年 11 月的一个雨夜，我们坐在《维尔西亚》办公室附近的斯塔里蒂·阿尔伯特大街的咖啡馆里。我们的办公室遭到联邦安全局特工搜查，因为我们报道了杜布罗夫卡剧院人质事件。当时，没有人知道联邦安全局打算做什么，所以我们的编辑吕斯塔姆·阿里费杰亚诺夫生怕我们会被捕，让我们离开办公室。当坐在咖啡馆里等待时，我们在《今天》报调查新闻版合作过的一群记者走了进来，领头的是费奥多尔·格拉德基赫，他们的到来让这家咖啡馆变得有点像个新闻办公室了。我们和费奥多尔曾在 2002 年人质事件中，在杜布罗夫卡剧院对面的大楼里一起工作；2004 年的别斯兰危机期间，我们又一起待在一家废弃的酒店；2006 年 7 月，我们还曾经与他在贝鲁特同乘

一辆车。这些都不是巧合。

马里纳·拉蒂舍瓦，我们多年的好朋友，也是Agentura.ru网站团队的一员，一直支持着我们。

阿列克谢·什瓦奇金，一位莫斯科律师，曾经在索尔达托夫被叫到联邦安全局的莱弗尔特沃监狱接受讯问时陪伴左右。在之后的数年中，他一直是我们的朋友，并提供许多帮助。丽娜·别列兹尼茨卡亚是Newsru.com网站的一位编辑，曾经通过制造公众舆论来帮助我们，报道本书作者每次受到的讯问，并最终促使联邦安全局放弃对我们的指控。

我们还非常感激米歇尔·舍维廖夫，他是我们在《莫斯科新闻》的副总编辑，他一直在鼓励我们，甚至在刊物被迫关闭的情况下，仍然给我们以鼓励。奥列格·潘菲洛夫是新闻极端状况中心主任，当《莫斯科新闻》被关闭，我们尚未加盟《新报》之前，正在前途不定的时刻，是他支持了我们。

我们还要特别感谢瓦列里·希里亚耶夫，这是一个命运奇特的人——他在20世纪80年代曾经是克格勃官员，后来在2000年之后的几年中担任《新报》董事，他参与决策雇用了我们。我们在这家媒体工作了三年。

我们非常感激奥列格·帕什科瓦，他充满勇气，惹人关注，是《伊杰尼夫尼杂志》的董事，他邀请我们为该刊写作——这是最后一家愿意接受我们想法的媒体。我们要感谢叶夫根尼娅·奥尔巴茨，正是她提议我们为《伊杰尼夫尼杂志》撰写一个关于克格勃重生的系列报道，而这为本书奠定了基础。

我们还要感谢尤里·热尔维，他是一位联邦安全局官员，但后来成为律师。他曾经担任过瓦连京·莫伊谢耶夫（一名外交官，曾被指控是韩国间谍）的辩护律师。还有他的朋友安德烈（为了保护隐私，他的姓氏不便指明）。

非常感谢著名的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谢尔盖·格里戈里扬茨——“政治开放”

组织的负责人。他曾经在 20 世纪 90 年代发起一系列讨论，如“克格勃的昨天、今天与明天”。他向本书作者提供了对苏联国家安全遗产的看法。

我们还想感谢联邦安全局、对外情报局、军事情报局和内务部的部分官员们，他们与我们分享了他们的知识和观点。但这些人，出于显而易见的原因，我们不能在此言明。

我们要向一位优秀的英国调查记者尼克·菲尔丁表示特别感谢。从我们在 2000 年第一次相识，他就非常支持我们开设 Agentura.ru 网站的想法。他的著作《守卫领土：军情五处内情与反恐战争》在许多方面指导了我们报道俄罗斯情报机构的方式。尼克经常向我们提供内幕信息以及很实际的帮助，不管他在哪里。他也是我们进行最富有争议的调查过程中，第一个咨询过的人。听说我们要写一本书时，他立刻表示将提供帮助，这些帮助对完成这本书来说至关重要。

约翰·肯普夫纳是“审查索引”网站的首席执行官，从一开始，他就对我们的写作极为热心，我们也非常感激他在我们写作的最后阶段所提供的思路。还有史蒂文·阿夫特古德，美国科学家联合会的秘密工程负责人，我们创建 Agentura.ru 网站的灵感承蒙他的启发，他也鼓励我们完成这项工作。马克·乌尔班，一位英国广播公司的记者和《大人的游戏规则》（内容是关于英国皇家空降特勤队在北爱尔兰的行动）的作者，在关于情报机构在北高加索使用的策略的章节中，提供了他的想法。利物浦约翰摩尔斯大学的政治与安全教授彼得·吉尔为有些章节提供了重要的研究视角。

我们的朋友西昂·格莱斯纳，英国广播公司的一位制片人，帮我们润色了本书的英语表达，而且总是乐于向我们提供很温和的建议。

感谢《星期日时报》的马克·弗兰凯蒂，他是最有经验的驻莫斯科外国记者，我们要向他表示深深的感谢。我们被《新报》解雇后，他的帮助变得极为

宝贵，而我们在波克罗夫卡大街上的咖啡馆里的会面，成为许多事件的起始，而正是这些事件造就了这本书。伊拉娜·奥泽尔诺伊给予我们重要的鼓励，正是她提议用英语写作本书，以便美国读者能够看到。但如果没有人·罗森布拉姆，这本书不可能完成，是他说服公共事务出版社的克莱夫·普里德尔关注我们的写作计划。我们还要感谢公共事务出版社所有参与本书出版的工作人员。

还要特别感谢戴维·霍夫曼，这是一位贡献卓著的《华盛顿邮报》编辑，他在寒冬中的莫斯科与我们共度两星期，帮助我们整理和编辑手稿。非常感谢我们的编辑，摩根·范福尔斯特。

我们还要深深地感谢罗伯特·甘斯勒，我们在施特林·洛德文稿代理公司的经纪人。